

通向资本主义的 共产主义道路

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

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

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

拉尔夫·拉库斯(Ralf Ruckus) 著

通向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

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

拉尔夫·拉库斯(Ralf Ruckus) 著

问题教材审阅组 译

gongchao.org, 2023

原文标题：Ralf Ruckus. *The Communist Road to Capitalism: How Social Unrest and Containment Have Pushed China's (R)evolution since 1949* (Oakland: PM Press, 2021)

知识共享 (Creative Commons)：储存的文章可以按照知识共享规则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NC-SA 4.0) 使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deed.zh>)

目录

| | |
|-------------------------------|----|
| 目录 | 1 |
| 推荐序 | 6 |
| 前言 | 8 |
| 导论 | 12 |
| 断裂、连续性与左翼 | 12 |
| 初步观察 | 13 |
| 左翼对中国历史的立场 | 15 |
| 分析的重点 | 18 |
| 问题与假设 | 19 |
| 调查的方法和范围 | 21 |
| 掌握共和国历史 | 25 |
| 历史模式 | 25 |
| 叙述矩阵 | 28 |
| 本书章节 | 31 |
| 第一章：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 35 |
| 解放前后 | 35 |
| 革命动员与战争 | 35 |
| 几十年破坏后的挑战 | 37 |
| 遵循苏联模式 | 38 |
| 新的阶级划分 | 39 |
| 压榨农民 | 40 |
| 工人的分裂 | 42 |
| 社会主义阶级社会 | 45 |
| 毛主义父权制 | 46 |
| 性别解放的承诺 | 47 |
| 雇佣劳动与生育负担 | 48 |
| 军管国家 | 51 |

| | |
|---------------------------------|-----|
| 一国社会主义 | 52 |
| 僵化的阶级划分 | 53 |
| 概要：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中的重构 | 54 |
| 第二章：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 | 56 |
| 中断：罢工和整风，1956-1957 | 57 |
| 劳工骚乱 | 57 |
| 百花齐放运动 | 60 |
| 加速：大跃进和清洗，1957-1965 | 61 |
| 反右运动 | 62 |
| 大跃进 | 63 |
| 重新组织再生产劳动 | 65 |
| 重启与清洗 | 67 |
| 中苏决裂 | 70 |
| 造反：文化大革命和激进批评，1966-1967 | 71 |
| 走资派和红卫兵 | 72 |
| 造反运动 | 73 |
| 性别化的造反 | 76 |
| 复辟：军管和派系斗争,1967-1976 | 79 |
| 监禁与迫害 | 79 |
| 军管和林彪事件 | 82 |
| 持续的派系斗争 | 84 |
| 停滞与穷困 | 85 |
| 中美友好关系的重建和四个现代化 | 88 |
| 概述：仍然等待着革命 | 90 |
| 第三章：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中叶，转向资本主义 | 92 |
| 不满：社会斗争和民主化运动，1974-1980 | 93 |
| 劳工的不满 | 93 |
| 李一哲和社会主义民主 | 95 |
| 四五运动 | 96 |
| 民主墙运动 | 98 |
| 改革：改变和危机，1976-1989 | 100 |

| | |
|---------------------------------|------------|
| 妥协和破裂 | 100 |
| 正式改革开放 | 101 |
| 农民领路 | 103 |
| 城镇劳动力改革 | 105 |
| 移民与经济特区 | 107 |
| 性别关系的重构 | 108 |
| 女性*的代际和社会划分 | 110 |
| 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改变 | 113 |
| 起义：天安门运动，1989 | 114 |
| 80年代城市工人与学生的抗议运动 | 114 |
| 领导人中的新冲突 | 116 |
| 北京的起义 | 117 |
| 恢复：镇压、重建与经济增长，1989-1999 | 119 |
| 军事镇压 | 119 |
| 保守主义卷土重来 | 120 |
| 东方集团的末路 | 121 |
| 恢复改革 | 121 |
| 世界工厂 | 122 |
| 国有部门的改制 | 124 |
| 概述：摸着石头过河 | 125 |
|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 | 128 |
| 抵抗：农民起义和工人动乱，1992-2005年 | 129 |
| 改制对工人的影响 | 129 |
| 女*工是不幸的一代 | 130 |
| 国企工人的抗议和道德经济 | 131 |
| 农村的转型 | 135 |
| 农民的抗争 | 137 |
| 巩固：和谐社会，繁荣与危机，2000-2012年 | 141 |
|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产生 | 141 |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143 |
| 加入世贸组织和另一个繁荣 | 145 |

| | |
|---------------------------------------|-----|
| 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刺激和再平衡 | 147 |
| 再平衡的努力 | 148 |
| 罢工：移民的斗争和“廉价”劳动力的结束，2003-2012年 | 149 |
| 早期的抗议活动 | 149 |
| 新的迁移模式 | 150 |
| 第二代与2010年的罢工浪潮 | 152 |
| 移民女性*的日常斗争 | 155 |
| 扩张：新常态和向外跨越，2012-2020年 | 156 |
| 债务、经济放缓和泡沫 | 157 |
| 对农民工和农民的持续压榨 | 158 |
| 对社会斗争的严格控制和镇压 | 161 |
| 转型期的性别影响和女权主义话语 | 163 |
| 维稳、监控和国家安全 | 167 |
|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 168 |
| 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竞争 | 170 |
| 香港危机 | 172 |
| 梗概：中国资本主义的巩固 | 174 |
| 结语 | 176 |
| 重述：对概念的重新审视 | 176 |
| 叙事矩阵 | 177 |
| 历史模式 | 179 |
| 左翼的立场 | 182 |
| 评估：历史机遇 | 185 |
| 中国的危机 | 185 |
| 不稳定的窗口 | 189 |
| 影响：对左派的教训 | 192 |
|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 193 |
| 左派宏大叙事的失败 | 194 |
| 左翼政治的主要方面 | 196 |
| 左翼战略的要素 | 202 |
| 延伸阅读： | 206 |

| | |
|--------------|-----|
| 精选网站: | 206 |
| 精选书目: | 206 |
| 参考文献: | 208 |

推荐序

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对共和国史的了解、思考以及进一步研究，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熟悉一些有影响力的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基准叙事”，比如官方正统叙事、自由派叙事、毛派叙事、托派叙事，等等。这些叙事每一种都可以说是大有问题，熟悉这些叙事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认同它们。恰恰相反，通过互相对照、比较这些叙事，可以为我们建立一个思考的“坐标系”，帮我们每一个人在“思维版图”中找到自身的独特定位，从而启发自己不断反思、重审：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怎样一种不同的、新的、与我们试图去探索的政治愿景相适应的共和国史叙事？

Ralf Ruckus近期出版的The Communist Road to Capitalism一书，其意义可能就在于以一种比较系统、易读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左翼共产主义”（left-wing communism）¹版本的共和国史“基准叙事”。在我的理解中，Ruckus这一叙事的核心观点有二：第一，列宁主义式的先锋队政党模式衍生出的政治经济结构与现代化设想，为中国从社会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渡提供了一系列结构性便利条件；第二，从社会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渡之所以会发生，主要不是因为某些政治集团的“腐化变质”或者外部政治经济压力，而是根本上被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下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群众反抗—政治镇压—政策应激调整”的反复循环所驱动的。

但可惜的是，虽然Ruckus汇总、掌握了大量二手研究材料，但因为功力所限，未能将这些材料完全整合进以上述两个观点为核心的叙事框架中。或者说，Ruckus所提供的叙事未能做到完全自圆其说。更进一步讲，上述两个观点本身也颇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基准叙事”——而且还是

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拒绝了“左翼共产主义”这个描述。——编者注

来自于一个相对没那么常见的派别的“基准叙事”——Ruckus的观点值得琢磨与玩味（something to think with），扩展了共和国史叙事的坐标系和可能性。就我个人而言，与这本书对话的过程让我开始思考许多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更加厘清了后续思考的方向。

最近，一些同学合力以极高的效率将这本书翻译为中文，实在是功德一件。这本书值得在中文社群获得更广泛的关注与阅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十三月评论

2023年2月7日

前言

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权威性书籍。他为自己做准备，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他学习了中文。他的脑子里的想法几乎爆棚。最后，这本书除了把他头脑中的速记誊写下来之外，已经完成了。他只需要一小部分不重要的问题的数据。“好吧，”年轻人一边读着他的大纲一边对自己说，“耽搁一天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最好明天就拿到那些数字，这样我以后就不必中断写作了。”那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年轻人的消息——现在他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还在查一些小细节和小数字。——彼得·德鲁克

2013年，PM出版社的拉姆齐·卡纳安(Ramsey Kanaan)建议我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已经花了大约十年时间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发展轨迹。我参与的大部分政治交流、写作、翻译和干预都涉及到当代阶级政治——移民、性别关系和工作场所冲突。我主要关注的是下层不满的工人、叛逆的女性²和左翼社会行动者³的经验。从这样一个草根的角度来写一个关于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的历史记录，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我收集了关于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材料，写了几篇与我想在书中讨论的主题有关的书评，并起草了一些概念和章节。然而，在

² 在women后面的性别星号(*)是指构建的性别特征。除了二元性别和异性恋性别概念之外，女性*指的是所有被描述为女性的人，以及所有有意选择女性性别表达的人(变性人*、跨性别者*或酷儿*)。使用带有星号(*)的男性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同时要记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顺性别男性不像女性*那样受到父权暴力和压迫。

³ 该网站上记录了大部分参与情况：<https://www.gongchao.org/>

这一过程中，我一再被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出版项目以及我在中国、波兰和德国参与的政治辩论和社会斗争所分心。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正在变老的“年轻人”，却还在寻找“一些小细节”，以及完成这本书的时间和机会。现在它终于完成了——一部跨越过去七十年的中国阶级政治的批判性历史学。

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左翼活动家和研究者来写这本书的。我不为学术机构或私人企业工作，所以我不必对那些可能为国家或私人雇主所不接受的意见有所保留，也不会受到学术时尚、竞争或分数计算的限制，因为这往往导致扭曲、重复和政治上可疑的学术文本。没有这些限制，我可以运用我在过去几十年间在西欧、东欧、北美和东亚的社会斗争和政治辩论中所学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在历史研究中，我主要使用英文文献，并辅以一些德文、中文和其他语言的文献。与工人、学生、学者和左翼活动家（其中许多人来自中国）的访谈和交流，帮助我了解了更多的近期事件。即使他们的见解和分析为这里的许多论点提供了依据，本书仍然代表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局外人观点，因为我并未在中国长大，也没有在那里定居。

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是紧张、有趣的，而且让人眼界大开，发现了惊喜和新的见解。我经历了阅读、提炼、起草、缩减、参考评论和重新编辑的几个循环。书中的部分内容乃至整个手稿都与二十几个朋友和同志讨论过，有些人有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经验，有些人则没有。由于政治话题在中国的敏感性，在这里提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极具风险的，所以我决定不提任何人。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他们的有益批评和支持，这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对本书的内容和不足之处负全部责任。

我写这本书——以及我每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的动机，是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剥削和各种形式压迫的愿望和决心，以及从以前为实现这一

目标所做的尝试中吸取教训(即使它们失败了)。某些左翼的观点和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简单描述激怒了我，例如，那些仅仅以意识形态为由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社会辩护的人，或者那些将社会民主作为中国在当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替代方案的人。

从批判性地回顾部分对中国历史的神秘和扭曲的左翼解释开始，我着手发掘不同历史阶段变革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并从下至上地重拾工人斗争、女性^{*}的反抗、农民起义、移民运动和左翼潮流的历史。为此，我采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把重点放在（重新）创造社会的社会关系上，而不是放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概念上。我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历史纳入一个连续的叙述中，并描绘出其中主要的断裂和连续性。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矩阵，根据社会动荡和政权的反制措施的动态，描述了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

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为那些已经熟悉中国历史细节的人写的，不如说是为那些有兴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写的。读者可以从导言开始，它解释了主要的概念和假设，并从理论上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斗争提出一个特殊的观点。然而，本书的设计也允许读者跳过导论，直接开始阅读历史章节，然后再回到导论中的概念部分。

如何在不涉及太多细节的情况下公正地处理复杂的历史轨迹，使本书的长度保持合理，叙述和分析易于掌握，这是一个挑战。必要的简短意味着有些部分是粗糙且尖锐的。我希望这能鼓励读者加入他们自己的见解和批评，并为集体讨论创造空间。同时，该书的政治信息是明确的和具有挑衅性的，因为对中国七十年历史的长期观察揭示了一个明显的历史趋势：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将其社会主义描述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实际上，它变成了通往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间阶段。换句话说，一场

旨在废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最终以重新配置阶级和性别的等级和冲突的社会主义告终，其后则进入了向资本主义变迁的道路。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治理下，社会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对于当前与未来的革命尝试，这意味着两件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毛派活动家或中共干部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之后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策略）；我们必须发展新形势的社会和政治的基层组织、支持与斗争，并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类似尝试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在现在和将来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

拉尔夫·拉库斯，2021年2月

导论

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历史学著作，描述了社会斗争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应。该书涵盖了以下时间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70年代中期以后的过渡时期，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的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时期。我并不打算将这种探究仅仅作为智力活动或历史描述。本书以左翼和底层为重点，旨在激发当前关于如何推翻阶级统治和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父权制和其他形式压迫的辩论。

本导论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调查的出发点，并讨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左翼的立场。第二部分介绍了本书的基本问题和假设，并概述了调查的范围。第三部分指出了在此背景下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模式。它介绍了用于描述斗争和反制措施的动态的具体历史分期与叙事矩阵，并对以下各章进行了概述。

断裂、连续性与左翼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断裂和延续是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历史变革，而中国共产党却一直在执政。究竟是什么产生了断裂并导致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如何做到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幸存下来的？这是左翼讨论中具有争议的问题。

初步观察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个国家被殖民占领、区域隔离、日军入侵和内战搞得四分五裂。新中国建国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穷人，在农村生活和工作。这个新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很小，其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其主要的社会主义盟友苏联。70年后的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从事服务业和城市工业，该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拥有世界工业产能中的很大一部分，占据全球贸易的主要份额，并已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见表1）。

| 年份 | 人口（以百万计） | 农村/城市人口占比（%） | 国内生产总值（以现在的十亿美元计）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现在的十亿美元计） | GDP占全球的份额（%） | 占全球贸易的份额（%进口/出口） |
|------|----------|--------------|-------------------|---------------------|--------------|------------------|
| 1949 | 542 | 89/11 | 31 (1952) | 54(1952) | 0.7 (1950) | 0.6/0.9 (1948) |
| 1956 | 620 | 87/13 (1953) | 40 | 64 | 0.6 (1955) | 1.2/1.6 (1953) |
| 1967 | 755 | 82/18 | 73 | 97 | 3.2 | 1.0/1.2 |
| 1978 | 956 | 82/18 | 150 | 156 | 1.7 | 0.9/0.8 |
| 1989 | 1119 | 74/26 | 348 | 311 | 1.7 | 1.9/1.7 |

| | | | | | | |
|------|------|-------|-------|-------|-------|-------------|
| 2001 | 1272 | 63/37 | 1339 | 1053 | 4. 0 | 3. 8/4. 3 |
| 2012 | 1351 | 48/52 | 8532 | 6317 | 11. 4 | 9. 7/11. 0 |
| 2019 | 1398 | 40/60 | 14348 | 10262 | 16. 4 | 10. 8/13. 1 |

表1:1949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发展数据1949–2019⁴

在其存在的七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几次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向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⁵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转变，尽管这一转变是逐步的。党本身也经历了各种转变，其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组织，继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变为一支造反的农民军队，又在50年代变成一个官僚的社会主义机构，最后在80年代及之后成为重组的统治阶层的核心。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蜕变过程中，其极具适应性的领导层始终处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中心，规划着国家的进步和发展⁶，并处理和压制了来自下层的社会和政治动荡。⁷

⁴ 这些数据来自不同来源，包括世界银行(2020年10月13日访问<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和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10月13日访问<http://www.stats.gov.cn>)

⁵ 在本书中，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特定历史形式。这个术语在这里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用于政治或理论的理想型。

⁶ 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或现代化等术语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遵循的是生产主义和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概念。它们在这里被用来描述政权的动机。其他术语，如解放、少数民族、民主或知识分子，也有缺陷或容易产生误导。为简单起见，在这里省略了引号。

⁷ 为了避免对阶级的狭隘理解，即把阶级作为一个单纯的社会学或生态学范畴，作为一种所谓的同质力量，或者作为一个特定的工人或资本家群体的代表。在以下各章中，社会斗争或遏制措施大多用来自上层(自上而下)和来自下层(自下而上)的短语来补充，作为对不同社会行为者的阶级斗争的更开放的描述。根据不同的情况，自上而下包括私人和国家行为者，而自下而上则包括工人、农民、女性*和移民。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庆祝建国70周年时，称赞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是一个连贯的经济和政治走向成功的故事。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的各个阶段——包括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被简单地略去了。在70年代末被正式推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的延续。⁸“不忘初心”在今天依旧是党的战略的口号，现任党的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同时，要借鉴社会主义的遗产。⁹

左翼对中国历史的立场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的左翼圈子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轨迹。¹⁰这些争论是由断裂和转型形成的，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去斯大林化，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全球的影响，以及80和9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市场改革和对天安门运动的军事镇压等事件的全球影响。

近年来，中国境内外不同的左派人士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发展往往持有相互矛盾的观点。他们尤其对如何界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和政治体

⁸ 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日报》2019年9月30日，2020年11月8日访问，<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9/30/WS5d9c5502a310cf3e3556f378.html>；吴敬琏，“对中国70年经济演变的搜魂”，财新，2019年10月14日，2020年11月8日访问，<https://tinyurl.com/y6hx8ou3>。

⁹ 曹德胜，《习近平敦促中共党员保持长征精神，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日报》，2019年8月19日，2020年10月20日访问，<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8/19/WS5d599bcba310cf3e35566606.html>；

Christian Shepherd, “No Regrets: Xi Says Marxism Still ‘Totally Correct’ for China,” Reuters, May 4, 2018, 2020年6月20日访问，<https://tinyurl.com/y4d5v5rj>.

¹⁰ 本书中使用了左派或左翼的广泛定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不平等和特定社会中的代表权持批评态度的政治观点被认为是左翼，无论作者是否同意这些观点。拉尔夫·拉库斯的《中国的左派》（伦敦：冥王星出版社，即将出版）将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不同左翼潮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制问题有不同意见。有四种左翼的立场比较突出（见表2）。第一种立场可以概括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它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或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它认为70年代末改革后的中国仍是社会主义的延续。根据这一立场，在改革前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是共产党的统治，国家行政部门在很大程度上的控制着经济、某些福利政策，以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帝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的任何变化都是务实的或表面上的调整，因为中国共产党据称仍在走向共产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重要对手。支持中共领导的毛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马列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右翼分子）都持同样的立场。

| 立场 | 1949–1978 | | 1978至今 | |
|----------|-----------|------|--------|------|
| 第一种：一种制度 | 社会主义 | | | |
| 第二种：一种制度 | 资本主义 | | | |
| 第三种：两种制度 | 社会主义 | | 资本主义 | |
| 第四种：两种制度 | 过渡时期 | 社会主义 | 过渡时期 | 资本主义 |

表2：左翼对1949年至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看法

第二种立场可以说是“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它把1949年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解释为另一种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共的领导没有废除工资劳动和剩余劳动力的提取、货币和信贷、自上而下的管理以及工厂制度，它试图只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发展制度（从而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改变了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关系，但仍然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延续。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等都赞同这一立场。¹¹

第三种立场可以说是“两种制度=先是社会主义，后是资本主义”。它与第一种立场相似，因为它将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特点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退化”形式。然而，它认为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是一种历史性的断裂，这使其与第二种立场相类似，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从（堕落的）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始作俑者，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被中共领导层中所谓的走资派出卖了，他们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故意在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目的是走向资本主义。今天，这一立场得到了中国许多的反对派毛主义者的认同。¹²其他人则指出了中国的阶级矛盾，并将转型归因于来自下层的社会压力，迫使中共领导层进行改革。根据这种分析，改革试图(通过调整)

¹¹ 例如，查理·霍尔，《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伦敦:Bookmarks, 1991年)

¹² 例如，见李星，“重温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评论》1, 第1期（2001年秋季）。137–165, 2020年10月13日访问，<https://cup.cuhk.edu.hk/chinesepress/promotion/China%20Review/5-Li.pdf>; 李民骐，《中国与21世纪危机》(伦敦: Pluto Press, 2016); 关于后者的批评，拉尔夫·拉库斯，“危机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部分：李民骐论中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即将崩溃，”Sozial.Geschichte Online 19 (2016) :115–49, 2020年11月7日访问，<https://tinyurl.com/y5yjz35l>。

保持社会主义，并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但随后，他们释放了资本主义力量，意外地把这个国家推向了资本主义。¹³

本书增加了第四个立场，作为我进行探究的初步假设。它与第三种立场一致，即把70年代中期以前的某一时期定性为社会主义，把70年代中期以后的某一时期定性为资本主义。然而，它强调了分别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巩固的两个过渡时期。第一个过渡时期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社会主义机构和结构已经建立。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其特征是一种不稳定和渐进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与部分重塑，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过渡时期的分析，可以更细致地理解共产党政权与工人、农民、女性*、青年和移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对抗，这些对抗塑造了这些过渡与它们的后果。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回顾并重新评估这些左翼的立场及其相互冲突的观点。

分析的重点

本书着眼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改革前、改革中和改革后的时期。它主要关注的是：一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中共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剥削、压迫和排斥方式；二是各个阶级主体自下而上的反抗、组织和斗争形式。第三，性别和出身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本节

¹³ 关于这种特殊立场的例子，见吴一庆，《边缘的文化革命：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将介绍启动这一调查的问题和假设，并讨论了有关分析的范围和焦点的选择。

问题与假设

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正式启动改革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时期是分析的核心。我们特别关注连接和切断这些时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关键问题包括：在各自时期出现或巩固了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哪些社会行动者或阶层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使用了什么形式的社会抗议？中国共产党政权如何应对社会动荡或其他挑战，包括领导层内部的纠纷？社会和政治冲突引发了怎样的调整和适应？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情况下，社会动荡和政权的反制措施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断裂？

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过渡时期以及随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意味着要分析实际上建立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是否（如果，那么以何种方式）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结构和父权关系的替代，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会发生重大社会冲突，以及中共领导层如何应对这些冲突。一个初步的假设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之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女性^{*}所期望的社会主义，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参与了革命组织。它重新建立和配置了社会分工，最明显的是城市和农村工人之间，社会主义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如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改革后的阶级和性别划分以及由中共领导人组成的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斗争，并最终引发了政治斗争。中共政权对动乱的反应是采取遏制措施和改革，以恢复其统治，这种模式在随后的时期也很明显。改造后的阶级和性别划分，以

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引发了新的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斗争和最终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政权用遏制措施和改革来应对动荡，以重新稳定其统治，这种模式在随后的时期也可见一迹。

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过渡时期(或第一次改革)，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重大的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哪些特征促成了向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最终是什么力量促成了全面和最终的过渡。一个初步的假设是，最初的改革基本上是前20年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的结果。其目的是缓和这些冲突和危机，从而维护中共领导层的统治。到那时为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计划经济运行的，国家控制着某些经济决策和过程，而改革逐渐引入了扩大的私营部门，并给市场力量以更多的回旋余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过渡相对顺利，因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的核心特征，其中包括剩余生产和积累、剥削、泰勒制工业、分散的劳动力、性别分工和等级化的劳动制度。实际上，社会主义为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铺平了道路。改革旨在确保中共的统治，它释放了发展和阶级重组的特殊动力，结果终于导致了向资本主义的最终过渡。

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前资本主义（或第二次改革）时期，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构成了前一个（过渡）时期的结束和这个资本主义时期的开始？哪些特征使其成为资本主义？还有哪些因素使得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目前的制度成为可能？社会关系在这一时期是如何转变的？一个初步的假设是，转型随着90年代中期国有工业的重组和部分私有化而结束。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于旧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对这种重组的抵抗和农民对农业资本化影响的斗争。在这里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因为来自上层的结构性调整的努力和来自下层的对结构性调整影响的防御性斗

争相重叠。一些转型过程，例如农业的转型过程，当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然而，这里的论点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制度的整体特征符合资本主义的标准，因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积累和创造利润，因为中共领导层和其他“精英”组成了一个重新组合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他们占有了通过剥削工人和农民而产生的大部分财富。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转型为以利润为导向的股份制公司，引入了新的国家计划机构，国有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改变了剩余生产和管理的形式，但没有改变总体目标：经济效率、盈利能力、稳定的劳动关系和维护阶级统治。改革成功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首先，是因为它们可以建立在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基础上，其次，因为所谓的全球化，在拉丁美洲、亚洲和东欧建立了新的工业生产集群和供应链，中共政权利用了这一点，为吸引外国资本和发展中国经济提供了历史机遇。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同的无产阶级主体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再次）按照性别、出身、受教育程度或技能而分裂。

调查的方法和范围

在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对抗及其产生的断裂和延续。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使得限制调查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关注历史轨迹的特定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只涉及1949年至今的时期。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提到以前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清帝国统治下的（半）殖民化，1911年后的民国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日本军队的侵略，以及国共内战在这里都没有被研究。本书于2020年秋末完成，因此所涉及的最新事件与Covid-19大流行以及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有关。

空间上的重点主要限制在整个中国。考虑到全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当然很重要——例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工业中心、东北的“锈带”地区或新疆等西部省份之间的差异。然而，本书不会对区域因素和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全球背景和世界体系的发展，例如社会主义世界或全球经济的发展，将在它们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的程度上加以讨论。¹⁴

在内容上，该书采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遵循社会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斗争与政权对抗或改革的相互作用。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如增长和危机的周期，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变化，以及政治机制和结构，包括国家机构、法律框架和中共的等级制度。然而，这一叙述避免了对核心政治人物的狭隘关注，例如，对所谓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改革家”邓小平或“领导核心”习近平。同样，这一分析也没有过多地涉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人或反对派力量的意识形态立场。重要的是要注意包括中共党员和左翼异见人士在内的行为者对特定问题的写法或说法——但仅限于与事实事件和发展有关的内容。

本书从三个角度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关系。首先，本书使用阶级和阶级构成的概念来描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占有一定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并发展出特定的行动和组织形式。中国统治阶级的构成和转变特别有趣，因为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动员。从50年代开始，它巩固为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在70年代开始的转型中重塑自己，并在90年代成为重组后的资本主义阶级的一部分。在这一时

¹⁴ 本书不打算详细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会产生的环境危机。

期，统治阶级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改革的方向和深度，但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他们基本上保持了团结。¹⁵

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了解到他们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和权力。他们从来不是同质的，而是由不同的城市工人、农村工人或女性*农民工群体组成，这些群体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行动往往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向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施压，要求物质上的改善或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他们捍卫自己的利益，反对其他受压迫的社会群体，例如，采用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形式进行“划界”。¹⁶

其次，本书探讨了中共领导层如何创造和利用基于空间来源的各种边界，即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界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世纪50年代末推出的臭名昭著的户口规定，将每个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或“非农业”两类户口，此外，还将他们约束在某些地方（城市或村庄），这些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因省或县的不同而不同。这些规定是为了遏制人口迁移和社会流动，并维持一个条件相对较差的大多数农村人口和一个具有一定福利权利和较好条件的少数城市人口。从80年代初开始，户口就 被用来系统地歧视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城乡差距、不同类型的

¹⁵ 这也是为了批评其他左翼对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描述，这些描述使用中共领导人的引文、政治纲领或意识形态声明来正面或负面地神秘化毛泽东的遗产，从而扭曲了历史叙述。关于左翼神秘化的讨论，见Gottfried Oy和Christoph Schneider，“Destruktion und Intervention von den Möglichkeiten der Geschichtspolitik,”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14 (2014):97–119，2020年10月13日访问<https://tinyurl.com/y2491hb8>。另见莫里斯·迈斯纳关于书写历史的评论。“历史……必须主要根据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所说的来写。……然而，目标和意图在历史上并非无关紧要，当然也不是在道德上无关紧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次修订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294。

¹⁶ 关于工人行动者的“划界”形式，见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0–25。

公民身份、包容和排斥的社会实践，以及对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具体剥削，将贯穿全书。¹⁷

第三，本书着眼于中国父权压迫的具体形式和女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工作——或家务劳动——一直是剥削性经济的中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解放主要意味着女性*被大量纳入雇佣劳动体系，因此她们的劳动能力可以在有偿和无偿（生育）工作中被剥削。女性*的斗争改变了毛主义父权制时期的性别关系结构，也改变了过渡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性别关系结构——一个矛盾的结果是，它为（一些）女性*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创造了与之适应的或新的父权制形式。¹⁸

阶级、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分化和压迫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女性*或不同户口的人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运动中发挥着重要而具体的作用。本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事件，每一章都有特定的章节，重点关注特定时期性别形式的压迫和女性*的斗争或农民工的动乱。

¹⁷ 对于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共领导层对少数民族的制造和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人们关注得较少。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侧重于确保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但对具有特定法律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定义也为同化、控制、监视和镇压的残酷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和之后，例如，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云南等省。甚至中共对少数民族的定义和命名也是有争议的。关于中国引进和处理“少数民族”政策的情况，见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亚洲研究杂志》第53期，第1号（1994年2月）。92–123, 2020年10月20日访问,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4c68/f8eb485_08187c96ece69cb3585acd2f849bb.pdf。

¹⁸ LGBTIQ+群体的情况和斗争以及他们独立的运动没有被详细讨论。关于这一点，见Loretta Ho Wing-Wah,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0) ; Bao Hongwei,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8).

掌握共和国历史

上一节介绍了本书使用的问题、假设和观点；这一节则将介绍叙述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即历史模式（阶级斗争）和基于这些模式的叙述矩阵的概念。该矩阵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轨迹系统化和可视化，并为本书的结构提供了基础。本节的结尾对本书各章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历史模式

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与某一特定主题或地点有关的事件的叙述；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对过去事件的研究或记录，特别是某一时期、国家或主题的事件；对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的记录，通常包括对其原因的解释。同义词：年鉴、纪事、记录、故事、传奇、解释。

模式是一种自然或偶然的配置；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机构的特征、行为、倾向或其他可观察到的特征的组成样本；是基于各组成部分预期的相互关系的可识别的连贯系统；是一种频繁或广泛的发生；是某事发生或完成的重复的可识别的规律方式。同义词：秩序、计划、系统、方法、安排、顺序。¹⁹

本书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叙述了中国的历史，并试图找出一些方面来帮助当前的社会行动者和左翼运动加强他们的分析，重新聚焦他们的目标，准备迎接挑战，避免政治错误。对于每一个历史阶段，本书都试图识

¹⁹ 选自三本词典的含义和同义词，2020年10月14日访问，<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 和<http://www.collinsdictionary.com>。

别和理解自下而上的社会斗争和自上而下的政权反应的动态。它着眼于这些冲突的历史年表，并试图衡量和辨别这些冲突进化与再次发生的“模式”，以此来分辨出什么是真正新颖的情况。²⁰历史的发展是基于许多因素、结构条件、政治机构和突发事件的，因此过于复杂，无法完全理解和预测。既定的模式揭示了每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性质。它们帮助我们做出政治判断和决定，并可用于确定未来的可能性、机遇和选择。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连续统治期间，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的不满、动乱和斗争一直存在。本书认为，无产阶级或农民的动乱的反复发生，以及政权随后的反制措施和实施结构改革的尝试，都产生了重要的断裂。这些断裂最终导致了剥削、压迫和歧视形式的深刻变化，但它们并没有结束中共的统治。

不同利益所导致的动乱，统治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反复冲突，甚至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过去的70年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一直对提高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效率感兴趣。其主要目标是在国内加强和巩固统治，并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自1949年以来的每一个十年，自1949年以来的每一个十年，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剥削性和压迫性，以及中共促进发展和提高效率的努力，都引发了不同阶级行动者，包括农民、工人、女性*、农民工或学生的大规模动乱、罢工、示威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动荡。社会动荡有不同的形式，从相对较短的运动或事件，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到整个周期的斗争，如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民主运动或21世纪00年代后半期的农民工罢工浪潮。中共政权采取了即时的或延迟的遏制措施，以制止动乱，巩固自身的合法

²⁰ 西尔弗：《劳工的力量》，第25页。

性，稳定其统治。这些措施包括镇压、让步和拉拢，使用的力度和组合各不相同，有时是正式宣布并且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起来。一些措施被频繁使用（尤其是镇压），其他措施则是零星、极少或部分使用的（如让步和拉拢）。

动乱和遏制导致或构成了断裂，即历史的转折点，这标志着统治阶级在一定时段内反复推行改革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些改革包括加大力度推动集体化和加强劳动力动员，调整工业结构和经济体制以发展生产能力和提高效率，以及改革国家结构。大多数改革最终只是“修补”，因为它们只是成功地“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安排了危机”，而没有提供“长期和稳定”的解决方案。²¹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改革确实导致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例如大跃进（1958–1961年）或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但它们迟早会产生新的经济危机，最终由相同或其他的社会行动者产生新的社会动荡。国内事件的进程，以及针对遏制和改革的效果的社会动荡的时间、程度和形式，也受到领导层冲突的影响，包括派系冲突，通常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和基于个人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在每一个转折点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建设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开始的时候，在70年代中期开始转型和改革的前后，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转型期和资本主义时期开始的时候。

全球因素和发展也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如50年代中期的去斯大林化，1956年匈牙利和1980年波兰的社会动荡，以及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相对应，这

²¹ 同上，第39页。贝弗里·西尔弗用“修复”一词来描述资本试图通过产业转移（“空间修复”）、使用新技术（“技术/组织修复”）或投资于新产品（“产品修复”）或金融（“金融修复”）来解决盈利能力和控制的危机。

些国家的人民动员和游击战争推翻了殖民占领者。文化大革命与许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青年和工人运动大致吻合。²²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转型预示着苏联的开放和改革，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是不久之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起义的先驱。

在中国，社会动荡与政权遏制和改革的模式在过去七十年中反复出现。它们形成了历史循环，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断裂。为了将模式、周期和断裂可视化，本书使用了一个特定的叙述矩阵。

叙述矩阵

叙述是对一系列事件的故事或描述；是解释或理解事件的特定方式；是介绍或理解某种情况或一系列事件的方式，反映和促进特定的观点或一套价值观。同义词：故事、报告、历史、细节、解释、声明、传说、纪事、回顾。

矩阵是数字、符号或字母在行和列中的排列，用于解决数学问题；类似于数学矩阵的东西，特别是元素的矩形排列成行和列；诸如社会或系统等事物发展和成长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同义词：结构、模式、表格、方案、网格、光栅。²³

²²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通常被称为“1968”的工人和学生社会运动和起义的全球浪潮与中国并不那么相关，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文化革命，与“1968年”相关，因为对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特别是文化革命的看法有些神秘的毛主义团体、政党和运动，在全球许多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阿里夫·德里克，“The Third World,” in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eds.,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8), 295–317。许多毛派政党和运动在70年代达到顶峰，但在一些国家，它们继续发挥着政治作用，例如，在秘鲁、尼泊尔、印度和菲律宾。

²³ 选自三本词典的含义和同义词，2020年10月14日访问，<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http://www.merriam-webster.com>、<http://www.collinsdictionary.com>。

本书采用了一个历史学的或叙事的矩阵作为描述工具，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矩阵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社会斗争和政权对策的历史周期的可视化。然而，矩阵中显示的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方面是核心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连续性——中共统治、威权国家、剩余榨取、劳动等级制度、城乡划分、移民制度和父权制（见表3，第一列）。在中心位置的是历史断裂（或不连续）的序列，它构成了中国历史分期的基础，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资本主义四个时期的区分（第二列）。后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资本主义——都包括上述模式的两个周期，即挑战中共统治的社会动荡阶段，然后是党为应对挑战而采取的政权反制措施（第三和第四列）。

矩阵中显示的时期划分简化了复杂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主要的社会斗争和政权的反制措施或改革相互重叠，因此无法对不同时期和次时期进行明确的划分。这尤其涉及到第二次转型和资本主义时期。该矩阵也未能表明，当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形式和程度发生变化时，斗争和对策的模式（和偏差）发生了变化。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并逐渐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和全球经济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此外，虽然这种分期有助于跟踪动态和转折点，但事件的顺序不应该被理解为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因为结构、机构和偶然性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乱将中共政权带到了深渊的边缘，如果中共政权没有成功地动员人民解放军对抗社会叛乱，那么结局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 | | | |
|----------|-------|--------------------|----|
| 渐进变化的连续性 | 断裂-时期 | 模式/周期=动乱-遏制 /改革 | 描述 |
|----------|-------|--------------------|----|

| | | | |
|---|------|--------------|--------------------|
| 中国共产党统治 +威权国家 +剩余榨取 +劳动等级制度 +城乡划分 | 过渡时期 | 1949-1956 建设 | 新的阶级分化、毛主义父权制和军管国家 |
| | 社会主义 | 1956-1957 中断 | 罢工和公开批评 |
| | | 1958-1965 加速 | 大跃进和四清 |
| | | 1966-1967 造反 | 文化大革命和激进批判 |
| | | 1968-1976 修复 | 军事管制和派系斗争 |
| | 过渡时期 | 1974-1980 不满 | 社会斗争和民主运动 |
| | | 1976-1989 改革 | 转轨与危机 |
| | | 1986-1989 抗议 | 天安门广场运动 |
| | | 1989-1999 恢复 | 镇压、改组和经济崛起 |
| | 资本主义 | 1993-2005 动乱 | 农民反抗和国企工人抗争 |
| | | 2000-2010 巩固 | 和谐社会、繁荣与危机 |

| | | | |
|-------|--|--------------|----------------|
| +移民制度 | | 2003-2012 罢工 | 农民工反抗和廉价劳动力的终结 |
| +父权制 | | 2012-2020 扩张 | 新常态和向外跃进 |
| | | | |

表3：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七十年的叙述矩阵

本书章节

本书的核心由四个历史章节组成，反映了所描述的叙事矩阵——社会主义建设(或第一次转型)、社会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资本主义时期。本文的第一个层次包含了上面的前言和最后的结语，着重介绍作者的动机和本书的目的。导论和结论，即本书第二个层次，介绍和评估了书中采用的假设、方法和工具，并讨论叙述和分析结果的政治含义。

以下是核心章节的总结，作为一个快速的历史概述，并简要介绍了结论和结语。第一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过渡时期——1949年至1956年，主要从阶级、性别和国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建立在中央计划经济、城市国营或合作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威权社会主义机构的演变与农民、工人和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新阶级等级的形成相吻合，也与重新配置的性别制度相吻合，其中包括改善女性*处境的法律框架，但也包括父权制家庭秩序的延伸。

第二章是社会主义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与以下各章一样，它追踪了动乱和遏制或改革的特殊模式。社会主义时期开始时，社会上对国有化和集体化影响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随后中共领

导层发起了一场运动，即所谓的百花运动，允许人们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之后，政权被这些批评出乎意料的范围和深度所激怒，于是发起了反右运动，并开始改革，通过大跃进（GLF）重新启动社会主义经济来“解决”这一状况。后者以灾难告终，党的领袖毛泽东被降职，部分政策（重新）转向，以及随之而来的新一轮的镇压。接下来是社会主义最动荡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是为了让毛泽东重新掌权，并为社会主义计划重新动员群众。然而，它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起义，脱离了党的控制。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求该国所谓的人民解放军（PLA）来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动乱。事后，毛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耗尽了能量，随后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派系开始为拯救社会主义的适当的生存战略而争斗。

第三章涵盖了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过渡时期，再次审视了中国动乱和遏制或改革的模式。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共领导层中的一批“改革派”在派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各种“争取民主”的民众斗争浪潮——包括示威、地下文学和来自下层的公开批评——破坏了政权的合法性。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改革派”领导层最终镇压了反抗，同时利用其中的一些要求来推动经济改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逐渐改变了经济格局、阶级和性别关系，以及政治结构。改革也导致了干部腐败、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安定，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不满。这最终在1989年的所谓天安门运动中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召集军队镇压这一运动。

1992年后，在领导层改组和重新巩固党的统治后，改革被正式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设法与全球资本的各个部分结盟。当后者在新的经济特区为世界市场投资建厂时，中共政权提供了该国的廉价劳动力、社

会主义留下的经济基础设施，以及由专制国家机构保证的社会相对稳定。这一“交易”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即全球消费品生产的中心。与此同时，“铁饭碗”——以前给予中国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福利和保障——被砸碎。大量的这些工作单位，现在被称为国有企业（SOEs），在90年代中后期被重组、缩减、私有化或关闭，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改革，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束。

第四章侧重于90年代末开始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动乱和遏制或改革模式。国有企业工人发动了大规模斗争，反对结构调整及其影响，但是，尽管当局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们还是无法阻止改革。与此同时，农民组织了一波又一波的斗争，反对猖獗的干部腐败、高税收和土地窃取。父权制度在改革过程中被重新配置，而新的女性*斗争形式试图为女性*自主开辟更多空间。中共领导层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扭曲和不满做出了反应，在21世纪初，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主要是表面上的福利改革和物质上的让步，并威胁任何企图扰乱社会和平——即所谓的和谐社会——的人。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秩序，中国经历了更大的生产和出口繁荣。在2007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使该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然而，从2003年开始，新工业区、建筑工地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地举行罢工，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些斗争在2010年的罢工浪潮中达到高潮。面对危机和斗争，政府旨在重新平衡经济并使之升级。2012年后，在新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试图巩固党的统治，并开始了反贪污运动，以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保持一致，使国家治理更有效率。从2013年开始，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进一步的经济对外扩张。这种扩张动力导致了与中国统治阶级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冲突，

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在2018年宣布的所谓贸易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挑战，包括与21世纪10年代中期经济放缓有关的社会不满情绪、2019年香港的大规模起义、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政权在处理国内不满情绪时越来越缺乏灵活性。

本书的结论总结了分析工具——叙述矩阵和历史模式——的应用，并重新评估了在引言中所描述的左翼对中国历史的不同立场。它审视了当前的形势，尤其是中国的危机和全球的不稳定，为社会动员和左翼运动打开了一个历史窗口，可以用来推动根本的变革。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左翼的启示和教训，描述了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和社会民主的左翼宏大叙事的失败，概述了替代方案的要点，并列出了能够帮助推翻剥削和压迫的战略的要素。

结语回顾了本书出版背后的意图，并邀请读者评论、批评和加入辩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轨迹对国内和全球的左翼以及未来的革命尝试有着重要的启示。本书旨在揭示这种尝试的条件和机会，并激励读者参与社会斗争、开始自己的探索和进行团结的行动。

第一章：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发生的社会斗争、革命动员和军事冲突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推动了自己的政治工程，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技能。20世纪40年代，在其内战期间控制的地区，以及在1949年“解放”后的全国上下，中共政权摧毁了部分先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并（重新）利用剩下的结构。经过数十载战争和破坏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试图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能够正常运作的政府，以振兴经济，并改善工农户的生活条件。它遵循了其主要的国外支持者——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模式。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尽管旨在创造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平等主义社会，但这些建设实际上却很快带来了新的等级制度、排斥、剥削、性别歧视和威权统治。

解放前后

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最终成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领导者的大约30年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内部冲突、镇压、失败与胜利所引起的各种突发事件。党的领导层最终夺得政权后，直到1956年才使其统治稳定下来，并全面实施了遵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革命动员与战争

工农群众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和愿望，推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动员。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²⁴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

²⁴ 共产国际也被称为第三国际。它存在于1919年到1943年，由苏联共产党控制。

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初，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里，它却主要将城市工人视为“革命先锋”。然而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于1927年放弃工人所在的城市地区。在已经解放的农村地区重新集结后，党中止了以往只在城市工人中建立意识形态基础的方针，并在农民中建立了新的群众基础。由于军阀势力和国民党的进一步进攻，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二战期间，在共产国际的施压下，中共领导层不得不暂时与国民党结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的军队再次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并于1949年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共同的革命意愿，以及他们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及国内封建、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的坚定决心，中共就不可能取得这场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威胁。最终，大多数国民党的领导人、军队和支持者逃到台湾，并长期陷入流亡状态，再也没能返回大陆。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继续完成了国家的领土统一，消除了国土之内的残余抵抗力量，确保其对边疆领土，如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初和50年代末收复新疆和西藏的统治。

随着战争状态的持续，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从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中生存下来是另一大挑战。最初，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被认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当朝鲜战争(1950–1953年)爆发后，作为其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力度。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与朝鲜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并肩作战，对抗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部队。战争最终没有签订和平条约，以僵局告终。朝韩两国的边界与战争开始前基本相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通过参与朝鲜战争获取了国家重建所需的资源。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之间新集团的对抗——或称冷战——的一部分，西方大国继续与中国政权对峙，这将塑造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区域发展轨迹，直至80年代末。

几十年破坏后的挑战

在1949年掌权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由一个带领农民军队打赢内战的领导者，转变成一个有能力管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行政机构。中共的新政权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国家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要么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很快就因其在旧政权中的角色而被降职、惩罚或处死。由于几十年的反殖民战争和内战，大部分经济基础设施已经被破坏。数百万农民正在尽力寻找新的营生以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村庄已经被摧毁。

中共领导层正努力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与管理部门，以重组经济，为广大工农提供基本的营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期里创造了相当可观的GDP增长率。经济发展改善了许多工人和农民的社会条件——至少，与他们在旧政权下的条件相比得到了改善。这包括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卫生保健、收入平等及识字率方面的显著改善²⁵。

²⁵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chapter 10.

遵循苏联模式

上述的所有措施都有助于稳固中共的统治，但党未能履行最初的承诺，建立掌握在工农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国共产党建立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启动发展时，它遵循了苏联模式和马列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将其作为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过渡阶段——然而它从未能实现（共产主义）。根据马列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需要经历封建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才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在分别于1917年和1949年进行革命之后，不得不弥补它们封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是为了通过工业化努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赶超，达到像英国或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前所取得的成就。工作单位和公社产生的经济剩余，被交由社会主义管理者和国家规划机构进行积累与再投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在模仿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它只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特征。这种积累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由私有企业的利润驱动，而是由政府机关及其领导干部所规划、调控和鼓励的特定发展目标驱动。然而，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们和国家规划机构并没有完全按其计划那样调控积累、生产、分配和消费。托比亚斯·滕·布林克(Tobias ten Brink)写道：“尝试协调分散、无政府状态的活动，而非全面地、前瞻性地和有计划地进行调控，是毛主义阶段的特征。”²⁶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取代市场，而是在某些领域模仿它（如劳动力的分配），而在某些领域直接利用它（如某些消费品的分配）。

²⁶

Tobias 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11 (R. R. 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际上采用的是实现经济复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战略，这类似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使用过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起，这些战略也被南半球的非殖民化国家实施²⁷。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与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国家干预和私人项目、中央规划和市场的成分在积累组织中所占的具体比例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共有着重要的结构与过程：或多或少的国家专制统治，剩余的提取和积累模式，用于控制工人和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货币的使用与雇佣劳动，阶级制度，城乡对立，对流动劳力的剥削与歧视性的移民制度，以及父权制与性别化的劳动分工²⁸。下面我们将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时期，以及在改革后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期间，这些共同或相似之处是如何促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

新的阶级划分

中共的新政权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模式，废除了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然而，由此实际产生的社会主义——被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却并非中共所承诺建立的平等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新产生的一系列新的阶级划分和剥削压迫的基础之上。

²⁷ 并非巧合的是，社会主义赶超战略所具有的要素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太大不同，后者通过公共投资和专制政权下的国家调控来组织积累过程。例如19世纪晚期的德国，或20世纪下半叶的韩国、巴西和新加坡。

²⁸ 这些方面中的大多数将在下面的章节讨论，但不涉及对技术问题的具体讨论。马列主义者（以及其他左派）的革命观点主要重视改变生产力的控制权，为的是将工厂及其他工作场所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移交给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者。在苏联或中国的情况下，技术和工作组织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从被视为中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得到或复制来的。然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使用的核心技术是福特制（采用装配线与机器生产来提高工作速度和效率）或泰勒制（将工作按不同的步骤划分，并控制工人的绩效）的技术。使用这些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工人，限制他们对劳动过程的管控，并迫使他们更努力和快速地工作。这些技术的性质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管理者的统治下依然存在。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请参阅Raniero Panzieri,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1961), in Phil Slater, ed.,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London: Ink Links, 1980), 44–68.

压榨农民

一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尽力利用了一些现存的（资本主义）技术和生产设施，这些技术和设施是曾经的日本占领者在北方留下的，或是西方实业家在上海等城市留下的。为了支持中共最初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苏共政权向其支援了工程师与工业设计蓝图，但新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劳动力（或资本和劳动力）必须由中国自己供应。为了积累这些经济资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计划包括将农业生产的剩余投入到城市工业中，例如，通过实施降低粮价政策或农业税收，以及重新分配由此产生的国家资金²⁹。在这种原始积累的形式中，剩余从绝大多数人口——农民和农村工人——中榨取出来，以资助城市的发展，养活少数城市工人：用莎莉·萨格森的话来说，“允许用农业来哺育工业”³⁰。

农村的结构重组始于一场血腥的复仇，这是长久以来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剥削者展开的报复，由被派往这些村庄的中共积极分子发动或支持。中共政权实现了其革命性的承诺之一，进行了土地改革（1950–1953年）。富农、地主和“反动派”的土地财产被没收，分发给贫农、农村工人、中共积极分子和复员士兵，其中许多人都是来自贫农阶级。在此过程中，大约有2000万名富农和地主受到惩罚、流放、监禁或杀害。³¹随

²⁹ 有关粮食价格政策的讨论，请参阅 Terry Sicular, “Grain Pricing: A Key Link in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Modern China* 14, no. 4 (October 1988): 451 – 86.

³⁰ Sally Sargeson, “The Demise of China’s Peasantry as a Class,”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14, issue 13, no. 1 (July 2016): 3, accessed January 24, 2021, <http://apjjf.org/2016/13/Sargeson.html>. 1949年以前，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原始积累呈现出一种更传统的模式，因为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因贫困而被迫在新的（城市）工厂工作。1949年以后，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但在6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并保持稳定。而在第三阶段——自1978年开始，并于90年代后开始加剧——工业化、移民和无产阶级化在国内许多地方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提升（见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各个阶段，这些进程都是由国家政策推动的。

³¹ Cheng Chu-Yua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y 1949 – 1962*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26 – 27. 其中被处决的人数估计在二十万到几百万不等。参见Frederic

着“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废除，“地主乡绅潜在的反革命威胁”也被消除了。³²实际上，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建国前的地主们失去了他们在村里的土地和权力，形成了一个微新的下层阶级³³。

进行土地改革是为了尽快增加农业生产。由于相对缺乏可耕地（与人口规模相比），中国的粮食供应一直以来都受到限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粮食短缺和饥荒经常发生。因此，中共政权不想扰乱粮食供应，并在一开始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小农经济，包括不同类型农民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其中一些不平等现象甚至在土地改革后又重新出现了。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人们只是被鼓励去自愿成立合作社。但这没有奏效，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富农的抵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农村的干部。³⁴1955年，中共政权最终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尽管村民们获得了一块可以自己管理的土地——与苏联国营农场制度有些不同——他们仍然成为社会主义干部管控下的劳工，并以工作的形式获得用于换取食品和消费品的工资。³⁵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城市工人。与1949年前相比，农业工

C. Teiwe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以及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87.

³²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 – 50.

³³ 关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请参阅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 – 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和 Brian DeMare, *Land Wars: The Story of China's Agr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关于最初在土地改革时期，农村阶级制度是如何被用于组织反地主的阶级斗争，后来又是如何被用于维持阶级划分的，请参阅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8ff. 关于在“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实行农村阶级制度的例子，见Jonathan U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chapter 2.

³⁴ Cheng Chu-Yua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y 1949 – 1962*, 28 – 29.

³⁵ 关于工分制度的解释，请参见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163 – 69.

人——直到70年代末还占人口绝大多数——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然而，他们仍然受到剥削，仍然相当贫穷，并依然处于社会底层。与此同时，只要需要新的劳动力，农村移民就会暂时参与城市工业化，然而在50年代末户口制度建立前，他们受到的约束和限制就已与日俱增，这种制度旨在限制移民活动，并将导致不受限的移民活动变得非常困难。³⁶

中共政权还通过严格的（僵化的）阶级分类系统，在农村中再现旧的和建立新的内部差异，最终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³⁷然而，1949年之后的农村抵抗运动并没有城市工人的斗争那么频繁和广泛。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农村举行抗议活动的，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建国前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在中共的运动中被攻击为所谓的坏分子。这些抗议活动因为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国家粮食购买条件等因素而爆发的，并且经常以宗教迷信的形式出现。³⁸

工人的分裂

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榨取的农村经济剩余大部分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业，而不是消费品工业——这一模式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1952年至1965年间，工业产出年均

³⁶ 户口制度建立于1958年，它导致农村居民（和移民）从制度上受到歧视。然而，由于大跃进带来的劳工动员，它并没有被立即实施，而是在大跃进失败后才被强制施行（见第二章）。

³⁷ 本章后面将有更多关于阶级划分制度的内容。

³⁸ Elizabeth J.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275ff.

增长12.3%³⁹，工业就业人数从1200万跃升至1800万⁴⁰。与农业一样，中共政权在1949年后并没有立即对城市工业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或国有化。起初，它容忍了那些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私人资本家，因为它需要他们来实现预期的经济复兴。为了监督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工厂经理或工厂所有者，中共领导层派出了一小批干部。这些人通常是参加过内战的农民老兵，他们试图与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工人建立联系，成立党组织、工会部门和新的职工代表会议(SWCs)。这些中共控制的机关协助进行了几次针对车间主管、经理、工会成员和隶属于国民党政权和资本家的干部的严酷运动。如此一来，中共逐渐控制了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⁴¹在1952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宣布后，中共领导层最终在1955年和1956年推进了工业国有化并全面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私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相当顺利，因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们已经被之前的运动和清洗成功吓倒了。各国家机关随后按照生产计划分配了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给国营工作单位和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公有制城市企业的等级制度。其中一些是据称由其员工所有和管理的集体企业⁴²，另一些则是国营企业，它们是工业化项目的核心。⁴³后者有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有的则由地方政府

³⁹ Loren Brandt, Ma Debin, and Thomas Rawski,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Discussion Paper no. 10096, August 2016, 34,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ftp.iza.org/dp10096.pdf>.

⁴⁰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81.

⁴¹ 其中包括民主改革运动(1950–1953)，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三反运动(1951–1952)和五反运动(1952)；参见Andreas, *Disenfranchised*, 30–33. 根据Joel Andreas所言，仅在前两次运动中“就有数万人被送进劳改营，还有许多人被处死”；参见同上, 31.

⁴² 在不同的具体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曾允许一些小型私营企业的存在，例如在手工业方面。

⁴³ 在某些情况下，国营企业是利用以前由国民党或日本占领者经营的工业资产组建的，涵盖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如机械)的部门。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末期，国营企业进行了重组，更名为国有企业。

管理。这些国营企业被组织成了特殊的工作单位，它不仅组织生产过程，还管理其永久劳动力的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儿童保育、教育、住房、娱乐、健康和养老金。⁴⁴因此，国营企业中享有特权的固定职工被视为国家工人中的精英和所在单位的“主人”，享受着后来被称为“铁饭碗”⁴⁵的福利保障。在展示社会主义的成就时，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他们的“铁饭碗”经常被提及，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些工人实际只是中国(农村和城市)工人中的少数。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如集体企业和各种国营企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处于顶端的企业将比处于底层的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支付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向员工提供大小不同的，甚至完全不提供“饭碗”。⁴⁶

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这种新的等级制度，与新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等级构成相对应。首先，在钢铁或机械生产等关键行业，中共政权需要一支熟练而稳定的核心劳动力，并通过给予特权和设立法规对其施加控制。其次，在其他大部分城市产业则雇佣了大量地位较低(工资也较低)的城市工人。最后，特殊任务和季节性工作由灵活的临时劳动力(农村移民)来完成，他们不得不面对更低的工资和更艰苦的工作条件。⁴⁷这种三重分工让

⁴⁴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是工业企业，国家行政机关、大学和其他国有机构也都以这种单位的形式组织。

⁴⁵ 这也并非中国独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苏联，也有拥有固定职工的国营企业，他们享有教育、保健和养老金等一系列方面的社会福利。而大部分人口，特别是农村居民，却得不到类似的福利。

⁴⁶ 关于城市生产单位之间的不平等，请参阅Joel Andreas, “Reconfiguring China’s Class Order after the 1949 Revolution,” in Guo Yingjie, ed., *Handbook o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23ff.

⁴⁷ 关于农村临时合同工，请参阅Marc Blecher, “Peasant Labou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y,” *World Development* 11, no. 8, (August 1983): 731 – 45;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上海不同类型的工人——固定工人、合同工、临时工和外包工，请参阅Lynn T. White,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no. 1 (November 1976): 100. 如今，中国的内部移民通常被分析为一种改革时代(自1978年以来)的现象。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它有着不同的形

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对熟练与非熟练工人、永久与临时工、特权与非特权工人的需求，这并非巧合。

社会主义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形式的剩余提取——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与实际创造经济剩余的生产者的分离——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阶级划分，其中一方是工人和农民(或普罗大众)，另一方则是干部，即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或行政人员，以及企业经理。城乡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阶级结构划分还反映在后者较高的报酬和福利(住房、医疗、交通和教育)上。⁴⁸社会主义机构和单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由行政领导或经理和政治委员(行政单位中的中共代表，作为党派来的管理者)担任最高职务。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即仅由一位社会主义管理者领导的“一长制”，在工作单位中建立。下级干部们虽然管理着部门或车间，但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劳动制度经过调整，增加了工人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与苏联的“一长制”相比，低级别的工人能更多地参与决策——但是，这些工人能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生产队的水平。⁴⁹干部们不得不对下属的利益有所反应，有时还要关注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要为所在单位的运作负责，但他们也可以惩罚任何违抗命令者。这种等级

式，并且自90年代以来有了更大的规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流动劳力的二元劳动力并不是改革时期首创的，而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被使用了。

⁴⁸ 除了普遍的阶级划分和老百姓与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干部之间的划分之外，中共领导层还在高、中、低层干部之间引入了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使得他们在工资、住房、家政服务和社会保险的分配上存在较大差异；参阅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5ff.

⁴⁹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63ff.；“虽然小型生产队能管理自己的事务，但这种自主管理的范围相当有限；它只是涉及如何执行高层的政策和决定。而在小生产队层次之上，工人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决策，他们的影响相当有限。”；Andreas, *Disenfranchised*, 73.

制的管理体系得到了泰勒主义管理学在劳动分工、机械化、去技能化、劳动二元论等方面和其他对资本主义产业进行合理化的说辞的理论补充。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从几个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形式的相似之处。中共领导层及其支持者描绘了一幅平等主义社会的图景，一个工人当家作主，工农兵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对城乡劳动力的动员却砌成了一座僵化的阶级金字塔。农民和农村工人处于其最底层，临时农民工和集体工人形成了城市下层阶级，中层主要由国企工人和一些地位较低的党和国家干部组成，位于顶端的则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社会主义新统治阶级的核心。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组成所含有的不平等与剥削，将是后来许多社会不满和斗争的根源。

毛主义父权制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父权制差异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并推崇家庭中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威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场规模虽小但日益壮大的妇女运动（主要由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女性^{*}和少数男性发动）攻击了父权制和殖民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将女性^{*}拥有更多的个人和政治自由视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⁵⁰更激进

⁵⁰ 中国早期的女权运动浪潮恰逢辛亥革命。女性^{*}对平权和选举权的要求融入了反封建和民族解放的大潮中（反对清政府）。之后的浪潮则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爱国反帝主义运动相融合。有关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信息，请参阅Roxane Witke, “Women as Politician in China of the 1920s,”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33–45; Janet Salaff and Judith Merkle, “Women and Revolution: 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Young, *Women in China*, 145–77; Luzette Leith, “Chinese Women in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in Young, *Women in China*, 47–71; Louise Edwards, “Issue-Based Politics: Femi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Return of Bourgeois Feminism?” in David S.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201–12.

的流派，如早期的无政府女权主义圈子，将性别歧视带来的压迫与经济剥削联系在一起。⁵¹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些仅仅在共和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提倡平等权利的人，与那些将女性*权益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治结合起来的人之间的分歧逐日扩大。后者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与其他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共产党一样，中国共产党主张妇女解放，并将女性*平等参与有偿劳动和(部分)再生产劳动的社会化视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方式。⁵²

性别解放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承诺为封建、专制和父权制画上句号，因此，广大女性*成为了其主要支持者，以及推翻国民党，改革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军队解放的地区被作为培养基地，来让女性*适应未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角色。例如，由于男性参军动员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导致更多女性*被动员参与农业或工业生产。与此同时，女性*在军队内外大多从事辅助工作——这是“战争角色性别归属的深化”⁵³的一种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内部关于妇女解放的争论不再如往日那样激进。但在1949年中共掌权后，女性*进行了施压，要求立即进行实质性的改进。最初的几步行动似乎很有效。例如，家务雇工和卖淫被视为剥削女性*的方式

⁵¹ 请参阅Peter Zarrow, “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4 (November 1988): 796 – 813; Jana Rošker, “Die Geschichte eines Traumes: Frauen und Frauenproblematik der chinesischen anarchistischen Bewegung an der Schwell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Cheng Ying, Bettina Gransow, and Mechthild Leutner, eds., *Frauenstudien. Beiträge der Berliner China-Tagung 1991* (Munich: Minerva, 1992), 131 – 41.

⁵² 中国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列主义的观点，即通过参与雇佣劳动，女性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一员，从而获得解放。

⁵³ Nicola Spakowski, “Mit Mut an die Front” — Die militärische Beteiligung von Frauen in der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Chinas (1925 – 1949) (Cologne: Böhlau Verlag, 2009), 323; 也可参阅Delia Davin, “Women in Liberated Areas,” in Young, Women in China, 73 – 79; Anita Chan, “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Economics of Sex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 no. 2 (1974): 198 – 99.

因此被禁止了。随着1949年4月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的建立，一个维护女性*基本权益的机构成立了。⁵⁴1950年，全国妇联协助制定了《婚姻法》，该法保障了女性*在结婚与离婚问题上的自主决定权，并给予她们在家族和家庭中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这项法律的实施带来了一场持续至1953年的女性*权益运动，同时也带来了一波离婚潮。⁵⁵

雇佣劳动与生育负担

随后发生的事却与革命性相去甚远。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主要是无偿的劳动力再生产——尽管常常被忽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和稳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⁵⁶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并无不同。女性*不仅被要求在工作单位和农场从事雇佣劳动，还被迫在家庭中进行再生产劳动。在农村，女性*首次被大量动员起来从事农业劳动。⁵⁷新合作社“削弱了血统与

⁵⁴ 到1953年，它已经有4万多名行政人员；参见Wang Zheng, “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914. Louise Edwards指出：“实际上，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妇联主要是向女性*群众宣传中共政策的渠道，而非女性*权益的倡导者。”见Edwards, “Issue-Based Politics,” 205. 更多有关全国妇联的信息，请参阅Astrid Lipinsky, *Der Chinesische Frauenverband: Eine kommunistische Massenorganisation unter marktwirtschaftlichen Bedingungen* (Berlin: LIT Verlag, 2006).

⁵⁵ “离婚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反父权制的改革意义清晰地显现出来，因为绝大多数离婚案件都是由女性*提起的。”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18. 必须补充的是，当中国共产党停止推广《婚姻法》时，离婚率再次下降。

⁵⁶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产生了新劳动力(抚养和教育子女)，并再生产了主动劳动力(为男性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和前劳动力(照顾老人)。这些工作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而在某些(主要是城市)家庭中，再生产劳动或护理工作通常以低工资交由女性*(通常是农村移民)完成。对此观点的进一步研究，请参阅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PM Press, 2012).

⁵⁷ 1949年以前，大多数女性*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到了1950年，只有20%到40%的女性*从事。然而到了1957年，70%的成年农村女性*从事农业劳动，两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90%；参见Gao Xiaol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1, 83.

家庭的社会功能，也削弱了家族与父权制对女性*的权威”。⁵⁸通过参与集体组织的农活并收获报酬，女性*们可以扩大她们的人际网络，并增加她们在社区中的影响力。然而不久，中共领导层就缓和了《婚姻法》的宣传力度，以拉拢那些维护传统家庭环境的农村男性(和一些女性*)。⁵⁹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雇佣到田间劳作，但男性和女性*经常在不同的生产小组工作。据说，男性做的是更为辛苦的工作，例如搬运装着稻苗的袋子，而女性*则在地里种稻苗——通常要蹲上几个小时。所以男性的薪酬要高于女性*。“一项任务的艰难程度由工分来衡量。一位女性*回忆道：‘在我们这里，男人的劳动值10工分，他们中最差也有8.5分，而最好的则有10分。至于女性*的劳动，最高也只值5.5分。’另一位女性*说：‘我们的劳动只值（男性的）一半。’”⁶⁰在家庭中，女性*的角色进一步被父权制界定。再生产劳动，如照顾孩子，仍然是她们的职责。简而言之，女性*的雇佣与非雇佣生产以及再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着重要作用。它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农村生产的剩余，并被用于实现工业化——贺萧(Gail Hershatter)将这个过程称为“隐性积累”。⁶¹

在城市工厂中，父权秩序的改变以及单位对部分家庭职能的替代，使女性*在家庭之外被大规模雇佣劳动成为可能。然而，刘捷玉解释了单位领导是如何充当类似于传统家长的角色，以及单位的家庭式文化如何加强了工作场所的性别隔离和社会的性别分工。社会主义工作单位成为了女性

⁵⁸ 参见同上，82。

⁵⁹ 参见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122ff.

⁶⁰ 见Wildcat, “Unhappy Urban Workers—Situation and Protests of Urban Workers and Unemployed,”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October 14,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unhappy-urban-workers>.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中女性*劳动力的增长也是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后殖民国家的“绿色革命”时期，农业中的女性*劳动力也有所增长。

⁶¹ 参见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65.

*事业和个人生活的裁决者，并延续了社会主义体制前的父权职能。“结果，与她们的男性同事相比，女工们在社会中处于更大的劣势。”⁶²女性*的工作通常被归类为“轻”工作，价值不如男性的“重”工作。⁶³根据王政的说法，“无论教育水平如何，男性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技术岗位，女性*则被分配到非技术性、辅助性和服务性的岗位。这种性别化的就业等级制度确立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也塑造了女性*的自我定位。”⁶⁴而在雇佣劳动之外，女性*继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在随后的20年里，女性*是否能（以及有多少能）被分配参与有偿劳动，也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或劳动力短缺。到了1957年，甚至连全国妇联也背离了以前“动员女性*参与生产以实现女性*解放的政策”，转而“强调女性*的家庭和家务责任的重要性”。⁶⁵

家庭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女性*所期望的那样明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缠足、童养媳、纳妾和其他恶劣的习惯和习俗被根除，但传统的家庭结构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尽管政府和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但在农

⁶² 单位也在安排婚姻、分配住房、监督婚姻、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劳动性别分工和维护性别等级制度方面发挥了父权职能作用。请参阅Liu Jiey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86, 以及 Wildcat, “The Generation of Unhappy Workers.”

⁶³ 城市工作单位必须为相同类型的工作向女性*支付相同的工资，但这项规则却被男女不同的工作任务分配（“重”或“轻”）暗中破坏了。

⁶⁴ 参见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159. “这种劳动分工认为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是理所当然的，并提出了一种潜在的假设，即女性*‘虚弱’的体质最适合从事‘轻’工作”；见Liu Jiey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42. 与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同工同酬的实际执行方式是，男性被分配的工作比女性*被分配的工作更有价值”；见Kimberley Ens Manning, “Communes, Canteens, and Crèches: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4.

⁶⁵ 参见Wang Zheng, “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915; 以及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6. 在大跃进期间(1958–1961年)，全国妇联再次为女性*争取有偿劳动。

村的亚文化中，人们依然认为男性比女性*优越。”⁶⁶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合作社的引入，土地私有制被实际废除了，但农村传统的父系居住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共领导层“强烈反对女性*进行（非婚内的）性行为，并试图将异性婚姻作为其新式道德的核心。”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家庭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胞。”⁶⁷

总而言之，父权制并未被废除，只是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的需要被“现代化”了。女性*劳工的引入和扩大，以及女性*的几乎无偿的再生生产劳动，主要用于供应与再生产“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毛派父权制下对女性*的新一轮压制也是为了加强社会稳定和维护党的统治。在社会主义时期，女权主义诉求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重点，当面对男性对女性*新获得的权利的抗拒或反对时，中共领导层——其中没有女性*发挥主要作用——甚至进一步降低了女性*解放的要求。建国以前儒家留下的思想和结构遗产被重构，以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需求。

军管国家

1949年后，新统治者们想要巩固“一国社会主义”，加强他们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并抵御国内外的敌人。他们遵循马列主义的路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意在维护最进步和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并防备来自对立阶级的反革命威胁。

⁶⁶ 参见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83 – 84.

⁶⁷ 参见Manning, “Communes, Canteens, and Crèches,” 97. 在性别和家庭政治方面，中共领导层的看法与恩格斯不同，恩格斯曾设想女性*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使她们能“放弃婚姻制度，自由地进行基于爱情的性行为。”；参见同上。

一国社会主义

1949年以后，中共领导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摆脱外国殖民势力或帝国主义统治，建设“一国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直至今日），民族主义和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将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导致了中共领导层的专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间，中共在其控制的飞地中尝试建立的政治机关和结构，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军队本身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及此后的中国政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吴一庆的话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高度专制的军管国家……党、军队和国家的机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⁶⁸

根据1954年新宪法所成立的中央机关全部由中共控制，包括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以及各省及地方政府。一个新的司法和行政系统被建立起来，其中包括一个由警察、法院、监狱和服务于政治再教育的劳改营组成的镇压机器。⁶⁹这一机构得到了由单位中的社会压力与控制技术，以及由干部开展的集体行动的补充。为了消除（潜在的）反对意见，并动员群众支持党的目标，党和国家机构频繁开展政治运动，打击反动行径。中共政权的目标是那些破坏劳动纪律以及质疑中共统治或党的合法性的人。党内外不受欢迎的社会和政治分子被作为群众的敌人受到公开游行和惩罚，并在经济、社会或政治动乱中被当作替罪羊。⁷⁰

⁶⁸ 参见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3.

⁶⁹ 关于监狱与劳改营，请参阅Martin K. Whyte, “Corrective Labor Camps in China,” *Asian Survey* 13, no. 3 (March 1973): 253 - 69; 关于一种历史观点，请参阅 Philip F. Williams and Yenna Wu, *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⁷⁰ 这些运动最初是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开展的，它们也被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识字率，比如将其中的活跃分子派遣到农村。更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运动、清洗、社会控制及打击反动行

僵化的阶级划分

中共政权确立了一种官方的阶级划分制度。起初，这一制度在1949年前作为一种临时手段，由中共领导人提出，以判断谁可能支持革命，谁则可能是中共的敌人。然而在1949年后，它并未被废除，而是被保留了下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阶级划分被吸纳进一张关于党的控制，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的广泛网络。”⁷¹地方当局或单位为每个公民或单位成员建立了个人档案，记录着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他们给每个人贴上一个特定的阶级标签，但这并不能完全体现此人当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反之，这一标签反映出1949年以前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在农村，一个人的阶级标签可以是地主、富农、贫农、雇农，或是根据一个人(所谓的)政治背景进行的一系列非经济上的划分，如反动派、右派或革命烈士。另一种类似但更简易的阶级制度也将城市人口按其1949年以前的经济地位划分，如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分子或工人，也可以是非经济类的名称，如反动派或右派。即使一个家庭的经济或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这个家庭的阶级标签却也保持不变。一个工厂工人可能被称为“地主”，而一个大学生也可能被称为“农民”。此外，如果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那么他的家人通常也会因此被贴上同样的标签，随后在教育、工作培训或就业方面受到处罚、排挤和歧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共

径的运动，请参见Amy Wilson, Sidney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hittingham,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以及Elizabeth J. Perry,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 side,’” 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一份包含40个政治运动的清单，请参见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0–71.

⁷¹ 参见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43.

领导层利用这一制度来强化新建立的社会(或阶级)划分和等级制度，以打压社会上的抗议声并惩罚反对者(同时奖励顺从者)。这种阶级划分制度也是愤怒和不满的根源，它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动乱起到了重要作用。

概要：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中的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见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建设。中共领导层遵循了苏联模式和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即从农村提取剩余，用于建设新的工业单位。这些单位被按等级组织，并采用了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制度和技术。城市工人普遍有着较好的报酬和福利，但根据其不同的工作环境、雇佣关系和物质报酬，他们被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党和国家干部成为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管理者，而很快，他们就扩张了自己的(统治)阶级利益。这一社会主义发展计划背离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工农，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从来没给予他们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机会，而是最终促成了一个由中共领导层进行威权统治的阶级社会。与此同时，面对女性*们的反抗，父权制度也被调整，以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不过尽管有了一些改善，女性*仍然在遭受歧视和压迫。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核心要素，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包含了中共领导层调控下的中央经济规划，以及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分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解放运动和早期的物质条件改善措施得到了大部分人民的支持。然而在5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共统治下对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中的重构——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化、阶级地位制度以及

父权性别关系的重构——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与裂痕，这将很快带来社会中的不满和斗争，并将重新激发农民、工人和女性*的革命意愿。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中共领导层受到了这场社会动荡的挑战，它威胁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它将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和改革，以维护其统治。

第二章：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头两轮社会骚乱和政权反制的模式，其中混杂着镇压、妥协、拉拢和改革。在社会骚乱以及对1956–57年期间社会主义改造的抵制之后，当局试着通过短暂地允许公开批评来处理不满情绪。随着批评意见开始质疑共产党的统治以及越来越多社会抗争的出现，共产党领导层在1957年发动了一场镇压性的反击，即反右运动。接着，领导层启动了一场大规模改革，即大跃进，从而再次启动并加速社会主义工程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大跃进从58年持续到61年，其内容包括进一步推动集体化、劳工动员以及工业化。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农村中的大面积饥荒。毛泽东因此失去了其对最高领导层的掌控。60年代初，当局为了努力整顿经济，逆转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措施，并发起了一场旨在将城乡腐败干部斩草除根的运动。

为了解决政治上的停滞与官僚主义，也为了削弱党的领导班子里的对手并重获自己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66–67年文化大革命中对青年进行了广泛动员。这场动员猛然掀起了一场造反运动，社会主义底层阶级的各方势力都借此来要求满足其社会需求并组织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最终将威胁到整个共产党的政权。从67年初起，中共领导层就采取了两面手法，即一方面拉拢一些造反派头头，另一方面又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镇压群众运动。之后便是军管时期，一直持续到71年才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暴动深深地刺激到了中共领导层，然而，虽然他们极力确保自己的掌权地位，但是领导层其内部的“左派”和“保守派”之派别斗争和矛盾却瘫痪了中共政权。直到毛死后，邓小平周围的保守派才占据了上风，有能力去进行一场最终将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

中断：罢工和整风，1956-1957

1956年以前，中共领导层努力使国家多少稳定下来，并建立了一套社会主义体制。然而，集体化和新的社会主义阶级划分导致劳工的不满和一波罢工潮。与此同时，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起义，所有这些社会主义世界的新发展给中共领导层敲响了警钟。为了缓和国内的社会紧张并防止新的冲突产生，中共领导层允许知识分子、熟练工人和下级干部在所谓的百花运动中公开批评（党），但这些批评意见逐渐失控并威胁到中共的统治。

劳工骚乱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中共政权便开始推动经济的重建与发展。私有和国有企业的工作条件相当糟糕，引起了工人与社会主义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与对峙。⁷²作为对一连串抗议的回应，当局在不放弃自己对企业经理和党委书记职位中的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工人参与一些管理活动。这种半是让步半是巩固领导权的做法，之后我们还会反反复复地看到。

由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周围的工会在1949年以前长期采取着更加对抗性的策略，并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在罢工中发挥着作用，直到1952年。建国初期的这三年被称作“早期经济主义浪潮”。⁷³在

⁷² 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峙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关于二战后社会主义波兰内的冲突和罢工，参看Padriac Kenney, *Rebuilding Poland: Workers and Communists 1945 - 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⁷³ Paul Harper,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4, nos. 3 - 4, (July - October 1971): 118. 早先“推动工会获得相对于党的更大的独立性的全总干部被解除了权力”；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

这之后，工会遭到了限制，并被要求同时为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服务。基层工人对工会的影响力之渐失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人产生不满。⁷⁴与此同时，像职工代表会议（1956年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前身）这样由工人直接选举的代表结构实际上不过是个“一点真正的影响力”都没有的“橡皮图章”机构。⁷⁵

1956–57这两年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当权历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去斯大林化以及社会主义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的大规模群众叛乱和工人骚乱都让中共领导层感到惶惶不安。1956年夏在广州发生的怠工行动中，工人在要求提高工资时甚至还提到了匈牙利的抗议活动。⁷⁶

工人方面日益增长的愤怒首次出现在因为1956年初开始的产业彻底国有化而偶尔发生的罢工中。⁷⁷工人在国有化之后普遍有着很高的期望，正等待着福利和生活条件提高到类似更老牌的国企里的水平。然而，事与愿违，产业国有化后他们的参与权甚至还被进一步限制，而且“尽管在生产方面取得了飞速进展”，物质上的改善（比如工资和住房）也没有如期所致。⁷⁸裴宜理提到，上海的国有化工厂里的分红和补贴（许多都是建国后开始的）都被砍掉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企业工会和“群众监督”体制实际上也削弱了工人相对管理层的地位⁷⁹。在1957年的五、六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8.

⁷⁴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27.

⁷⁵ Harper,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115;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2.

⁷⁶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8.

⁷⁷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7.

⁷⁸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53.

⁷⁹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8.

月，上海工人发起了一些罢工，攻击工资和补贴的不平等分配。“工厂干部成为一些暴力事件，还有更多大量的‘围堵’事件的目标，在围堵事件中，愤怒的工人把经理们都围起来，一连几个小时都不让他们走动。”⁸⁰这场工人骚乱潮是中国社会主义下的底层阶级对新的经济体制的首次较大规模反抗。

工作场所里身处社会等级制底层的那群人尤为感到挫败。弗朗索瓦·吉浦罗(François Gipouloux)提到，1956–57年发生在数百家工厂里的罢工“大多数都是由‘边缘’工人挑动的：临时工、合同工、服务业工人、学徒工和其他无法得到国企老职工所享受的特权的人。”⁸¹中共领导层已经建立了一个劳动力的二元制度。一方面，固定和永久工能够享受更好的条件，然而另一方面，临时工、青年工、学徒工和女工得面对失业风险和低工资，她们有时会以无故缺工和暗中破坏来抵制这一状况。⁸²

这段时期里的不满和骚动群体不只是工人。郑世平提到，“1956年八月到1957年1月这六个月里，大学和职业学校里的学生发起了30场罢课和请愿游行。大约有1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10万学生联合罢课，在一些县里还有农民骚动。”⁸³中共当局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改不行了。

⁸⁰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198–99.

⁸¹ François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Agitation ouvrière et crise du modèle soviétique en Chine, 1956–1957*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6), 198–205, 转引自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163.

⁸² 关于50年代中叶的形势与此类工人的抵抗的详细描述，可参见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esp. chapter 2.

⁸³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3.

百花齐放运动

20世纪50年代中叶，与城市工业的完全国有化齐头并进的，是由中共领导层为了得到知识分子更多支持而发起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在工业化前的运动中遭受了不少攻击，他们因此在工业化中表现得相当消极。⁸⁴ 1956年5月，当局决定放开更多研究和表达的空间，包括允许人们批评官员干部。运动的目的是“改善官僚制并提升其效率”。这既反映了毛对官僚特权的批评，也体现了斯大林死后类似的“解冻”和对教条主义和苏联国内压迫现象的批评。⁸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提出了“非对抗性矛盾”理论，允许社会内部的批判性辩论。毛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骚乱归咎于共产党脱离群众，并试图防止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1957年4月下旬开始的百花运动也被人们理解为党的整风运动。它持续到1957年6月，总共有6个星期。⁸⁶ 中共领导层再次请求知识分子（这次包括了党外人士）表达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和看法。领导层希望能避免社会紧张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试图得到更多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的支持。显然，中共领导层希望这些批评意见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并指向官方所批准的缺点，比如阶

⁸⁴ Merle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2.

⁸⁵ Merle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3.

⁸⁶ 1957年的整风运动同时又被称作大鸣大放或者百花运动。第二个术语源于毛在1956年5月使用的一条口号（“百花齐放”）。这里的“花”指代的是作家与文化工作者。工厂工人也要求参加这一活动，“但是，虽然随心所欲的辩论吸引了大学师生和知识界的参与，但工人的参与却非常有限。”；Andreas, *Disenfranchised*, 42, 47. 关于百花运动，参见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级出身“不好”的腐败干部。然而事与愿违，1957年5月之前的批评明显都是根本性的，而且不满情绪还比预期进一步加深。例如中共在立法、司法和国家行政中扮演的角色都遭到了攻击，还有人批评共产党是把“中国人的国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⁸⁷5月中旬，学生们第一次贴起了大字报，这一事物在之后的抗议运动中也将发挥关键作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贴上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对中共8年里的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⁸⁸“对官僚的批评超出了对某个干部的批评，而直指体制本身。”⁸⁹批评风潮碰巧又和上文提到的一系列劳工抗议同时发生，这些劳工活动“至少和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说的和写的任何东西一样深深地挑战了党的权威。”⁹⁰面对统治的潜在动摇，中共领导层发起了回击。

加速：大跃进和清洗，1957-1965

作为对1956-57年间的罢工潮和批评风波的回应，中共领导层采取了镇压手段——发起反右运动。然而，群众表达出的不满情绪已经表明需要更深入的改革。领导层在改革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但最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占了上风。1958年，他们为一场推动进一步集体化和工业化（所谓的大跃进）而动员了数百万工农。大跃进将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但同时也将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并很快在农村中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大饥荒。随着大跃进运动在1961年结束，中共领导层为了巩固经济，放宽了集体化的某些形式，

⁸⁷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66.

⁸⁸ Ibid., 68;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252–53; Göran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er and Big-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Copenhagen: Curzon Press, 1990), 45.

⁸⁹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254.

⁹⁰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47

缩减了工业化项目的规模，把数百万先前所动员的新工人送回农村。随后，是反对腐化干部和“走资派”的四清运动。同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降温并最终在60年代初破裂。

反右运动

随着百花运动中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党所预期的范围，以及随着工人们也为了更好的条件而加入了斗争，中共领导层决定“将指向当局的不满引向知识分子。”⁹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局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之后采取了镇压措施，但“中国的风向逆转得最为剧烈，这表明中共领导层是将百花运动看得极为严重。这一反击原本可能还会更加凶猛，因为毛泽东曾预期知识分子已经被彻底改造了，现在却失望地发现有这么多对党的批评。”⁹²1957年6月8日，中共领导层正式宣布将回击那些胆敢在这几周里批评党的人。这一回击很快发展成对抗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多数遭到攻击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来自城市地区，并在大学、研究所、党、国营的企业管理层或者国家行政单位里工作，其中还包括数千名政府和军队的高层干部。⁹³根据官方后来公布的数字，1957到1958年超过55万人被打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并受到批评、攻击、贬职、

⁹¹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254. “政策的突然逆转也是由于中国正在持续的经济困难……国家的经济失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批评意见的有害影响所致，这些批评削弱了经济建设所需的一心一意的热情。”；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203.

⁹² 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254.

⁹³ 安舟补充，“在反右运动席卷工厂办公室和学校的同时，车间里也出现了规模较小的镇压浪潮。……提出投诉的工人被解读为反党，被谴责为‘坏分子’并面临严厉的报复。许多领导罢工的工人也受到了惩罚”；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48 - 49. 工会干部也成为反右对象，全总改组，并被要求“工会干部完全服从厂党委”； *ibid.*, 50.

开除甚至下放到农村地区。⁹⁴这之后的二十年里，那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政策废除整个阶级划分系统。

中共领导层通过反右运动成功摆脱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某些没有跟着官方路线走的工作单位内的（潜在）危险，并且还巩固了其对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控制。同时，正如吉浦罗指出，1957年的不满和取缔揭示出了干部和工人之间重要的裂痕。⁹⁵工人们现在知道了经济国有化和社会主义企业重组的作用，也感受到了管理层正致力于提高效率。

大跃进

尽管计划经济在1950年中叶已经几乎完全建成并促进了预期的经济增长，但却没有带来当局所希望的结果。通过在固定工人工资的同时攫取农村剩余产品来支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策略，创造了新的社会裂痕。1956–57年的罢工潮与不满情绪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表明其经济和政治政策已经触到了人们的底线。中共领导人（许多人早在三四十年的游击战争中就开始合作）也开始寻找新的政策。然而，不同派系在处理这场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便是党内（既在干部中也在工人和其他群体里）派系冲突的开始，这一冲突将形塑中国之后二十年的政治图景。

不同派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合适措施上争论不休，一方坚持集体化和中央计划，而另一方则要求更加温和的集体化，还认为计划应该带有更

⁹⁴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68. 估计“有 40 万到 70 万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被送到农村和工厂进行劳动改造”；Goldman,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257.

⁹⁵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9.

多物质刺激和有限市场。1958年，毛派用所谓的大跃进推动了第一条道路，即通过对工农的意识形态动员为新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雇佣大量劳动力，以及重新组织农村集体和城市工作单位来实现增长。在农村，现有的合作社体系被重组为更大的公社。残余的自留地甚至家庭厨房都被集体化，因为农村工人及其家人都被要求去集体食堂去吃饭。公社还启动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比如灌溉、农具生产之类的小型工业。随着钢铁生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名声不佳的“土法炼钢”工程出现了。而在城市，国营和集体企业得到了扩张，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女性*，她们在此之前还未参与有酬劳动。1957到1960年间，城市雇佣人口从三千万增长到快六千万，几乎翻了一番。⁹⁶

农村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动员去参与城市工业化以及公社里非农业性质的大跃进工程，因此（大量且）必需的农业劳动都没人去做。这些因素和其他影响（不好的气候，管理不当，农村干部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夸大报告并歪曲实际经济情况）共同导致了粮食产出的不足。于是，在城市（和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的同时，许多农村地区却没有足够粮食来自给。农民以各种形式的抵抗来做出反应，比如把粮食藏起来，亦或是从粮仓里偷粮食。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农村人口。⁹⁷

大跃进的失败标志着中共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农村集体化创造出一种农村无产阶级和“基层干部新权贵”⁹⁸，从而改变了乡村的社会关系。

⁹⁶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57.

⁹⁷ 根据不同的估计，1500万到4500万人在1959–1961年的饥荒当中去世；Felix Wemheuer, “Collectivization and Famine,” in Stephen A. Smith,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09.

⁹⁸ Elizabeth J.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289.

无产阶级化和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中共失去了大量农民的支持，这种不信任感将在之后几十年里形塑农民的思维。这一情况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⁹⁹

重新组织再生产劳动

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中共领导的全国妇联试图让家务劳动被承认为“劳动”，但党内大多数成员都没有接受。“由于国家尝试尽可能便宜地为城市工业化从农村攫取剩余，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仍是是没有报酬和不被承认的。”¹⁰⁰在农村，集体化加剧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差别，女性*被要求从事大多数无酬劳动。¹⁰¹在五好运动（1955–1959）期间，中共鼓励城市和农村家庭妇女*通过相夫教子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¹⁰²运动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表彰所谓五好积极分子，让他们成为社会主

⁹⁹ 要了解关于大跃进的更多细节，参见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91–241; Felix Wemh euer, *Steinnudeln: Ländliche Erinnerungen und staatlich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de r "Großen Sprung" -Hungersnot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Hena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Gao Wangling, “A Study of Chinese Peasant ‘Counter-Action,’” in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 heuer, eds.,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272–94.

¹⁰⁰ Alexander F. Day, “Gender an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Labor,” PRC History Review 1, no. 1 (May 2014): 3–5, accessed January 24, 2021, <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Day-Final.pdf>, referring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¹⁰¹ Day, “Gender an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Labor,” 3.

¹⁰² 这一运动被中共的人民日报推广，而家庭主妇的“五好”任务被描述为：“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家庭生活安排好、教育子女好、鼓励亲人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全国妇联等十三个单位 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联合通知”，《人民日报》2月10日，第三版，访问时间：2021年1月10日，<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6/2/10/3>.

义模范家庭妇女的榜样。“家庭妇女为那些直接参与生产者所承担的（无偿）服务工人角色得到了颂扬¹⁰³。”¹⁰⁴

1958年之后，随着大跃进中人民公社的建立，这一情况发生了暂时的改变。“大跃进中对农村的再组织最终不得不努力将女性*的传统个人劳动社会化，以让更多女性*每年更多参与集体劳动。”¹⁰⁵许多农村女性*被动员去从事有酬劳动，特别是在农业领域，而男性则与此同时正在为建设工程或者家庭炼钢而奋战。然而，一些所谓的铁姑娘也参与了基础设施建设、挖矿、钢铁生产和管理工作。同时，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公共食堂，托儿所以及洗衣处。女性*们第一次能够“丢掉家务杂活让自己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对于曾被厨房束缚的一代代女性*们来说，这是极为重大的转变。”¹⁰⁶许多女性*把这一工作安排当作逃避“村里老人的监视”的手段，她们还能利用这种自由来得到相对不受控制的性机会（sexual encounter）¹⁰⁷。大跃进也造成了一些不利于部分女性*的改变。比如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是有孩子的女性*，因为其他人都被动员去参与工业劳动。许

¹⁰³ 原文glorify，亦可以译为吹捧或美化。

¹⁰⁴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9.

¹⁰⁵ Kimberley Ens Manning, “Communes, Canteens, and Crèches: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99.

¹⁰⁶ 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3. 然而贺萧写道：“这些村庄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除了大跃进期间做饭吃饭被强行转移到集体食堂”；Gail Hershatter, “Forget Remembering: Rural Women’s Narratives of China’s Collective Past,” in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9.

¹⁰⁷ Kimberley Ens Manning, “Communes, Canteens, and Crèches: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99.

多女性*几乎没法承担这些任务，因为她们不得不努力为集体工作的同时，仍然需要做家务活，“最后又累又病，跟要死了一样”。这些有孩子的女性*讨厌这种工作安排，不少人还想方设法逃避工作。这样的“‘开小差’很常见”。¹⁰⁸

最后，大跃进通过提供保健、保教（比如托儿所，译者注）和公共食堂来减轻女性*负担的承诺最终被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用。女性*从再生产任务中部分地得到了解脱，然而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在大饥荒和大跃进的失败后，食堂被解散，“农村女性*被要求回到原来的位置，又一次扛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¹⁰⁹。女性*对于合作社中有酬劳动的参与水平曾在大跃进中不断增长，现在它又回到了大跃进以前的样子。毛式父权制几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形态。¹¹⁰

重启与清洗

尽管整个中共领导层在50年代还是团结一致，然而，关于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秩序的一个核心因素、发动大跃进的决定过程以及其随后的失败，这三者造成了党内严重的冲突。人们认为毛泽东得为失败负责，毛也不得不退居领导层二线。围绕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周围的一个更加实用主义（或保守）的团体开始精心策划改革，处理大跃进的后果。1961年后，他们从先前的政策标准进行了一些退却。在公社，他们再次允许农村工人拥

¹⁰⁸ Ibid., 98 - 99.

¹⁰⁹ 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83.

¹¹⁰ 据估计，在60年代初期，50% 到 60% 的适龄工作女性*参加了农业集体劳动，低于 1958-59 年 80% 到 95% 的高点；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169.

有保存一小块自留地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¹¹¹许多先前由于工业化项目而被动员到城市里的农民工被赶出城里。城镇雇佣人口减少了一千六百多万。¹¹²1958年颁布但在大跃进期间没有得到实施的户口制度，在1961年后开始得到实施以控制城乡流动。户口制度最终导致中国的城市化率到了70年代末仍低于20%。但是，城市单位依然将农村移民或城市居民雇佣为临时工，这使得其内部的二元（或两线）劳动力体制得到持续。随着工业生产在60年代早期得到了恢复，单位还受到鼓励去雇佣合同工。一些有关合同工的规章制度出台，明确合同工不能享有永久工所拥有的工作保障和福利。“1962年到1966年期间，国有部门里不享有永久工地位的工人比例从8%增长到了13%。”¹¹³

当局想要巩固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失去的合法性，并发动了一些运动，这些运动运用1949年以前的阶级划分，在争取工人和农民支持的同时又模糊了工农和党领导人之间新的阶级冲突。通过消灭那些威胁着社会主义的旧权贵（比如地主和资本家）的幽灵，中共领导人想要让农民和工人们相信，“中国内部巨大的分化不是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而是群众和‘阶级敌人’之间的。”比如说，1949年以前的“坏分子”。¹¹⁴同时，毛泽东与他的派系则推动运动直指在他们看来越来越官僚主义和腐化、没有贯彻党的路线且需要“群众监督”的党和国家干部。从1962年持续到1966

¹¹¹ 与此同时，许多公社内的小型工业也维持了下来，并在随后成为了支撑80年代经济增长的乡镇企业的基础；see chapter 3, section 2.

¹¹²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57.

¹¹³ 同上, 58. 其他估计认为60年代中期临时工的数量要高得多。例如，根据 Christopher Howe 的估计，它介于 30% 到 40% 之间；Christopher Howe,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Incentives in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tuart R.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35.

¹¹⁴ Jonathan U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37.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做四清运动）就是如此。毛泽东自己就参与了关于农村公社、城市工作单位、国家和党政机关中干部滥用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化的辩论。在农村，社教运动发动贫下中农并把农村干部当作旧社会里来的阶级敌人来重点关照，亦或是把重心放在被认为要为大跃进失败负责的“走资派”身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一些纪律措施，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派工作队“进村、调查本地干部，暴力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¹¹⁵正如安舟所强调的，城市工厂里也有社教运动，在这些地方，由党干部（来自其他工作单位）组成的工作队让工人批评自己工厂里的干部。“运动对工业单位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经常导致领导班子大换血。”¹¹⁶

社教运动期间，遭到迫害的人有五百多万，其中有许多都是干部，另有七万多人因惩罚而死亡。¹¹⁷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已经开始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但是毛泽东级其派系的人认为，这种带着由党的干部组成工作队推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不足以打败“走资派”，亦不能限制党的领导层内部的敌对派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要在发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动员起党外的力量。

¹¹⁵ Ian Johnson, “Jeremy Brow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16,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nyti.ms/1T7iMn1>. 要了解更多关于社教运动的信息，可以参见Richard Baum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当中的详细介绍。

¹¹⁶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82 - 83.

¹¹⁷ Song Yongyi, “The Hidden History: Liu Shaoqi’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Modern China Studies* 3, (2006),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0-2012-01-05-15-35-10.html>.

中苏决裂

在国内，中国的社会主义阶级体制在60年代初期就已固化，并将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爆炸。同时，随着中苏决裂，中共当局失去了其最重要的外国支持者和盟友。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后，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发起了所谓的去斯大林化，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政治和机构改革。中共当局被惹恼了，因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的“去毛泽东化”。随着苏联当局将自己的外交政策重新改为与其冷战的敌人美国“和平共存”的路线，中共当局越发受到孤立，并仍然坚持其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自从4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亚非地区实现了去殖民化，大大改变了全球格局。中共当局利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话语和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话语，努力在这些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发挥作用。中共最终参与了1955年不结盟运动（的民族国家）的万隆会议，其已经被视为不同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的标志。¹¹⁸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波兰和匈牙利在1956年的群众起义还引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于社会关系和阶级政治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

最终，中共当局意识到中国也许不得不放弃苏联的支持，大跃进也可以被视为当局形成自己道路的一次尝试。中苏的最终决裂始于1960年，这一事件改变了全球均势。中共在与其北方伙伴苏联渐行渐远的同时，逐步完善了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模型。¹¹⁹随着美苏冷战明显恶化（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共当局愈发觉得受到威胁，并为与两个主要世

¹¹⁸ 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信息，参见Mineo Nakajima,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259–89; Ronald C. Keith, *China from the Inside Out: Fit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into the World*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¹¹⁹ 随后，中苏分裂对其他国家的左翼运动产生了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争论和斗争，不同派别要么支持毛泽东模式，要么支持苏联模式。

界强国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起了准备。1962年，中共在边界问题上与印度当局发生了短暂的军事冲突，而当美国政府在1964年后愈发干涉越南战争时，中共支持了北越军队（实际上，苏联也是如此）。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了一个核大国。同年，中国启动了一项庞大的工业发展工程，即所谓的三线建设。该工程将持续到70年代。其中包括将重要产业集群转移到四川省这样的内陆地区，远离受到美国威胁的东部沿海和受到苏联入侵威胁的北部边界。¹²⁰

中国同苏联的决裂以及三线建设工程让经济形势更为紧张。而且在60年代中叶，中共当局还面临其他的挑战：围绕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的政治碰撞、党内派系斗争，国家官僚与工农之间的冲突。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冲突，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时候看起来仍然稳固。更令人惊讶的是即将发生爆发的社会动乱。

造反：文化大革命和激进批评，1966-1967

1966年，为了再次启动社会主义工程、削弱中共领导层里的对手和“走资派”的力量，并重新得到党内一把手的位置，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自上而下发起的运动（就像十年前的百花运动一样）同时也为自下而上的造反开了一扇门。大量社会不满情绪以及数百万无产阶级的怒火造成了群众运动的升级和激进化。造反将现存的国家结构撕开，

¹²⁰ 参见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351 - 86; Covell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drew Batson, “China’s Security Fears and the Cold War Economy,” Andrew Batson’s Blog, July 6, 2020, accessed October 16, 2020, <https://andrewbatson.com/2020/07/06/chinas-security-fears-and-the-cold-war-economy>. 三线建设相关的投资一直持续到1979年，但是1971年后规模逐渐减小。

把党国体制推到了深渊的边缘，并发展出一套对整个中共体制本身的激进批评。¹²¹

走资派和红卫兵

60年代中叶，由官僚和专家组成的统治阶级内部关于怎样继续社会主义工程的领导权斗争仍在继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带来毛泽东及其领导层内支持者所期望的结果，它并没有通过向公社和城镇工作单位派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的方式来限制党、行政部门以及经济管理部门里的“走资派”。毛想要重拾权力，以推动旨在消灭潜在社会对抗以及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治改革。为此，他不得不贬损刘邓及其周围的领导层派系的名声，并把他们推到一边，因为他怀疑这两人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这一想法并不能依靠党内力量来轻易实现，他选择利用自己的声誉、地位以及许多城市青年的不满来在党外发起一场运动。这一操作事实证明是极度具有风险的。

毛泽东在1966年夏天呼吁青年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引致了红卫兵的成立，其很快变成了一场群众运动。社会因素（包括城市失业青年、阶层上升的相对困难和社会非流动性以及与僵化的阶级分类相关的麻烦）推动了青年公开造反的迅速扩散。第一批红卫兵出现在北京，大多数都是中共和解放军干部的子女。作为没有参与过三四十年代“英雄的”革命斗争的一代，这些孩子想要保卫他们的家庭特权。他们引用臭名昭著的“血统论”，宣称他们自己的“红色”血统让他们有权利跟随父母的脚步、在体制内向上爬并使得自己成为领导干部。1966年8月，在被称作“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这第一批红卫兵不只是对着（据称是）“反动”干部和知

¹²¹ 本书中的文化大革命指1966–1967年的群众运动，而非常用的1966–1976年的时间划分。

识分子，他们还攻击与国家宣称的各种各样“坏”、“黑”分子有联系的人，其中包括许多青年、被边缘化的工人及失业者。

刘少奇周围的中共领导层向中学和大学里派出了由党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努力去控制这一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然而，这引起了更大的麻烦，部分是因为毛泽东的暧昧态度，他经常帮助年轻的红卫兵战士。¹²²然而，在毛看来，运动并不应该对准“黑”分子。毕竟毛的目标乃是削弱围绕在刘少奇周围的对手派系。因此，在1966年秋天，他重新调整了文化革命的方向，将进攻重点指向党内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运动

毛对文化大革命新方向的指示造成了非预期性的后果。这一变化让那些先前被红卫兵排除在外甚至被攻击的年轻人有机会大批加入文化革命：他们是“黑”阶级分类人群的孩子。接着，红卫兵运动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来自“红”家庭，保卫中共干部的特权。另一派来自“黑”家庭，他们则攻击这些干部和特权。这场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冲突，这将形塑文化大革命的轨迹和随后几年的进一步冲突。

城市、农村地区里数百万学生工人在1966年末卷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他们挑战党的权威，建立自己组织的团体，出版报纸，还组织游行示威——一种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形式，而先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并不能看到这些自由。五大自由同文化大革命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大鸣大放（也出现

¹²²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9.

在1957年的百花运动）、大辩论、大字报和大串联。¹²³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大串联发挥着中心作用，因为他们因此能走遍全国，并在路上遇见许多其他红卫兵。这对他们来说是既令人兴奋又感到解放的经历。¹²⁴

在工厂，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党组织创造出来的，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分无一不是被党组织认为在政治上可靠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阶级背景。而工人自发组织自治小组的努力却仍然遭受镇压。”¹²⁵然而，在1966年10月和11月，“造反派”运动也出现在了城市的工作场所里。许多城市都如此，但集中点在于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年轻的工人、学徒和临时工（许多都是女性*）经常是在学生的帮助下建立了造反组织。这些学生“来到工厂……帮助已具雏形的造反派工人团体形成口号、帮助他们组织对工厂领导的批评、写大字报以及搞传单”¹²⁶。造反派工人还发动了群众示威或者有组织的怠工行动，他们的诉求包括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永久工作。“临时和合同雇佣制和所谓的‘工-农’（worker-peasant）系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最后“它不仅让那些实际上是合同工的人有理由抗议，许多担心自己也可能被强制转为合同工的固定工也加入了他们。”¹²⁷

¹²³ 这五大自由“与‘大民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与文化大革命的剧烈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Andreas, *Disenfranchised*, 99.

¹²⁴ “大串联”的经历对文革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Yang Guob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¹²⁵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05.

¹²⁶ Ibid., 107.

¹²⁷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97; 另见Lynn T. White,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no. 1 (November 1976): 107–15. 如上所述，“Christopher Howe估计，由于国家削减工资和福利支出的努力，临时工在60年代中期增长到全国非农业劳动力总数的30–40%。合同制已成为劳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于1965年国务院发布的一项指示规定，企业“有裁减固定工和增加临时工的自由裁量权”，“一直由正式工承担的临时任

由于被发动起来的学生和工人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攻，许多公共行政部门、大部分中共组织以及全国妇联、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的中共群众组织在之后几个月里都无法有效运转，组织也分崩离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派别担忧文化大革命会扰乱经济，要求文化革命应该在“业余时间”执行。工人行动的浪潮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在1967年初进一步升级。面对物质诉求以及工作与生产的崩溃，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层开始谴责这些行为是“经济主义妖风”。他们希望能将这些造反限制在官方的政治路线之内。¹²⁸此时，保守派组织（由熟练技术工人、党员、管理者以及下级干部）竭力捍卫自己的特殊权利，并维护中共的结构及向他们（的特权）做出保证的领导人。在工作场所及街道上，保守派同造反派对抗，而造反派在运动初期往往表现得更有力量（即使保守派组织更大）。¹²⁹随着造反运动的发展，国家行政部门逐渐停止了运作，造反运动赢得了党领导人以及管理者的让步。这些人不仅害怕工人的怒火，还害怕自己站在错误的政治立场上被打成“反革命”。

除此之外，造反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核心，他们发展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激进批评。他们从分析社会不满及歧视开始，最后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阶级社会，把中共领导层指认为“红色官僚”。约翰·哈萨德（John Hassard）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运动中的更加激进

务必须逐步转向由临时工承担”；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102, quoting Christopher Howe,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Incentives in Industry,” 235.

¹²⁸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济主义”的指控就已被用来反对罢工工人和全总中倡导工人经济利益并支持工会获得相对于党的更大独立性的力量；见本章第1节。

¹²⁹ 攻击党的干部的造反派组织与维护党的干部的保守派组织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上演。1967年1月以后，许多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派别，随后就斗争方向和与党内建制派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甚至是暴力）对抗。

的参与者普遍认为，中共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从工人阶级中攫取剩余价值，还把自己的特权传给自己的后继者。”¹³⁰

这一激进批评受到了广泛讨论，而不仅限于红卫兵和造反运动。比如北京的青年积极分子遇罗克以及湖南的群众组织省无联中的杨曦光就在各自的圈子里讨论这一激进批评。而这些激进派用来替代威权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参考模范就是巴黎公社。他们挪用毛对官僚化的批评，而毛的这一批评最初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党内一些他称作“走资派”的个体和圈子。尽管文化革命的造反者总得来说都承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其推动建立独立于中共的群众组织之努力，但上述这些特别激进的造反者越出了毛的意图，将矛头指向整个社会主义的阶级等级制，要求结束“红色资本家”的经济剥削以及社会排斥。¹³¹

性别化的造反

文化革命期间，人们经常引用“妇女撑起半边天”这句毛泽东提出的相当有名的口号，以表示在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已经取得了平等，并在当时的群众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性别议题在运动支持者中并不是中心问题。而且总得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女性*情况造成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

¹³⁰ John Hassard, Jackie Sheehan, Zhou Meixiang, Jane Terpstra-Tong, and Jonathan Morris,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7), 161–62

¹³¹ 关于省无联与其他人进行的激进批判，参见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34;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97;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5ff.;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性别作为一种范畴只具有“政治和实用主义”的意义，被当作……实现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乌托邦的工具来使用。”¹³²对于党来说，女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能力是最重要的。50年代中叶的集体化运动早期还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女性*被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家庭妇女”呆在家里。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农业和工业化需要劳动力，许多适龄女性*被动员去参与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使用了“男同志能做的，女同志也能做”的口号。官方媒体也把女性*称赞为“无产阶级战士”。中共宣传中不仅把1949年前的革命斗争中女性*领导人以及战士的图像拿出来展览，还向人们展示那些“加入钻井队、成为拖拉机手、卡车手、柴油机车驾驶员以及学习修高压电线的女性*”。¹³³然而管理者仍然强调说自己是因为女性*工人的“娴熟的手艺和耐心”才偏好她们。¹³⁴女性*在家里额外的无偿再生产劳动却没有人提出疑问。¹³⁵

红卫兵作为当时群众政治的主要社会形式，代表着一种男性的、富有阳刚之气的文化。女红卫兵为了参与（这场运动）不得不接受这种文化。而且在文化革命期间，“所有女权主义的要求或者女性*特有的问题的都要遭到谴责。这些要求和问题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人被攻击和再教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A的阶级出身。¹³⁶”在给女性*分配

¹³² Yang Wenqi and Yan Fei, “The Annihilation of Femininity in Mao’s China: Gender Inequality of Sent-D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Information* 31, no. 1 (March 2017): 63, accessed October 16, 2020,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920203X17691743>.

¹³³ Emily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Reassessing the Red Guards,” in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55.

¹³⁴ Ibid.

¹³⁵ Ibid., 255.

¹³⁶ Wildcat, “Female Workers under Maoist Patriarchy,”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female-workers-und>

阶级时的主要标准大部分都是她们外公、爷爷、父亲和丈夫的阶级出身。在文化革命的群众阶段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红卫兵暴力也是性别化和性化的。女性*会遭到红卫兵的性骚扰，还有人以“性不道德”的虚假借口来攻击女性*。一些女性*被污蔑成“破鞋”，拉到街上去游行。随着中共最终决定遣散这场运动，许多积极参加红卫兵运动的年轻女性*被送到农村，她们常常成为“当地男性干部性骚扰的对象”。¹³⁷而这些被下放的女性*青年也在农村中形成了“中性的外表”、养成了“男性的劳动方式”并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婚姻问题。¹³⁸

总得来说，这些女性*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化、政治团体的组织以及派系斗争对整个红卫兵一代的女性*都产生了影响，作为青年，她们不再将婚姻和子女当作自己生活的中心部分，而是看作一项关于再生产或必要的政治问题。¹³⁹而这将决定她们作为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立场，决定她们与后代的关系，以及决定她们在其他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¹⁴⁰

er-maoist-patriarchy. 鉴于女性*的特殊诉求得不到重视甚至受到打压，不难理解中共妇联是文革中被解散的党组织之一。（见上）

¹³⁷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256. Meanwhile, “adolescent girls who remained in the cities were often the objects of sexual exploits by young male neighborhood gangs”; ibid.

¹³⁸ Yang Wenqi and Yan Fei, “The Annihilation of Femininity in Mao’s China,” 69ff.

¹³⁹ 有关 1980 年代初期杭州一家工厂中“文革帮”中的女性*的评论，请参阅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¹⁴⁰ 对一位女性*在文革与文革后的经历，参见 Yu Luojin, *A Chinese Winter’s Tale* (Hong Kong: Renditions Paperbacks, 1986).

复辟：军管和派系斗争,1967-1976

随着造反行动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摧毁了党的组织、深入到工作场所中、造成了“经济主义妖风”并对经济造成严重威胁，毛泽东身边的领导圈子决定镇压这一群众造反活动。它们成功地分化了造反运动、拉拢其中的一部分，并利用解放军摧毁¹⁴¹剩下的另一部分。随着针对造反团体的清洗活动持续到70年代初，人们愈发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楚地标示着毛主义的政治能量正在耗尽。中共领导层采取了包括与美国重新建交等关键步骤，努力恢复社会主义工程。然而，关于改革理念的派系冲突（包括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造成了领导层的分化，这一僵局直到毛泽东本人在1976年去世后才最终打破。

监禁与迫害

随着上海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团体在1967年初加入了群众行动之中，城市及工作单位里的国家行政部门、党的结构在这些攻击之下崩溃了。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以及不同造反派之间的一些冲突之后，工总司（造反联合组织之一）坐上了首席。工总司和其他造反团体一起通过一场所谓的夺权控制了城市，并在2月初建立了作为新政府形式的上海公社。¹⁴²城市各个地区以及工作单位里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夺权活动。它们表明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指向一小部分“官僚主义”的共产党干部，而是所有被怀疑为是“走资派”的干部。这些干部遭到攻击并被免职。造反派不只是在与党的建制力量作战，实际上还在夺取权力。

¹⁴¹ Neutralize:[在战争中]消灭，摧毁（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东西），也可以译为使……中立、失效。

¹⁴² 关于文革在上海的局面，参见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apter 4.

此刻，人们不受控制地罢免党的领导人物，持续的派系斗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害。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失去对局面以及对权力的掌控。为了限制运动的发展，他们把运动对准“经济主义”，尤其是对准临时工组织。¹⁴³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派系红卫兵和造反者中挑拨离间，威胁那些不愿意合作的人。二月末，他们就顺势将上海公社转变成另一新的政府机构，即革命委员会。它由解放军干部，老干部¹⁴⁴和愿意合作的造反派领袖三者的所谓大联合组成。这一模式接着就作为模范用来在全国其他地方恢复控制。解放军军官和干部占据了革委会的主导地位，而造反派领袖大部分则位居次要地位，特别是在他们的组织被强制解散之后。

同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旧的党组织和保守派组织仍然主导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而在其他地方，夺权活动造成了派系斗争的恶化、行政和生产的进一步瘫痪，又或者在某些案例中，这些夺权活动持续恶化成暴力的、甚至像战争一样的对抗。¹⁴⁵解放军和革委会开始向全国的文革积极分子进攻，包括大范围逮捕、下放以及杀害造反派。1968–71年的清理阶级运动正式指向了党内的叛徒、间谍、“走资派”以及“黑”阶级分子。¹⁴⁶之后又有其他针对造反派的运动，比如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1971年针对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这些运动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执行，通过清

¹⁴³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16.

¹⁴⁴ Established party cadres: 也可以翻译成“被接受和承认的干部”

¹⁴⁵ 有关文化大革命不同轨迹的例子，参见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¹⁴⁶ “这场运动的死亡人数估计超过 50 万，至少有 3000 万人受到‘批斗’和酷刑”；Song Yongyi,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 1976),” SciencesPo, August 25, 2011, accessed January 6, 2021, <https://www.sciencespo.fr/mass-violence-war-massacre-resistance/en/document/chronology-mass-killings-during-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1966 – 1976.html>.

洗那些据称煽动派系冲突的阶级敌人来稳固新的政治秩序。”¹⁴⁷这实际上是最为血腥的一段时期：丹尼尔·利斯(Daniel Leese)报告称，“大约75%的死亡和90%的政治迫害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之后”，也就是1968年的年中之后。¹⁴⁸

解放军以及军队领导的宣传队的介入使得造反派内以及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得到了缓和。运动和下放活动通过将造反分子驱逐到边远农村地区和劳改营，成功地将他们赶出了城市。造反运动中那些激进批评社会主义阶级制度的潮流成为了暴力清洗、惩罚和下放的主要目标。中共当局将这些批评——比如由湖南省的省无联所构思的——叫做“毒草”。在造反被粉碎之后，中共领导人开始清除党和国家机关内任何在政治上构成危险的分子。许多干部被送到农村中用来进行“意识形态思想改造”的特别“学校”，亦或者被要求在工厂里做体力劳动。¹⁴⁹

如果不是毛泽东利用自己强有力的地位，那么不论是解放军对大型造反组织的镇压，还是从造反派领袖中挑选出一部分进入新政府的行为，都不会有这么顺利和迅速。造反派仍然将毛视作唯一的、神化的领袖并参

¹⁴⁷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00. 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央领导层既有造反派头目，也有周恩来等忠于毛泽东的老将。毛泽东有时偏袒造反派或左派的不同派别，有时偏袒更务实的资深领导人，这取决于他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动哪个政治潮流。合作和增选的造反领导人将扮演中共所谓左派的角色，与老干部和保守派对抗，直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见下文）。

¹⁴⁸ Daniel Leese,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6 - 1976*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16), 76 (translated by R.R.)；魏昂德写道：“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这场运动的结果——估计有 60 万至 80 万”；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7. 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亡的总人数是有争议的。根据宋永毅的说法，1966 年至 1976 年官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死亡人数平均估计接近 295 万；Song Yongyi,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 1976).”

¹⁴⁹ “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中国所有城市的办公室里几乎空无一人”；Walder, *China under Mao*, 270. “最初，这种‘下放’上班族的运动规模远远超过了青年下乡的规模，但持续时间较短……直到 1971 年，这种做法才开始衰落，而直到 1972 年农村营地才关闭”；ibid.

与到崇拜毛的风潮当中，这一点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毛反过来攻击造反派时，他们并不乐意调转枪口去反对毛、抵抗毛的攻击或者提出另一条道路。¹⁵⁰另外，不同造反派内部持续的紧张冲突，比如造反派的碎片化以及暴力的影响范围与带来的创伤，并没有提供任何能够指向更为激进的、能够超出现存社会主义阶级等级制的前景。造反派曾从对党的领导展开进攻转向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但却并没有冲破党国体制的理念，而是就哪一个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新党国的核心这样一个问题搞派系辩论。¹⁵¹

军管和林彪事件

1969年4月，中共领导层在九大期间恢复了运转。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重申了中共在文革前的纪律特点”。¹⁵²军事人员已经在全国占据了革命委员会领导中很大一部分位置，他们还在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及候补成员中有将近一半的席位。这两件事都标示着另一场“中国领导层的‘军事化’。”¹⁵³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市民被强迫参与英雄崇拜中最为奴性且幼稚的形式，几乎把毛当作超自然的存在，频繁地从他的‘思想’中攫取非凡的力量。”¹⁵⁴文化革命伊始，这一崇拜主要是用来动员群众，

¹⁵⁰ Wu Yiching,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 History, Class, and Chinese Postsocialism,” boundary 2 46, no. 2 (May 2019): 150.

¹⁵¹ 对于造反组织政治理念的矛盾，可以参阅Alessandro Russo,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6, no. 1 (Spring 1998): 179 – 202. 79

¹⁵²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203.

¹⁵³ Donald W. Klein and Lois B. Hager,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Quarterly 45 (January – March 1971): 52.

¹⁵⁴ Walder, *China under Mao*, 285. 关于对毛的神话与魔鬼学叙事，可参见Stefan Landsberger, “The Deification of Mao: Religious Imagery and Practi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yond,” in Chong Woei-Lien, ed.,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

但在这场运动的群众阶段结束之后，崇拜就变成了政治管束与控制的一部分。

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这一阶段的尾声，它预示着之后五年的混乱。林彪既是毛泽东宣布的接班人，也是解放军首长。他后来失去了毛的信任。1971年，林彪周围的人决定采取措施来保护他的地位。这些措施就是针对毛的一次未遂政变。¹⁵⁵而当中共领导层似乎是要向林彪报复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彪的妻子，也是政治局委员）和其它一些人设法乘坐一架军事飞机逃跑。飞机在外蒙古的一处沙漠坠机，没有乘客生还。直到一年以后，这些消息才在中国得到公开。毛泽东的接班人涉嫌的政变震惊到了许多人。同时，林彪事件也造成了中共领导层的实质性改变。“另外4个林彪的亲信，都是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后勤部队或操作部门的领导……不久就被逮捕，”，之后“超过四分之一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司令部的核心”被换掉了。¹⁵⁶大多数军事领导人把自己强大的政治地位输给了文职干部。

tlefield, 2002), 139 - 84; Barend J. ter Haar, “China’s Inner Demons: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 in Chong Woei-Lie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27 - 68. 对那些晦涩难懂的桥段，参见 Alfreda Murck, ed., *Mao’s Mango: Massenkult der Kulturrevolution* (Zurich: Scheidegger & Spiess, 2013).

¹⁵⁵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 - 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33 - 34; 关于林彪事件的更多细节，参见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 (London: Collins, 1983);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⁵⁶ 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35 - 36.

持续的派系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以及通过解放军的介入成功巩固了中共的统治之后，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派系一致认为有些东西必须得改改了。党领导人害怕发生类似于文革期间的那种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也担心由于派系斗争、社会不满以及毛主义号召力的耗尽而造成的党的瓦解。毛主义似乎已经不再是个有效的动员叙事，亦不能再能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但是党的领导层做出改变的方法，以及最重要的，经济重建应该走什么方向这两个问题上仍然发生了分化。一边是“行政”或“保守”派，他们包括文化革命前的领导人例如周恩来，“红色工程师”——即有着业务管理背景的政治家或者来自国家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以及名誉得到恢复的干部。¹⁵⁷与之相对的“激进”或“左”派则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步入领导层的人一部分，例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后来就被打成“四人帮”。左派（或是极左派）并不意味着这一派别选择社会革命。从许多方面来看，左派和保守派都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确保中共的统治。意识形态内斗的背后其实是职位、权力以及毛的接班人位置之争。各派系也都不同意某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第三个群体由华国锋（他很快将成为关键角色）领导，他们与保守派结盟，有着类似的温和立场、“最好称为文革的建制派受益者。”¹⁵⁸

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群体都与毛泽东这个党的领袖有关。毛泽东在日常政治事务中不怎么露面，但在重要决策上仍有最后决定权。他同情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捍卫其政治遗产的左派，但最重要的是，他想稳定中国

¹⁵⁷ 关于“红色工程师”的本义及其兴起，参阅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⁵⁸ 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34.

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因此，他允许控制宣传资源的左派和负责行政部门大部分工作的保守派之间进行政治竞争。他甚至支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在1968年作为第二个被贬的高级干部（仅次于刘少奇主席），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于1973年被召回，第二年被提升为副总理，为同样身处困境当中的周恩来总理有效地处理事务。

停滞与穷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根本转变被提上日程，但大革命结束后的结果却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吴一庆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表面上很激进，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划分，并且最终无法设想出一个用来替代先锋队型政党的可行方案。文化大革命使政权陷入深深的混乱，数千万人受到创伤，筋疲力尽，幻想破灭。”¹⁵⁹事实上，尽管出现了局部危机和经济混乱¹⁶⁰，但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影响没有具体事件所显示的那么严重。城乡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因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官僚机构继续以早年的方式剥削乡村”。¹⁶¹在镇压和整顿之后，军队不仅在政治重组和重建中共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1969年到1971年，经济要求也服

¹⁵⁹ Wu Yiching,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 150.

¹⁶⁰ See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8.

¹⁶¹ Maurice Meisner,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History,”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104.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中共政权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投资取得了回报，识字率、预期寿命和儿童死亡率的基准得到全面改善。

从于“军队对资源的要求”。¹⁶²三线建设被视为一个“新的飞跃”并继续进行。¹⁶³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试图减少城市失业，数百万（造反的）城市青年被勒令退学，一些城市工人被推到农村定居。与此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农民继续被当作“廉价”的临时劳动力雇佣。在整个60年代末和70年代前半期，工作单位被敦促减少城市雇员的人数，用临时工取代他们。“因此，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约有1300万至1400万农民在城市劳动局的授权下被允许进入城市。”¹⁶⁴然而，在1971年底，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在城市临时做工的农村移民被赋予了固定工的地位。随后，国有企业中的临时工比例下降。这是在中共内部派系冲突的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决定。¹⁶⁵

对于工作场所里的工人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可能是它部分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经理对劳动纪律的控制，工人也得以形成并表达出自己的批评意见。然而，劳动的分化和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几乎没有改变。等级制的工作和工资系统也是如此，工人、工程师和干部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唯一变动的是“部分且暂时的消灭了个人奖金制度，以及强调道德价值而

¹⁶² 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44.

¹⁶³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85–86.

¹⁶⁴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1. 柯比报告说，从1966年到1976年，有1300到1400万农民进城，1700万知青下乡；R. J. R. Kirkby,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London: Routledge, 1988), 119.

¹⁶⁵ Michael Korzec, *Labour and the Failure of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28. 安舟表示：“国营单位中没有固定身份的雇员比例从1970年的14%急剧下降到1972年的6%，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到1976年，它“再次达到14%”；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48.

非物质刺激的意识形态运动。”¹⁶⁶这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内重拾大跃进理想的左派所给的压力。在他们看来，“艰苦奋斗”是策略的一部分，工人被要求“勒紧裤腰带，一切为了建设”。¹⁶⁷

已经分裂成保守派和左派的中央领导层仍然用镇压来回答社会的不满与不从。运动紧随在文化大革命的军事镇压之后，既对准“坏分子”（仍然与建国前的阶级背景有联系）也对准在60年代末的“经济主义”骚乱中活跃一时的工厂造反派。“恐怖的武器现在转而用来恢复劳动纪律。工人要是不对工作负责，就有可能被控告成反革命；无薪加班被说成是‘忠于毛主席的工作’，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是清楚的威胁。”¹⁶⁸，然而，尽管中共在工作单位重建了自己的支部，替换掉了任何文化革命期间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当局仍然无法再将纪律和控制恢复到50年中叶的那种水平上去了。针对（前）造反派——现在叫做“阶级敌人”——的清洗和运动接二连三，但是并不能消灭他们。相反，不满的工人们现在学会了“怎样用中央的流行话语和运动指示当作掩护，从而按照自己的信念从事并追寻自己的利益。”¹⁶⁹造反的技能不仅用在工作场所里的对峙上，还用来进行政治抵抗行动，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¹⁶⁶ Meisner,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 104.

¹⁶⁷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86. 保守派同意通过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振兴社会主义经济，但愿意为工人引入更多的物质激励，为农村公社成员提供更大的私人土地，以及更多地利用市场。

¹⁶⁸ 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Elizabeth J. Perry, ed.,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1 94.

¹⁶⁹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43.

中美友好关系的重建和四个现代化

中共领导层内、全国上下和工作场所中的派系斗争形塑了整个70年代的前五年，这五年里既有相互抵触的运动，也有左派和保守派二者间主导地位的来回变动。中共领导层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的斗争阻碍了关键性改革的实施——只有一个例外。毛和保守派都决定要改变权力的地缘政治平衡。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被重新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一步。面临着美国和苏联政权的双重威胁，中国为了防御措施不得不动员大量的资源。十年之后，中共当局决定同敌人之一站在同一边。一方面，中国和苏联在整个60年代一直都是保持着紧张态势。1969年3月，这一紧张局面甚至导致双方在边境河流乌苏里江的一个小岛上发生短暂的军事冲突（即珍宝岛事件，译者注），196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动员起来以应对据称苏联即将发起的攻击。1978年12月，苏联的盟友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政府，局势更加紧张。中国共产党担心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扩大，并在1979年2月和3月对越南开战。¹⁷⁰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美国政府代表进行的非正式的所谓“乒乓外交”为中美友好关系的重建开辟了道路¹⁷¹。1971年11月，中国加入了联合国，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席位，取代了台湾的位置。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北京。中共政权“从越南打败美国的事件中获益匪浅”，这在当时已经可以预见。美国政府被迫重新估计其在亚洲的战略，这为中共领导层创造了一个机会，“以缓解中国的孤

¹⁷⁰ “中国政府在给〔越南〕任何教训方面都非常失败。相反，解放军学到了一个教训：它没有准备好与像越南这样久经沙场的军队作战。尽管战争持续时间很短，但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是巨大的”；Rebecca E. Karl,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5.

¹⁷¹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毛泽东邀请访华。这一事件被解释为也为政治接触打开了大门。

立”¹⁷²。保守派尤其看到了一个机会，即利用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来获得现代技术并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此来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¹⁷³与之前的自力更生政策不同，1972年，中国开始从先进工业国家进口工业技术，其中主要是生产化肥和人造纤维的工厂¹⁷⁴。“197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低点，但到了1975年，对外贸易增长了两倍……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启了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变。”¹⁷⁵

然而，经济发展并没有像政权所希望的那样顺利，新的对外贸易活动导致了国际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在1974年至1976年期间，经济政策的制定由于左派和邓小平身边的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而陷入瘫痪。”¹⁷⁶尽管生命垂危，周恩来总理还是和邓小平一起推动了进一步的改革。1975年，周恩来重新提起四个现代化，这是他在60年代初首次制定的计划。它包括对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大规模投资。¹⁷⁷1975年，邓小平委托有关部门编写了三份被左派称为“三株大毒草”的文件，这些文件“准确

¹⁷² Richard C.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9.

¹⁷³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贸关系继续发展，在70年代时断时续，后来更加稳定。他们受到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制造业向东亚（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四小虎国家，然后是中国和东南亚）迁移的刺激。在之后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更多相关信息。

¹⁷⁴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193.

¹⁷⁵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82; also see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hapter 7; Philippe Lionnet, “Anpassung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ie Scharnierjahre 1974/1975,” in Ulrich Mähler et al., eds., *Jahrbuch Historische Kommunismusforschung 2020* (Berlin: Metropol Verlag, 2020), 155–71.

¹⁷⁶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87.

¹⁷⁷ “周恩来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改革者。他是‘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强有力的倡导者，邓小平经常因‘四个现代化’而受到赞扬，然而实际上他仍然与毛保持密切关系并且没有推动政治改革”；Michael Dillon, *China's Rulers: The Fifth Generation Takes Power (2012–13)* (London: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2012), 12.

地预示了”将在1978年后正式实施的政策。¹⁷⁸这些文件“着重强调……控制、打击无政府状态和完成生产目标”。这些文件“指出了巩固、合理化和克服文化大革命中工厂改革所产生的过激行为的方向。”¹⁷⁹“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但在其推行之前，必须克服领导层的派系冲突。¹⁸⁰又是一场民众抗议运动——1976年4月的所谓四五运动——打破了僵局，中国道路开始了自己的过渡期，它最终将把国家从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

概述：仍然等待着革命

社会主义，正如它在50年代的中国的形态一样，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造成的结构。它之所以在当时是革命的，是因为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国家政权的指挥者，而且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切中要害的修正。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这段社会主义时期中，中共领导层从来没有按照严格的计划或红线行事，而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编版，试图维系并强化党的统治，但是中共当局的这段历程也并不总是循规蹈矩，其行动偶尔也会相互矛盾。中共当局常常只是为了回应国内的阶级冲突以及国家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而做出行动。

面对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大面积社会动荡，中共当局采取的是遏制策略，将镇压、让步和拉拢三种策略结合在一起，而这之后

¹⁷⁸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194; 这些文件的英文版本可以从 Chi Hsin, *The Case of the Gang of Four* (Hong Kong: Cosmos Books, 1977). 中被找到。这些文件是由邓小平当时控制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的。

¹⁷⁹ Mark Selden,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42.

¹⁸⁰ 有关那些决定性冲突及其如何被“解决”的更多信息，参见Alessandro Russo,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 *Modern China* 39, no. 3 (May 2013): 239–79.

便是更加综合性的改革，例如大跃进。在之后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这段转型期还有紧接着的资本主义时期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模式。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中共在农民中间失去了合法性，以及工人由于社会歧视、破碎的希望以及对未来感到迷茫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最终决定重新激发社会主义工程的活力，向党的官僚机构内的“走资派”进攻，自己也重新回到掌舵的位置。但是，由于社会的不满，由于新的底层阶级如临时工、农民工、再安置城镇人口以及下放青年为物质改善所做的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政权本身的反对，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已不再在他的掌控之中。来自以上社会背景的异端思潮群体发展出了一套激进的批评——实际上，这一批评正是基于毛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并超出了毛泽东本人加于毛主义思想之上的内容。

当造反运动和他们中一些人的颠覆性批判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时，党的领导层就找来了解放军。由于这种镇压、对造反领袖的成功拉拢，以及造反团体内部的分裂、冲突和矛盾，造反派们的运动无法将造反继续下去，也无法遵循反对社会主义阶级制度的更激进的议程，于是造反失败了。因此，中共政权在无产阶级的进攻和6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濒临崩溃中幸存下来，但如果它要长期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它进行了经济改革并改变了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是为了减少外部压力并获得外国资源和技术。回过头来看，1971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几年，乃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过渡开始了，它将引导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尽管这在当时还不明显。

第三章：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中叶，转向资本主义

这一章主要描述从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阶段结束至90年代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的过程。与上一个阶段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到反复的动乱，以及紧随其后的镇压、妥协、拉拢和最终改革的循环。群众的抗议曾多次被标志为历史的转折点，而这一时期的群众抗议开始涵盖政治变革和民主参政方向的要求。1976年初，前总理周恩来的逝世引发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两年后，北京等城市兴起的民主墙运动则阐述着对更民主，更开放的社会主义理念的诉求。

虽然四五运动被残酷的镇压了，但在1976年夏末毛泽东去世之后，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政变，解除了左派政敌四人帮的权力；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团体恢复了名誉并重新掌权。它接受了对民主化的要求，并在1978年正式宣布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几年之内，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村家庭，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政府开始允许外国资本在新划定的经济特区内投资，而乡村移民也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在80年代中期，政府引进了劳动合同和劳动力市场。计划经济和城市工业的逐步转型逐渐导致了经济紊乱、干部腐败和社会动荡等问题。这些改革同时还导致了性别关系的重构：官方通过干涉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推行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劳动力方面的性别歧视也参与了新兴工厂和城市服务业对女性^{*}农民工的剥削。尽管如此，党和国家对日常生活、经济方面和对移民控制的放宽也为女性^{*}掌握自己的命运提供了新的机会。

80年代，罢工和学生、工人之间其他形式的社会动荡最终将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达到顶点；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数百万人在许多城市呼吁着政治开放、清除腐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党的领导人则又一次用人民解

放军来摧毁这些运动。当东欧的社会主义政体崩塌时，中国的共产党成功的维持了自己的政权，紧接而来的便是为期数年的镇压和保守主义回退。1992年后，统合过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恢复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农村向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大规模移民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同时，共产党加快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造和对原国营企业的改组和私有化，形成了现在的国有企业；这一进程也标志着向资本主义的最终转型。

不满：社会斗争和民主化运动，1974-1980

劳工间的要求政治变革的不满和抗议早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前就已出现，并在1978年官方宣布改革开放后持续不断。这种行为的增长是工人们对剥削、压迫和70年代早期开始的清除异己行为的回应。他们奋力争取另一种社会主义的行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是一种挑战。在促进1976年解除共产党中左派的权利之后，他们也促进了邓小平派系在1978年后推进改革开放政策。

劳工的不满

在70年代的前五年里，工作单位和群众组织中的派系斗争、领导干部的腐败与专制、较低的工资收入与住房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的抗议。自1973年起，参与抗议的活动家们利用共产党批林批孔¹⁸¹的口号来推进经济方面的诉求。他们“在反对导致分配或劳动不均的激励制度、抗议自己被剥

¹⁸¹ 批林批孔运动在1976年正式结束，但从1974年起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担心活动失控，活动的规模开始减小。这次运动由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左派发起，并提供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左派解读。活动的目标是攻击党中的保守派人物，包括总理周恩来；还有部分动机是动员激进群众来为1968年起被迫害的反抗者们平反，并为先前的活动积极分子谋求党内席位。

夺技术性决定权、坚持自己有过问工厂生产计划权力、抗议艰苦的工作、医疗、食物条件和反对干部特权方面有时相当激进”¹⁸²。工人们离开车间，参与派系斗争并反复施压，要求落实自己的诉求。共产党的左派领导人则在1974年初发起了另一场关于整治干部特权和“走后门”现象等腐败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工人们之间过于受欢迎，最终在一个月后被中止¹⁸³。在这一阶段的劳工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抗议者已经掌握了大规模进行自发组织并发起抗议的能力，这类自发组织与抗议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常见。激进的修辞手法常常“混杂着劳工的诉求（与1966年起被忽视和压制的那些诉求相同）”¹⁸⁴。在数次动员中，抗议的工人们重新恢复了他们60年代期间的联系；但抗议的学生们由于60年代后期的上山下乡而很难恢复这种联系。与大学中不同，许多工作单位中的派系斗争在解放军的镇压后仍在继续。

共产党被工人们的行动所惊动，并在1974年4月发布了“12号文件”，禁止“自发性群众运动”和工作单位、地区间的串联¹⁸⁵。然而，抗议的浪潮不曾停止，最终在1974年的夏末，广州发生了白云山事件：“由工厂工人和下乡青年为主的数十万人一同攀登白云山，表面上是按照中秋节的传统纪念先祖；但实际上其中许多人试图通过这次机会来抗议干部特

¹⁸² Stephen Andors, “The Dynamics of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Industry: Initiators, Leader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8, no. 4 (1976): 37–46.

¹⁸³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145.

¹⁸⁴ 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Elizabeth J. Perry, ed.,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196.

¹⁸⁵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2.

权和其它不平等现象”¹⁸⁶。在1975年，诸如武汉和杭州等地也发生了一系列相似的运动和罢工活动¹⁸⁷。

李一哲和社会主义民主

左翼异议人士发源于60年代后期的抗议活动，并推动了70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广州的李一哲集团。¹⁸⁸它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1974年4月发表的《广东怎么办？》是自红卫兵和抗议组织解散后发表的第一篇未署名大字报，用以吸引群众关注。这篇文字标志着“大字报战争”的开端，这一事件以海报为主体，攻击干部特权，要求平反文革期间受害者。¹⁸⁹这些大字报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都有出现。

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李一哲集团攻击了他们认为的以林彪为首施行的“压迫性的极左政策”，攻击了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称“专制和压迫是官僚系统的风土病”。¹⁹⁰另一份标题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则哀叹“‘新兴资产阶级’——一个‘压迫人民群众来促进自己的个人特权’的‘新权贵集团’已经兴起”，同时提及了工资长期以来的停滞。¹⁹¹这份大字报将对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两年后的民主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影

¹⁸⁶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5), 8 - 9.

¹⁸⁷ Andrew G. Walder,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China Quarterly* 127 (September 1991): 468 - 69.

¹⁸⁸ 李一哲集团由郭鸿志、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四名前红卫兵组成，他们从各自的名字中截取一字作为他们的笔名。

¹⁸⁹ Chan, Rosen, and Unger,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5.

¹⁹⁰ 同上, 10-11.

¹⁹¹ 同上, 12; 全文在Chan, Rosen, and Unger,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31 - 86, 以及 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 - 198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4 - 45.

响。它展示了70年代抗议运动的复杂动机：对紧缩政策和经济指令的不满、以及对社会主义阶级统治系统的批判。¹⁹²

不仅如此，李一哲集团大字报的大范围传播使他们在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也起到了作用。保守派的地方干部们用这些材料向左派干部施压，李一哲集团的成员也参与了对官员的施压，谋求为某些60年代末被军队迫害的人平反。然而，在李一哲集团的批评变得更加直率、涉及政治基础（如，发表《社会主义民主》一文来反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时候，共产党中央保守派和左派的领导人一齐发动了报复行动。李一哲集团的成员被逮捕并在大量的“批斗大会”上羞辱、甚至勒令停学。¹⁹³

四五运动

70年代中期，不满与抗议行为最终酝酿出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安舟把这场运动视作是保守派对批林批孔运动中左派攻击“官僚阶级”和党的回应。¹⁹⁴这次运动被保守派集团主导，用以对抗领导集团中的左派，这次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并有着不同的派系归属。

¹⁹² 江淑菡在文本中评论：“政治与经济需求的互相结合成为了工人抗议活动的特点之一，并贯穿于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46. Chan, Rosen, and Unger则强调红卫兵对活动的推动作用。由于许多年轻人具有城市白领的家庭背景，“年轻人有理由对1968年前激进派与共产党的‘反布尔乔亚’政策感到敌对。他们中许多人在1968年后被迫参与上山下乡，他们‘家人的地位与安全’也受到了侵害。Chan, Rosen, and Unger,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6.

¹⁹³ 同上, 13-15. 在1977年3月，他们遭到了监禁；在1978年12月，当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需要利用先前对极左派系的批评时，他们得到了平反；同上, 15-17. 两位主要的参与者李正天与王希哲维持了政治上的活跃性，但根据Chan, Rosen, 与Unger的描述，“他们声明自己支持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他们两人开始偏向于支持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上, 19.” 批斗大会“是在50、60、70年代开展的集会；在会议上政治嫌疑犯或阶级敌人被迫使发表自我批评并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犯下的错误。批斗大会期间可能包含羞辱与击打、后续还有可能出现其他迫害方式甚至处决。

¹⁹⁴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56 - 57.

活动的起因是1976年一月官方对周恩来去世的处理。3月28日至4月6日期间，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南京、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不断增长的示威运动并与安保力量发生了冲突。¹⁹⁵群众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是一次反对共产党左派领导人的声明，他们在当时被认为不仅需要为60年代以来频繁的迫害和压迫，也要为低收入和低福利紧缩政策负责。由停学学生和前红卫兵组织成员组成的年轻工人们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验帮助他们重拾了抗议活动的传统，“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的“五大自由”和“造反有理”再一次成为群众的诉求。¹⁹⁶工作单位之内和之间的抗议群众都进行了协调与统筹。

江淑菡（Jackie Sheehan）认为，四五运动是一次底层草根群众大规模的情绪爆发。在她眼中，工人们大规模的公开反对共产党的左派领导是因为“由无尽的政治学习会议灌输的、教条的毛泽东思想的幻象已经被经济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跌所打破。”¹⁹⁷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也将这场运动描述为长期发展之后的结果：“群众集体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手段和内容感到厌倦，并对覆盖生活全方面的‘高压阶级斗争’开始反抗”。¹⁹⁸

对于政府——特别是党的左派领导人来说，这种规模和影响力的运动极具冲击力；他们迅速宣布这是“反革命”的，并在系统性的组织得以建立前镇压了这次活动。抗议的组织者们遭到了系统性的迫害；左派领导

¹⁹⁵ 这个数据是由各个城市的抗议人数相加得到的；Sebastian Heilmann, *Sozialer Protest in der VR China: Die Bewegung vom 5. April 1976 und die Gegen-Kulturrevolution der siebziger Jahre*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4), 93 - 94. 四五运动的名字表明示威运动起始于1976年4月5日，即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是中国人用以纪念逝者的日子。最大的示威行动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因此也被称为天安门事件。

¹⁹⁶ 同上，130.

¹⁹⁷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48.

¹⁹⁸ Heilmann, *Sozialer Protest in der VR China*, 2 (translated by R. R.).

人们通过升级对“右倾错误”和党内保守派领导人邓小平的攻击来打击报复。¹⁹⁹对于党内保守派成员来说，四五运动是一次警告，“让他们真正意识到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党与人民的关系迫切需要做出改变”。²⁰⁰

民主墙运动

在1978年官方宣布开始改革之前，另一场民主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这场运动发源于对1976年以前“右派分子”和其他受害者所受迫害的平反，以及要求官方撤回对四五运动负面评价的一场公开辩论。1978年10月起的整个冬天，北上广等地出现了大字报。在北京，许多大字报集中在靠近市中心西单街的一堵砖墙：西单民主墙上。活动的大部分参与者是“与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的“国有企业的体力劳动者和技术人员”。²⁰¹许多大字报呼吁人权、提倡民主，或是批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一些海报明显的受到过先前辩论活动，特别是李一哲集团文本的影响。²⁰²人们还提及了城市住房短缺、住房标准低、不平等、公权力滥用和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²⁰³班国瑞(Gregor Benton)写道，“民主化运动尝试通过组织、宣传以及为要求提高工厂中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斗争活动进行辩护来扩大群众基础”。²⁰⁴70年代末期开始，冲突和不满情绪再一次在车间里出

¹⁹⁹ 这是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前左派的最后一次进攻。关于四五运动，详见Sebastian Heilman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 no. 3 (Winter 1993): 1 - 19; Frederick C. Teiwes and Sun Warre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 - 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471ff.

²⁰⁰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51 - 52.

²⁰¹ Gregor Benton, ed.,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4.

²⁰² Göran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er and Big-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Copenhagen: Curzon Press, 1990), 74.

²⁰³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59 - 61.

²⁰⁴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120.

现，并在墙上的海报里随处可见。这些海报最常攻击的是工资和奖金的不平等分配问题。

民主墙运动持续到了1980年，直到东欧的变局改变了政府对负面议论的容忍度——情况与1957年的百花运动相似。1980年8月，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媒体报道了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发生的野猫罢工。²⁰⁵中国共产党担心相似的罢工也会在中国发生，这种担忧贯穿了整个80年代。²⁰⁶与1957年不同的是，1978–1980年间的草根运动导致了一大批非官方刊物和其他信息源的产生；这些刊物和大字报的出版者仍然是曾为红卫兵的工人和学生，他们又一次运用了自己政治斗争和挑战权威的经验。²⁰⁷

这些出版者的多样性使得7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民主运动表达了大量城市人口的不满；他们向社会主义体制施压，希望能够改革。然而，共产党领导人中的改革派很快镇压了这些运动，这些运动的大部分目标最终都没能实现。

²⁰⁵ 关于对“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ność movement）和波兰格但斯克在1970、1980年间罢工的概述，详见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⁰⁶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82 – 87;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73, 179, 186; Jeanne L. Wilson, “‘The Polish Lesson’ : China and Poland 1980 – 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nos. 3 – 4 (Autumn – Winter 1990) : 259 – 79.

²⁰⁷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56;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13 – 14; 及 Chen Ruoxi,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14 – 15. 以电工、前红卫兵魏京生为中心有一个派系；他有着更加激进，或者说，更加自由化的观点。在他《第五个现代化》的文本中，他认为在四人帮集团覆灭后“可憎的旧政治体制并没有改变，谈论人们期待的自由与民主依然是被禁止的。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Wei Jingsheng,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weijingsheng.org/doc/en/THE%20FIFTH%20MODERNIZATION.html.

改革：改变和危机，1976-1989

共产党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利用民主运动的呼声来压制经济改革的阻力，最终却又镇压了这些民主运动。官方在1978年推行了改革开放。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即将包括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村家庭、提升地方干部和工作单位管理人员地位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引入。这场改变同样带来了对性别制度的改变、紧缩的人口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女性*化的农业生产，并对城市和进城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统治的阶级也发生了转变，党的干部开始接受公有资产并利用职位之便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这场改革对部分人来说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但也带来了政府所低估的新经济的扭曲与干部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即将带来共产党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将要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

妥协和破裂

在7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中的部分活动家站在了当权的改革者一派。他们“已经做好了将事务托付给新组建的邓小平政府的准备”²⁰⁸；其他活动家则仍在批评政府系统。这些活动家们曾属于文化大革命和四五运动期间的抗议者团体。“他们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分析表明，一个‘好’的官僚成为了毛泽东曾主持的系统的领导人；现在并不是应当袖手旁观的时候。”²⁰⁹一本前红卫兵领导人陈尔晋在1976年发布的小册子在1979年被再度出版：他引用了毛的观点，呼吁通过一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来“改

²⁰⁸ Benton,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5.

²⁰⁹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57.

变党的专政和专政带来的任人唯亲、保守主义、奴性和官僚主义”。²¹⁰其他人引用了更早的劳动者民主的历史来批评现行系统，如吕敏（音译）在文字称应当“逐步废除官僚系统，效仿巴黎公社建立民主政体”。²¹¹

邓小平起初对针对旧体制的批评与要求改变的呼声是持部分肯定态度的。²¹²他的派系可以利用这些批评来在党内推进自己的改革议程、获得权力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但当许多地方草根集体和非官方出版物的影响力逐渐巩固起来时，他的态度改变了。自1980年9月起，工人骚乱再度增加，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声开始出现。邓小平察觉到了其中对共产党存在的威胁，并声称这次运动和其中的激进人士“具有破坏性、用心险恶”²¹³。实际上，“党比‘民主墙’的活动家更早预知到了持异议的出版物与工业生产上的骚乱、工人自发组织运动之间的危险联系”。²¹⁴邓小平划定了任何反对运动都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²¹⁵在那之后，大字报受限、运动逐渐停息，许多参与者被捕。

正式改革开放

在民主运动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开始做出改变。1976年一月总理周恩来去世之后，华国锋（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并不是邓

²¹⁰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89; 关于论文，见Chen Erjin, *China—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4).

²¹¹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91. 这些辩论引用了“大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自由且具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论述；同上，94.

²¹² 邓小平说，“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同上，31

²¹³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78.

²¹⁴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193.

²¹⁵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33.

小平)成为了代理总理。在左派反对他关于经济改革的计划之后，邓小平还受到了第二次迫害。然而，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风向又一次改变了。左派四人帮和他们的部分支持者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²¹⁶在1976-1983年间的一系列迫害中，数百万激进派和左派被开除公职或从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开除。“数千名前活动领导人和活动家入狱，许多被判以长期监禁。”²¹⁷

根据毛的遗愿，华国锋在1976-1981年间同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然而，在没有左派人士阻碍之后，邓小平迅速重登政治舞台并重获影响力，一大波被平反的干部的地位也迅速上升。²¹⁸在明面上由华国锋进行统治，暗地里由邓小平操纵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人推进了一些政治改革，包括1978年新宪法的落实。²¹⁹这部宪法试图构建一个强权国家来控制转变的过程，并限制党内和党外各种形式的阻力。如丹尼尔·里斯 (Daniel Leese) 所说，“在政治精英的层面上，1978年后的改变与其说是一场新的开始，不如说是把党的领导人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状态。”²²⁰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定性并称1966-1976为“十年动乱”来给这种复辟正名。1981年，党通过对四人帮和毛泽东责任的审判来对文化大革命划上句号并对文化大革命定

²¹⁶ 详见Alexander C. Coo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ial: Mao and the Gang of F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i Hsin, *The Case of the Gang of Four* (Hong Kong: Cosmos Books, 1977); 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 *World Politics* 31, no. 1 (October 1978): 26–60; Edoarda Masi, *China Winter: Workers, 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New York: E.P. Dutton, 1982).

²¹⁷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66.

²¹⁸ 这些恢复名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日子里曾被作为“右派分子”排挤或驱逐。关于恢复名誉和平反，详见Lee Hong-Yo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²¹⁹ 它在1982年再次被改变。

²²⁰ Daniel Leese,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76 – 1976* (Munich: Verlag C.H.

性，并表明自己将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改革）年代。当年的官方决议声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²²¹

类似周恩来和邓小平早年曾安排过的经济改革政策在1978年正式推行。在农民、工人、底层官员和新兴企业家们一系列非正式甚至理论上违法的行为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回应。受官方管控的经济转变逐渐成型，巨大的计划经济体一步步迈向了更宽容私有化和外国投资、贸易的方向。政府常常用试错机制来实验和引进新的市场制度和经济机制，并在试点成功后大范围推行。然而，政府依旧要求所有新生的经济结构与机制仍在自己掌控之中。

农民领路

第一次大变革发生在乡村；在70年代末期，全国8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居民。70年代末期，部分地区的农民开始违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私下里重新划分并分配土地。²²²不过这只发生在部分地区；而当1979年共产党正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许多地区被强制去集体化。²²³在这个新系统下，任何农村居民都有权持有一片土地，无论这片土地曾经是属于公社还是村集体。在实际分配上，村集体常常是把一片土地出租给一户（比

²²¹ 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2020年10月20日公开。

²²² 关于这类违反、抗议、改变形式与要求的行为，详见John P. Burns, “Chinese Peasant Interest Articulation,” in David S.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diff: 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4), 126ff.; Thomas P. Bernstein, “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4ff.

²²³ Xu Zhun, *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 How China’s Peasants Lost Collective Farming and Gained Urban Pover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chapter4. 官方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始于1982年，但这套系统在1978年就已开始在部分地区施行。

如说，租期30年）。农民生产的一部分作物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给国家收购，剩余的粮食则可以在市场上以自由的价格出售。这套有着两套价格的“双轨制”系统在维持了计划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允许了更多市场因素²²⁴；国家仍然控制着大部分的分配环节，并推行了一系列税收制度。在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去集体化过程中，许多原本由集体提供的农业、公共设施、教育和医疗也一并消失了。²²⁵

改变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推进着，直至1984年，全国大部分的公社体系都已经废除。新的家庭生产规模依然很小，而从70年代开始，生产力农业产出、农民收入都得到了提升。²²⁶家庭生产制度的重新建立和生产力、收入的提升创造了过剩的劳动力。而由农村集体工业发展出的新兴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中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扩张中的城市和城市服务业（如家政服务或者性服务）都渴求着这份劳动力。

与此同时，在乡村去集体化之后，之前的农村公社必须转变为行政村。在财政去中心化废除了其他收入来源后，地方政府急需地方税收作为收入来源。80年代，地方政府提升了税收力度，这使得农民之间的不平等

²²⁴ 详见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104ff.

²²⁵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见Peter Nol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An Analysis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Philip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Zweig, *Freed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ernstein, “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204ff.; Ye Jingzhong,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no. 3 (July 2015): 318ff.

²²⁶ 许准认为直至80年代中期，产量增长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而是在于其他生产因素（如化肥）的投入使用。Xu Zhun, *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 chapter 3.

进一步恶化。²²⁷地方“掠夺性政策”和“圈地运动”的兴起抢占了数千万农民家庭的不动产，并引起了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农民抗争运动。²²⁸

城镇劳动力改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共产党政府通过提高工资、提升福利保障和住房条件、设立职代会等方式提升了城镇企业工人的条件。这些政策受到了民主墙运动的影响，是政府“赢得产业工人、特别是先前遭到迫害的激进工人的支持”的手段。²²⁹波兰1980年的罢工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政府担心同样的事件也会在中国发生。政府还向城镇国有企业施压，令其创造工作岗位来吸收1976年后返回的下乡青年；同时，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城市青年也需要一份工作。

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了第二轮改革并尝试逐渐对城镇中劳动力等级制度、雇佣关系、工资结构和福利制度做出改变。它声称由（部分）工作单位提供的终身制职业岗位和福利制度，即“铁饭碗”，是“系统性的错误”并且“不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²³⁰由于先前的终身雇佣制，政府宣称城镇工作单位低效、冗员（因为单位无权辞退任何一名员工）。一场反对“铁饭碗”和“吃大锅饭”，并将这些行为与文化大革命左派和四人帮极端主义相联系的运动开始了。据陈佩华（Anita Chan）所说，“这

²²⁷ Marc Blecher, “Inequality and Socialism in Rural China: A Conceptual Note,” *World Development* 13, no. 1 (1985): 115–121.

²²⁸ 关于“掠夺性（国家？）政策”，见Alvin So,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 133ff.; 关于“圈地运动”的更多信息，参见Kathy L.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Everyday Peasant Politics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8, nos. 2–3 (April 2008): 471–72; 关于农民斗争的更多信息详见下一章。

²²⁹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73.

²³⁰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06.

样的批评占据了大众媒体，并在国家经济重建的关键时期压过了对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呼求”。²³¹

工业政策与计划方面的宏观层面改革与企业和劳动力方面的微观层面改革同时进行。计划部门与企业逐渐分离，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市场因素的参与；国家计划对国营企业的约束也逐渐放宽，允许它们在缴纳利润税的前提下保留更大份额的收入。1982年，政府从宪法中删除了罢工权，并在之后的几年里着手推进企业改革，如1984年的厂长负责制。这套系统强化了工作单位的管理能力，降低了新工人工作稳定性和福利制度，并引入了更多泰勒主义管理学的内容。新招收工人的岗位从1986年起由有限期劳动合同取代，工业企业中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比例迅速提升。

“1976–1984年间这个（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比例稳定在14%–15%，在1989年这个比例激增至26%。”²³²

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比如，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早些时候，部分工人会被给予劳动合同；合同工的命运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工斗争的导火索之一。实际上，“80年代末期的合同工在企业中与他们60年代的前辈们境遇相似，他们常常没有和长期工人平等的权利”。²³³已经通过包分配获得了长期工作的工人直到90年代中期之前都不会受到合同工制度的影响，但在80年代末期这套系统便已经引发了人们对工作稳定性的担

²³¹ Anita Chan,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January 1993): 40–41.

²³²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84.

²³³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06; also see Chan,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40; Wang Shaoguang, “From a Pillar of Continuity to a Force for Chang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Movement,” in 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185; Pat Howard,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The Urban Contract Labour Syst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5 (January 1991): 100.

忧，甚至在80年代末引起了一番恐慌。²³⁴与此同时，城市工人知晓了农村收入的提高，并为自己要求物质上的利益。这与改革的其他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管理者独断、干部腐败等）一起引发了人们逐渐增长的不满情绪。“老工人公开[抱怨]他们并不是为了回到恐惧和职业焦虑中而斗争”。年轻工人则要求，在自己放弃“铁饭碗”之前，干部们应当先放弃自己的“金饭碗”。²³⁵

移民与经济特区

第三项改变同时影响了乡村和城市。早在1978年官方开始改革之前，数百万下乡学生返回了城市，成为了“计划外的人”；政府试图将他们遣返并将工作岗位留给城市的无业者。²³⁶然而1978年以后，许多下乡青年再度返回城市并要求获得工作和城市户口。这并非唯一的大规模人口迁移；80年代，更高的农业生产力使得农村劳动力盈余日渐增长。乡镇企业吸收了这份过剩劳动力的大部分并迅速扩张。在地方干部的合理运营下，乡镇企业直至90年代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并生产从农具到消费品的一切产品。²³⁷乡村过剩劳动力剩余的部分也推进了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自农村的移民希望逃脱乡村低下的生活条件，并在城市寻求更高收入的工作。国家也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上的改变；户口制度变得更加宽松，以允许更多乡村居民进行移民。他们中许多人搬到了设立的经济特区

²³⁴ 王绍光，“Deng Xiaoping’s Reforms and the Chinese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in Paul Zarembka,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13 (London: JAI Press, 1992), 163–197.

²³⁵ Howard,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114.

²³⁶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2.

²³⁷ 关于乡镇企业，详见William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的工业区。1980年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特区，吸引了许多外国（尤其是香港）投资者建立了中外合资企业。1984年，十四个沿海城市成为了经济特区，这一次政府允许外企设立独资公司。不过直到那时，FDI（国际直接投资）的份额也没有超过GDP的1%。1992年，在邓小平臭名昭著的“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对外国投资者进一步放开，FDI在GDP中的占比上升到了5%-6%。²³⁸新的移民人口，通常被称作“农民工”，不得不保留乡村户口并在经济特区的工厂或者城市其他低收入部门工作，包括建筑业、餐馆、性服务业和家政服务行业。²³⁹

性别关系的重构

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和国有结构基本上接管了父权制家庭的控制功能。女性*被要求无偿进行育儿工作，并且在大部分时候也参与劳动——具体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需求。女性*权益得到过数次改善，如建立新的离婚制度法律框架和在家庭之外参与工作的法律权利；但总体上是继承了父权制文化。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还带来了对性别关系的重构，包括父权制压迫的进一步强化、但是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通过斗争更好的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

人口政策的改变首当其冲。在70年代早期之前共产党政府一直呼吁大量生育，因为社会主义未来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劳动力。²⁴⁰但当出生率高到成为经济发展的威胁的时候，政府又尝试降低生育率。1973年，政府发

²³⁸ Tobias 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177 – 78. 在1992年1月到2月的“南巡”期间，邓小平视察了广州和上海的部分城市和经济特区，并强调中国应当继续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

²³⁹ 关于经济特区和移民工人的处境与斗争，见下一章。

²⁴⁰ 见Tyrrene White, “The Origins of China’s Birth Planning Policy,”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sa Rofel, and Tyr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1.

起了一场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活动。到1978年时，生育率已经得到了可观的降低。²⁴¹然而，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集体农庄的废除，许多过去由提供的教育、健康、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福利制度都一并被废除了。这意味着“乡村家庭开始将养儿作为一种养老手段。因此，政府不得不采用更加紧缩的政策来限制人口增长”²⁴²并推行了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在这个政策下，绝大多数女性^{*}都被迫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如果没能遵守，她们将受到强制堕胎或流产、支付罚款或者失去工作的惩罚。²⁴³

在逐渐收紧对于女性^{*}身体和生育的控制同时，对女性^{*}身份的定义也在改变，非法同居和卖淫行为再度兴起。戴锦华认为从80年代起，女性^{*}成为了牺牲品，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被重新定义。²⁴⁴新生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强烈的性别歧视，男性和女性^{*}雇员之间的

²⁴¹ Martin K. Whyte, Wang Feng, and Yong Cai,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China Journal* 74 (July 2015): 158,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447103_Challenging_Myths_About_China’s_One-Child_Policy. 70年代的期间的活动并非强制性，但80年代的一胎政策执行采用了强制性手段并使其变得名声狼藉；同上，150. 60年代开始，党开始严格的限制年轻人对自己身体与欲望的控制，并基于传统清教徒式的态度来处理年轻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政府提倡晚婚，并“基于禁止未婚男女进行接触的传统标准对婚前贞洁进行严格规范”，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83.

²⁴²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80.

²⁴³ 1979年推行的第四次计划生育政策日后也被称为一胎政策。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被要求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其他的可以生育两个或以上孩子（部分取决于地方政策），如乡村的第一胎是女孩的女性^{*}、“少数民族”女性^{*}、以及由独生子女家庭组成的夫妻。关于中国的生育控制和人口政策（以及一胎政策），见Thomas Scharping,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²⁴⁴ 戴锦华, “Class and Gender,” in ARENA, ed., *China Reflected* (Hong Kong: 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2003), 13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our-global-u.org/oguorg/en/?wpfb_dl=325. 戴锦华在文本中还提到，“对性别关系的重构”有着“将阶级的现实定义进行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同上, 142. Tamara Jacka则认为是“对内外、轻/重工作与技术性/非技术性劳动的强化与二元论定义”；Tamara Jack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0.

差距进一步加大。²⁴⁵女性*又一次面临着要么被迫“回家”，要么随着政府的需求在不同地方进行雇佣劳动的局面。比如在80年代早期，官方呼吁在城市的女性*“回家……当时超过一千万结束‘上山下乡’的青年加剧了城市的失业现象，政府希望女性*回归家庭能够减轻这个问题。”²⁴⁶女性*甚至被要求离开城市中的工作单位并“为国家牺牲自我”。²⁴⁷同时，在80年代晚期，女性*移民大量参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城市服务和家政行业中作为雇佣劳动者而被剥削。²⁴⁸

女性*的代际和社会划分

在转变过程中，中国女性*根据不同的代际和社会地位可以分为不同的（有重叠的）群体，她们不同的经验使得她们通过不同的手段来为自己更美好的明天斗争。²⁴⁹1949年前的女性*从封建压迫下被解放，并有机会

²⁴⁵ 男女性*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1988年的12%上升到了2002年的19%; 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136.

²⁴⁶ Wildcat, “Unhappy Urban Workers—Situation and Protests of Urban Workers and Unemployed,”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公开于 October 14,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unhappy-urban-workers>; 参考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63–64.

²⁴⁷ 同上。

²⁴⁸ 例如，“1989年超过三百万农村女性*在城市作为奶妈工作”；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Gilmartin, Herschatter, Rofel, and White, *Engendering China*, 87. 关于更多制造业、家政服务业和性服务业女性*化的内容，详见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n Hairong,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Zheng Tiantian,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²⁴⁹ 关于不同类群或代际的女性*，见Lisa Rofel, “Liberation Nostalgia and a Yearning for Modernity,” in Gilmartin, Rofel, and White, *Engendering China*, 226–49;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ang Rongfeng, “Fol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Frauen der ‘verlorenen Generation,’ ” in Cheng Ying, Bettina Gransow, and Mechthild Leutner, e

获得工作——取决于她是否有城市户口；与解放前相比，这些女性*经历了社会主义下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政治或者斗争活动的城市女性*则在60、70年代经历了上山下乡；他们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返回城市并大多在国有企业工作。作为非熟练技术工人，她们在80年代中期引入劳动合同，管理人员权力被强化并迫切想要削减劳动力成本时最先受到裁员的冲击；公司同时也想要削减育儿福利和产假带来的成本，因此会更愿意雇佣男性员工。²⁵⁰同时，部分具有社会地位或者政治背景的城市女性*则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经济手段来提升自身经济地位并最终获得（相对的）自主权。

移民女性*通过户口政策提供的机会逃离父权制农村，并通过在城市寻找工作为自己争取一定的自主权。²⁵¹然而，当她们参与各种工作，例如为城市家庭提供家政服务或在工厂为世界市场组装消费品时，她们发现自己处在被国内和国外资本统治的新父权制城市中。²⁵²居住在农村的乡村女性*经常被视为过剩劳动力，并需要应对农业生产的一大部分（农业生产

ds., *Frauenstudien: Beiträge der Berliner China-Tagung 1991* (Munich: Minerva, 1992), 213 – 18.

²⁵⁰ Dagmar Borchard, “Auswirkungen der Arbeitsgesetzgebung der 80er Jahre auf die Frauenarbeit,” in Cheng Ying, Gransow, and Leutner, *Frauenstudien*, 192 – 93.

²⁵¹ “年轻农民女性*被认为在结婚前附属于她们的父母，婚后附属于她们的丈夫……移民、工作及其经验允许他们接触外界并最终获得成就与自主权”；Cindy C. Fan,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London: Routledge, 2008), 128;以及Minh T.N. Nguyen and Catherine Lock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Vietnam and China: Gendered Housing,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 no. 5 (August 2014),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https://pure.mpg.de/rest/items/item_2105225_9/component/file_3236289/content.

²⁵² 关于性别政治和女性*在工厂中的斗争，见Ching-Kwan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un Ngai, *Made in China*; Pun Ngai,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 nos. 3 – 4 (July – October 2007): 239 – 58.

的女性^{*}化）。²⁵³她们被改革开放抛下；男性劳动力则开始参与交通行业或者建筑工作，或是在几年工作后回到乡村结婚生子。由于早期改革也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部分乡村女性^{*}得以成为“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人。²⁵⁴同时，乡村女性^{*}对老人和孩童的照顾被视为一种持续而廉价的劳动，这份劳动在另一方面也支持着国有和外资经济的发展直至21世纪。²⁵⁵

性别体制的改变也体现在女权主义阵营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于70年代后期重新兴起，妇联的女性^{*}干部们却不曾考虑过女性^{*}在社会主义法律之下受的歧视，对于政府的父权制法案也鲜有异议。80年代开始，（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强调女性^{*}的自主权、性别区分与女性^{*}气质——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时代性别完全平等的意识形态的回应。90年代，一股由国际上的女权主义催生的女权主义思潮开

²⁵³ Delia Davin, “Migration, Women and Gende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omas Scharping, ed.,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7), 305; 关于农业女性^{*}化，见 Ye Jingzhang,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323.

²⁵⁴ 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85. 至1987年，乡村企业劳动力中35%是女性^{*}。沿海省份的外贸型工厂中女性^{*}劳工占比则更高；同上。

²⁵⁵ 关于“廉价”劳工和无偿育儿工作，见Hannah Schling, “Gender, Temporalit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Sozial. Geschicht. Online* 14 (2014): 42 – 61,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2hkrlq7>. 对于农村的中年、老年女性^{*}而言，年轻母亲移民进城意味着她们需要承担育儿工作：“这种分立家庭事务的方法……强化了劳动的性别区别并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重新阐述了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意识形态”；Fan, *China on the Move*, 17.

始强调性骚扰、对女性*的暴力、杀害女性*婴儿和绑架女性*的问题。²⁵⁶这种思潮在20年内都将为中国女性*生活条件的改善不断发展与斗争。²⁵⁷

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改变

80年代，不仅农民、乡村与城市工人、移民与女性*的情况在改变，统治阶级成员的处境也在发生变化。在早期改革以及国家的经济计划与政策制定的决策模式的去中心化的过程中，地方干部迫切地想要推进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来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常常雇佣家庭成员或党内关系网络的成员来为自己谋求收入。同时，城市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始转为营利性企业，有时候党的干部们干脆直接将其以“戴红帽子”等手段非正式地收归已有。在这个时期，中共政府放宽了对社会许多方面的管理；经济自由化的转变与新的商业机会为由党的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小企业家与国有企业低、中级管理人员构成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这些改变最终以阶级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收尾。70年代末期，政府废除了过去给所有人划定阶级、以此决定特权和升降职的阶级系统。80年代，过去合理化共产党干部统治、呼吁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阶级斗争理论也被逐渐废除。适合当今共产党统治的部分理论得到了保留：民族解放运动和那些英雄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毛泽东

²⁵⁶ 例子可见于Louise Edwards, “Issue-Based Politics: Femi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Return of Bourgeois Feminism?” in David S.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205. 女性*干部和女权主义认识被允许协助组织在1995年北京的联合国关于女性*的世界会议，但这并非共产党关注女性*处境的例证；这实际上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及武装镇压之后，党的领导人想要摆脱中国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局面；Chen Ya-Chen, *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46.

²⁵⁷ 关于更多女性*群体，例如城市女性*国企工人、女性*农民工以及近期女权主义运动，详见下一章。

和“毛泽东思想”和由官方叙述的修正过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激进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思想、群众运动和其他对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概念都被废弃了。²⁵⁸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与意识形态的改变，不满情绪在城市工人和学生中迅速累积；不久之后，这将导致新一轮的社会斗争。

起义：天安门运动，1989

早期改革及其带来的副作用，如通货膨胀和干部腐败问题，引起了工人、学生和城市大众居民之间的不满。一次大规模群众起义运动又一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到了历史转折点。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可以被视为共产党政府内部和外部关于改革（方向）的决定性斗争。

80年代城市工人与学生的抗议运动

城市工人对改革保有较高期待，希望改革能够带来更多改变。但实际上，80年代中期经济衰弱，新生的市场和定价政策导致了迅速的通货膨胀与工人实际收入的降低。²⁵⁹工作的不稳定性与工作单位中工作关系的改

²⁵⁸ 见Pun Ngai and Chris Chan King-Chi, “The Subsump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boundary 2* 35, no. 2 (June 2008): 75–91.

²⁵⁹ 关于这一阶段的经济问题，见Andrew G. Walder, ed.,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u Fulu,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Neoliberalization as Establishing a Market Society,” *Geoforum* 39, no. 3 (May 2008): 1093–96; Loren Brandt, Hsieh Chang-Tai, and Zhu Xiaodong,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83–728.

变也导致了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社会主义时代的管理者们和国家领导利用1988年企业法赋予的新的权力来侵吞国有资产，干部腐败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工人们则用抗议、罢工和停工作为回应。这些地方性、无组织、规模有限的罢工使得“有些工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工人们在1989年动乱中对建立自主工会的尝试“并不是一种偶然巧合的产物；这指明了一种重要的趋势”。²⁶⁰

江淑菡（Jackie Sheehan）将80年代末期的情况与50年代进行了对比。50年代，工人们“对政府和管理抱着一种强烈的敌意，并将自己与1949年之前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们进行对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结束后”。²⁶¹而在1989年，工人们又一次自发的团结起来，敌视并反对那些看似必要的权威。工人们“愈发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受雇用的劳动力、甚至是生产机器的一部分”。由于部分被解雇的工人没能找到新的工作，工人们开始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同时，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逐渐恶化的同时，官方干部侵吞国有资产和腐败问题日渐加剧”感到厌恶。在反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工人们“逐渐放弃了低效而不被信任的官方反馈渠道”，并开始参加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抗议活动。²⁶²

另一方面，将在1989年起到主要作用的学生运动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萌芽。1986年12月，学生示威运动最早在合肥出现。学生对没有提名人大候选人的权力感到不满，并引发了这次运动。²⁶³随后这场运动扩展到了武

²⁶⁰ 王绍光，“From a Pillar of Continuity to a Force for Change,” 187.

²⁶¹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08; 及 Howard,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113 - 14.

²⁶²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08; 及 Howard,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113 - 14.

²⁶³ Julia Kwong,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A Democratic Movement?” *Asian Survey* 28, no. 9 (September 1988): 973

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昆明、杭州、苏州和广州等其他城市。在大部分城市，活动规模都相对较小，但在北京和上海参与人数都达到了上万人。从落后的校园条件到缓慢的改革进度，许多问题都成为了学生抗议的焦点。²⁶⁴示威活动期间的标语和口号大多批评威权政体并要求更广泛的民主。不过，运动的对抗性并不强，抗议学生甚至开始与政府进行谈判。这些运动很快消失了。不过，许多1989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继承了在1986年斗争中的经验。

领导人中的新冲突

80年代，共产党的领导人发生了数次更迭。1981年胡耀邦成为了党的主席；一年以后，主席职位被废除，他成为了总书记。邓小平成为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直到1989年）。1982年起，胡耀邦引入了加速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老干部退休的机制，并引入了“第X代领导集团”的概念来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集团的卸任与接任。²⁶⁵1986年，中央政府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在推行改革方面的冲突被学生运动和处理学生运动方式的争论进一步加剧。与先前共产党中的不同派系一样，保守派和改革派并非完全水火不容。据邝泽欣(Julia Chak-Sin Kwong, 音译)所说，两个派别都支持70年代中期进行的改革。“两派的区别在于关于改革速度的分歧与对防止国家滑向资本主义的警戒性措施。”²⁶⁶然而，也有人不支持这

²⁶⁴ 关于改革话语对学生们的重要性，见Tony Saich, “When Worlds Collide: The Beijing People’s Movement of 1989,” in Tony Saich,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31.

²⁶⁵ 这些规矩一直是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潜规则，直到2017年党的领导人习近平被允许作为主席保留统治权超过原定的5年任期；Peter Lee Nan-Shong, “The Informal Politics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Lee Nan-Shong,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5.

²⁶⁶ Kwong,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983.

种观点：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M. Weber)认为在80年代后半段，共产党中的部分领导人提出了采用与90年代东欧“休克疗法”相似的方案。²⁶⁷最终，政府采用了一种相对更缓和的方案，部分是因为邓小平支持保守派的缘故。1987年，改革派的胡耀邦失去了权力。他支持对民主化改革采取更开明的态度，最终被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他的职位被赵紫阳所取代；这位接班人将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扮演一个略有些矛盾的角色。

北京的起义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最著名的是学生们的运动，他们占领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最终被军队镇压。学生们的抗议活动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活动也受到了许多对改革抱有较高希望又深深失望的城市工人和市民的支持。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同，1989年的这次运动迅速引发了民众对于整个政治系统的批评，并快速传播到许多其他城市，参与人数超过百万。

最初，与1976年一样，引发运动的是对一位去世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纪念活动。前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7年被迫辞职，于1989年4月中旬去世。许多学生把他看作改革家并集中起来纪念他。在4月底，北京的示威活动聚集了成百上千人，学生们组织了自治联合会和罢课活动。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参政权与自由、更有责任心的政府并终结干部腐败。这些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得共产党政府大吃一惊；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政府集结了北京附近的解放军军队并动员了警察的防暴方阵。与此同时，抗议活动扩散到了其他城市。当学生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动绝食抗议时，情况进

²⁶⁷ Raffaele Danna, “The Mak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terview with Isabella Weber,” Pandora Rivista, June 11, 2019, 公开于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pandarivista.it/articoli/china-economic-reforms-isabella-weber>.

一步恶化。大量工人加入了这场抗议活动并建立了他们的组织。与先前的几次一样，“特定的经济环境与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在工人们对抗议运动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²⁶⁸并且罢工规模几乎等同于北京全市的总罢工。²⁶⁹由于一部分共产党干部对抗议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分歧逐渐明显。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也公开反对压制这次活动，并且探望了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们。最终，共产党中的强硬派迫使赵紫阳让步并开始执行戒严。在5月末、6月初，解放军进入北京郊区并执行戒严，但北京群众构建了路障来阻碍军队。有些解放军单位与示威者结成了友谊；学生们则要求邓小平和其他领导某些干部下台。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发动了另一次攻击运动，这一次士兵们对抗议者使用了武器。最终的镇压开始了。²⁷⁰

²⁶⁸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204.

²⁶⁹ 关于最大的新工人组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BWAF，工自联），见Liang Hong,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Union: Origin and Activities,” in Lu Ping, ed., *A Moment of Truth: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Un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Union Education Center/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1990), 1 - 12; 文中亦含对工人处境的批判性分析；Jian Yuan, “Why Were the Chinese Workers Not Mobilized Successfully in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Lu Ping, *A Moment of Truth*, 133 - 43. 关于工人-知识分子联盟与对政府的威胁，见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122 - 23.

²⁷⁰ 关于天安门运动，见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na Kerns, *Who Will Shout if Not Us? Student Activists and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China, 1989* (Minneapolis: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11); 关于原始文献，见Han Minzhu and Hua Sheng, eds.,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c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Benton and Hunter, *Wild Lily, Prairie Fire*.

恢复：镇压、重建与经济增长，1989-1999

解放军镇压了北京天安门运动和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之后，共产党领导人发动了对党内和党外异议者的镇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方的社会主义集团崩塌，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维持了自己的统治并利用了新时代的机会。1992年改革进程恢复之后，国家在公共设施与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与外资注入的制造业一样，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进行发展。9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府完成了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重构；这标志着过渡阶段的结束与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

军事镇压

对天安门运动的军事镇压始于6月3日，并在4日进一步升级；军队使用自动步枪、坦克和爆炸物对北京街头的抗议者进行攻击。被杀害的具体人数仍不明确，但据估计至少数千人遇害。²⁷¹镇压首都的示威者花费了几天时间。与此同时，罢工、示威游行和对北京发生的“屠杀”的抗议活动在西安、兰州、上海、长沙、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广州、合肥、天津、南京等一系列城市爆发。部分学生领袖选择逃离这个国家，而参与活动的数千人（其中许多是工人）被军警逮捕并押送至监狱或劳改营；部分人甚至被处决。6月24日，自5月底开始便已失势的中共总书记赵

²⁷¹ 关于统计的伤亡人数具体数据及其难处，见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6. 2017年，BBC报道据中国国务院内部的“可靠”消息来源，一位英国外交官被告知在1989年镇压期间至少一万人被杀；“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death toll ‘was 10,000,’ ” BBC News, December 23, 2017, 公开于January 10,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2465516>.

紫阳被解除所有职位。前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江泽民接任空缺的党中央领导人职务。

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决议不惜一切代价掌控权力——即使是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镇压人民——天安门运动以失败告终。然而，运动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总的来说，运动被分成工人与学生两个部分。学生领袖们不想参与工人阶级的活动。一方面，他们自认为属于一个更高等的阶级并且不信任无产阶级群众和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他们预计任何由工人阶级参与的运动最终会引起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学生独立组织这次运动，活动成功的可能性或许会更大一些。²⁷²

保守主义卷土重来

如何处理1989年动乱的矛盾让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很多都参与了抗议活动，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也认为抗议活动能对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在军事镇压之后，共产党中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开始了清党运动。强硬镇压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各方面的停滞和卷土重来的保守主义。活动的参与者与异议人士们被残酷的镇压，许多还被予以长期监禁。²⁷³为了避免人民解放军在将来再次参与镇压

²⁷² 关于Zhang Yueran, “The Forgotten Socialists of Tiananmen Square,” Jacobin, June 4, 2019, 公开于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4yhkkqx>.

²⁷³ 1995年，中国司法部声称2700名犯人被确认为1989年镇压后发现的“反革命人员”。还有许多被定性为普通“罪犯”，其中许多被送往劳改营接受再教育。关于运动的影响与结果，见Jean-Philippe Béja, ed., *The Impact of China’s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London: Routledge, 2011);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 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关于对政治迫害和对非学生成员的长期监禁，见Liao Yi wu, *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9).

人民运动，政府设立了新的防暴警察。它整合了政治警察先进的压迫组织、审查机构、法院、监狱和劳改营，为共产党政府应对国内的威胁。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距离从社会主义彻底走向资本主义只差最后一步了。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不曾结束、世界经济变化和资本再分配不曾发生、80、90年代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向东亚也不曾发生，这最后一步或许也不会开始。

东方集团的末路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们要求结束经济困境和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威权统治。自从苏联开始执行他们的改革与公开化政策（类似于中国官方的改革开放）之后，反对派势力更加急切的推进各种改变。1989年末社会主义政权开始纷纷崩溃，最终不仅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也使得东欧社会主义政府垮台、东方集团整体崩塌。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紧随而来的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彻底耗尽了经济上的影响力，并将这些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的（半）外围国家。

恢复改革

这些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与中国政府处理经济转型和社会异议的手段有着重大的影响。天安门运动与武装镇压三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他臭名昭著的“南巡”等活动并视察了广东省内的经济特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此时没有正式职位，但仍是共产党行为的实际掌控者。他声称南方的工业化模式——即经济特区、由工厂生产世界市场需求的消费品——是值得效仿的案例。在东欧各国开始迈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时，中国共产党政府领导人“在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旧制度与愈发重

要的市场自由主义之间进行妥协。”²⁷⁴在党中央江泽民的领导下，共产党在保留自己在国家与经济中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开始推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开始转向亲私有资本，亲市场的路线。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许多经济上的决策权被下放给省级政府。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实验性的，那么90年代的改革则更具有导向性。90年代政府逐步淘汰了“双轨制”经济，国有企业被进一步改组，城市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被废除，中国进一步被容纳为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一环。

世界工厂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经济飞速增长并不是中共的宏大计划或者所谓“中国模式”的结果；而是历史阶段的偶然所致。改革依赖外资的投入来推动发展，这正好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部分公司寻求对外投资机会的时机在时间上重合了。在美国和西欧，大量工人运动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政府完善福利保障制度（特别是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这使得从70年代起，资本家们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当它们发现自己的投资没有得到预期的盈利时，他们开始停止投资。到了80、90年代，这使得资本（经济资产的投资）开始转向金融方面，以及工业重组、削减工资、裁员、紧缩政策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为了应对这种大背景，投资和生产在60、70年代变得高度国际化，并转向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廉价”劳动力。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便是其中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国家^(原文如此，下文同)，它们在7、80年代迅速增长并成为第一批（世界经济的）半外围国家，随后发展成核心国家。

²⁷⁴ Shaun Bresli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ublic, the Priv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sia Research Centre, Warwick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104, June 2004, 9.

²⁷⁵ 政府掌控和支持的经济项目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帮助这些地方飞速发展的关键要素。

90年代，共产党政府急于效仿四小龙的经验，成为世界资本廉价劳动力的供货商。在天安门运动的军事镇压之后，美国等国家迅速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并将中国从经济体系中暂时驱逐。不过这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收国。在1992年共产党政府进一步推进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之后，世界资本在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大量出现的经济特区中设立了工厂。香港、台湾（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和其他东亚地区提供了一大部分的境外投资。投资者被迫接受某些限制，如在某些行业必须与中国企业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其它被认为具有敏感性的行业仍把控在国家手中。通过政府与外部资本的合作，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成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了“世界工厂”。为了保证工厂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新的移民条例允许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在有劳动合同的前提下在城市工作。“宿舍劳动体制”为移民在工作场所附近提供了临时且“廉价”的住所。²⁷⁶ 在这些工作场所中，一种包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元素，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新体制诞生了。在生产消费品的血汗工厂中，劳动力常被以性别进行区分；部分行业偏好女性*劳动力“灵巧的手指”，而在其

²⁷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效仿了日本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雁阵”经济发展模式。这项理论最早见于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 no. 1 (August 1962): 3 - 25,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ide.go.jp/library/English/Publish/Periodicals/De/pdf/62_01_02.pdf; 以及Kaoru Sugihara,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78 - 123.

²⁷⁶ Pun Ngai and Chris Smith,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1, no. 1 (March 2007): 27 - 45.

他行业（如建筑业），以男性为主的劳动力则承受着更残酷的剥削与生产条件。²⁷⁷

国有部门的改制

1995年，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私营经济占据了非农业雇佣率的40%左右，并占据了工业出口值的34%。²⁷⁸共产党政府为改造国有计划经济、使其适应经济部门和外贸体系，提供机构与法律支持进行了进一步尝试。最重要的是，政府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劳动体制的最后领地：国营企业及其雇佣制度做出改变。²⁷⁹城市国营企业及其附属单位的工人终身雇佣制被劳动合同所取代，大部分福利制度也被废除。政府通过了数项法案来适应新兴经济体系的需要，如1994年通过的《公司法》与1995年通过的《劳动法》。根据《公司法》，所有国营企业都被“法人化”并转变成股份制公司。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和部分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大型企业被私有化、削减规模或者关停。许多企业被出售给高级干部或管理人员，部分被卖给国内或国外的投资者。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型企业经历了改制并置于国家新管理机构的管辖之下。企业的股份常常被售卖给个人投资者、最终产生了个人-集体混合持股的复杂所有权关系。国营企业被期望实现盈利并被重命名为“国有企业”。提供教育、医疗保障、住房或服务业内容的附属单位则大多转外包或被出售。

²⁷⁷ 关于移民工人，见下一章。

²⁷⁸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56.

²⁷⁹ 关于国有部门改制的细节，见John Hassard, Jackie Sheehan, Zhou Meixiang, Jane Terpsitra-Tong, and Jonathan Morris,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7).

《劳动法》规范了雇佣关系的改革。在改制与私有化期间，企业被迫提升效率，缩减工作人员数量。在1993–2003年间，大约五千万工人被裁员。²⁸⁰国有企业工人被要求中止先前的为他们提供了职业稳定性与福利保障的雇佣条件，并被许诺能够收到补偿。这个进程被称作“买断工龄”，或简称为“买断”。²⁸¹被迫接受买断的不只是被裁员的下岗工人，同时也包括仍被雇佣的那些工人。在先前的雇佣关系被终结后，他们作为合同工人被重新雇佣，但失去了先前的职业稳定性与福利保障。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和私有公司开始提升工作强度并迫使劳工加班。

日渐增长的失业风险、失业现象、较低的工资收入、失去的福利保障和更高的工作压力逐渐引发了不满。国有企业工人开始组织罢工潮，这些组织与运动将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同时，乡村生活条件的恶化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农民的不满。这两种斗争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

概述：摸着石头过河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转型阶段，我们可以再次观察到社会动乱与政府与此相对应的压迫、妥协、拉拢与改革。70年代中后期，民主化运动要求获得改变与参政权。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利用这些呼声来推进经济上的改革。实际上，政府并没有提供或者保障民主权益，而当活动发展并涉及到对共产党统治的异议时，这些活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²⁸⁰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214 – 15.

²⁸¹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195.

在转型期间，共产党的统治维持了其完整性，但领导人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改变，政治理念及方针也遭到篡改。经济上的去毛泽东化始于对农村土地的分配，随后是吸引外资的经济特区的设立，社会主义管理人员权力的加强与城市里劳动力市场的引入。这种变化并非某种宏大计划或者蓝图的一部分，而是试图促进经济发展、拯救社会主义体系或是巩固共产党统治的实验性改革措施。这便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他对改革的理解的意义。

改革同时也带来了对女性^{*}新的压迫手段，包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与复兴的传统（封建）女性^{*}观来控制她们对身体和生育的掌控权。女性^{*}被根据经济环境的需求被纳入或者排除出劳动力体系。在80、90年代，在国有企业被改革影响的大多是（年长的）女性^{*}；（年轻的）女性^{*}移民则大多作为手工业工人、家政服务人员和性工作者被剥削。与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女性^{*}为了夺回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与反对自己在生产和生育中受到的剥削而奋起斗争。

改革引起了各方面的危机与不满，并最终产生了由学生、工人等城市居民主导的1989年天安门运动。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对这次运动表示同情并支持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然而，邓小平及其派系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通过将该运动与东欧最终导致政府垮台的类似性质活动进行对比，他们认为这次运动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并采用了军事镇压的手段，最终成功压制了这次运动以及后续对政府和改革的异议；这也为共产党在1992年后采取更加协调的改革措施扫清了障碍。随后，世界经济发展——包括新产业链的形成与全球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90年代中国工业出口的飞速发展。中国新的经济系统开始有效地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与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威权政府结合起来。

90年代中后期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解构宣告了转型过程的结束。国有部门的转变、国营企业转为营利性股份制公司与新的国家计划部门的引入改变了过去生产与管理经济剩余的方式，但目的仍然是经济效率、营利性、稳定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与维持政府的统治。在转变完成之时，中国成为了一个新生的经济大国，但其未来发展方向却不甚明确。基于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干部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失衡以及对国家投资与出口的高度依赖，部分人士认为这一切马上都会崩溃——不过这种预言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²⁸²

²⁸² 比如参见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Arrow Books, 2002).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度爆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揭开序幕。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抗议国有工业的改制和解体，而农民则反对农村集体土地日益被剥夺和商品化。在21世纪初，中共政权以有限的让步政策来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局势，包括放宽迁移政策、福利计划、提高最低工资和取消农业税。该政权将这些政策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也可以理解为对任何扰乱社会和谐的人的威胁。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加速，外国对制造业的投资持续增加，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直到这十年的结束。从一开始，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剥削工厂、建筑工地和城市服务业的农民工实现的。在21世纪的前10年，这个新的工人阶级不断上演了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他们的罢工浪潮在2010年达到了高潮。抗争的压力推高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并最终在破坏“廉价劳动力模式”方面发挥了作用。

到2007年全球危机爆发时，中共政权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移民工人的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减少，GDP增长率下降。该政权为遏制危机而制定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了债务增加。为了控制和遏制农民工反对拖欠工资、工厂搬迁和解雇的斗争，政权继续做出物质上的让步，但压制（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组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对农业的重组继续给农民带来压力，正在进行的父权制重组引发了新的女权主义抵抗和话语。

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于2012年上台。它担心党、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冲突，推动了一场打击干部腐败的运动，以及其

他旨在巩固其统治的措施。为了确保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全球利润份额，该政权通过一项全球技术领导力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BRI）推动“向外跃进”，“一带一路”是一个在中国支持下的全球发展的远景项目。中国军事力量的集结和扩张主义路线导致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新对抗，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阶级。这些冲突因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随后的经济滑坡而加剧。

抵抗：农民起义和工人动乱，1992-2005年

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国有企业工人对国有部门改制的影响进行了斗争。他们的大规模运动无法阻止改制，但赢得了一些物质上的让步。同时，农村经济的转型涉及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社会条件的恶化。农村缺乏国家资金，土地窃取（译注：在很多地区，当家中的男丁去世或者离开后，家中的寡妇和小孩的房屋就会被非法侵占，导致她们流离失所。），干部腐败，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动乱。中共政权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才最终果断地通过削减农业税等方式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改制对工人的影响

国有企业员工队伍的缓慢解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在90年代中期加速。中共政权通过私有化或关闭中小型企业，同时保留战略部门的大型企业的方式（即所谓“抓大放小”，译者注）来推行国有部门改制。对于城市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中老年工人和女性*来说，国有部门的放松管制、终止雇佣关系的买断程序以及社会保障（铁饭碗）的取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失业率上升，被裁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多年来一

直没有正式工作。²⁸³许多受影响的国有企业工人没有被算作失业者，因为他们事实上没有被解雇。他们仍然是正式的员工，被称为“下岗”，被安置在就业或培训计划中。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而且福利和新就业的承诺往往没有兑现。随着许多（尤其是年长的）工人加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技术性和不稳定的工作，下岗工人成为“迷失的一代”的核心。他们不得不与90年代开始进入城市的数百万农村移民竞争低薪的服务或建筑工作。

女*工是不幸的一代

女工*在改制过程中受到的打击普遍更大。她们只占劳动力的40%左右，但却占了“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60%左右”。²⁸⁴女性*主要在辅助性和服务部门工作，这是第一批被解散的部门。当管理者决定裁员时，年龄和性别是主要因素，40岁以上的女性*往往是首先被解雇的人（也是最后才被考虑重新雇用的人）。对于许多老年女性*来说，她们的被解雇标志着从大跃进开始，她们一生中遭受的性别不平等达到了顶峰，因为她们所遭受的结构性和个人歧视更加严重：“教育机会更差，家庭负担更重，日常生活压力更大，个人行为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性行为和生育受到严格控制，工作中的晋升机会更少，社交网络有限，工资更低。”²⁸⁵在这不幸

²⁸³ Simon Appleton, John Knight, Song Lina, and Xia Qingjie,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nos. 2 - 3 (2002): 2 52,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tinyurl.com/yk27jkrt>.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也因全面改革而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到1994年的0.40，再到2000年的0.46”；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67. 基尼系数中的1表示不平等的最大值，而0表示不平等的最小值。

²⁸⁴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67 - 68.

²⁸⁵ Wildcat, “Female Workers under Maoist Patriarchy,” [gongchao.org](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female-workers-under-maoist-patriarchy),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female-workers-under-maoist-patriarchy>, referencing Liu Jiey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143.

的一代女*工中，许多人坚持“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和“女性”愿意做出牺牲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无法“摆脱儒家父权思想、父系制度和对妇女贞操的严格控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的父权遗产”。²⁸⁶ 面对改制，这些女性*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调到其他部门，请病假，利用丈夫的私人关系和人脉（关系），或者只是选择（在她们看来）最好的裁员或退休形式。“一些女性*也接受了裁员，因为之后她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家庭事务——只要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²⁸⁷ 如果她们要寻找新的工作，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只找到了低工资，且往往是非正式的工作，例如，当街头小贩。性别分工阻碍了她们在国有企业中获得更多的技能，也无法让她们获得良好的人脉关系，而这正是现在找到其他工作所需要的。

国企工人的抗议和道德经济

当1995年和1996年开始改制时，国有企业工人最初希望改制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像80年代的改革那样大，或者希望改制只是造成暂时的痛苦。到了1997年，很明显，这种痛苦会持续下去。从那时起到21世纪初，国有企业工人的裁员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一再引发了抗议运动。²⁸⁸许多国有企业工人试图捍卫他们的工作和以及与之相关的条款。²⁸⁹斗争的具体目标和形式各不相同。工人们抗议破产或倒闭带来的影响，如拖欠工资和拖欠养老

²⁸⁶ Wildcat, “Female Workers under Maoist Patriarchy.”

²⁸⁷ Ibid.

²⁸⁸ 有关国有企业工人斗争的更多信息，见 Cai Yongshun,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Routledge, 2006); Ching-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art II.

²⁸⁹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工作单位提供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福利规定被城市福利制度所取代，而城市福利制度对城市人的覆盖面并不像工作单位对其成员所做的那样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的城市居民，例如农民工，几乎没有被福利计划所覆盖。

金或赔偿金，抗议恶劣的住房条件和公共服务的瓦解，抗议国有企业的非法出售或改制和干部腐败。

大多数斗争都遵循一个特定的模式：“首先，工人们直接去找负责此事的单位领导或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这些要求通常是关于金钱或其他具体条件的，很少有政治要求，如罢免腐败官员或干部。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他们就会向国家高层反映，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写请愿书，要求遵守现行法律。”²⁹⁰ 当局往往无视请愿和其他合法行动，于是局势升级为街头行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国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活动组织得更好，也更加政治化，这让中共领导层感到不安。在许多抗议活动中，官方出动了普通警察甚至武警，活动人士被逮捕，“头目”被关押多年。工人冒着被镇压的风险发动罢工或示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造反。他们把自己以前的地位称为“工厂的主人”，并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反抗”。他们诉诸于某种形式的道德经济以强调自己的权利，呼吁领导层满足他们的要求。²⁹¹ “事实证明，不满的工人还善于使用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言辞，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要求社会正义，用当局觉得不舒服的阶级术语来表述他们的要求。”²⁹² 这甚至可以被工人表述为一种“虚幻的

²⁹⁰ Wildcat, “Unhappy Urban Workers—Situation and Protests of Urban Workers and Unemployed,”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October 14,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unhappy-urban-workers>, referencing Lee, Against the Law, 112.

²⁹¹ See Cai Yongshun, “Disrup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Reform Era,” in Kevin J. O’ 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3–78.; also see Elizabeth J. Perry, “Crime, Corruption, and Contention,”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8–29; Elizabeth J. Perry,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test,” in Kam-ye Law, 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62–81.

²⁹² John Hassard, Jackie Sheehan, Zhou Meixiang, Jane Terpstra-Tong, and Jonathan Morris,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7), 138.

毛时代，把过去歪曲成一个工人们快乐和满足的时期。”²⁹³ 通常情况下，针对中共地方当局的集体抗议是由（前）低级别的干部协调的，他们发挥领导作用，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有时是充当顾问，因为公开组织和领导有风险。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会策划涉及一个以上的工厂或工作单位的行动。

2001年和2002年，在中国东北的铁锈带，中共政权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国有企业工人的反抗达到了高潮。许多工人被解雇，之后找到（适当）工作的希望渺茫。例如，在辽宁省辽阳市，2002年春天，十几家工厂的工人同时举行了罢工。²⁹⁴ “辽阳抗议活动的规模、跨厂动员和政治诉求警醒了当局，市场改革和腐败会一起制造结构性的弱势群体，这类群体会要求政府对大规模的经济失调承担政治责任。”抗议活动最终结束了，但这是在工人领袖被逮捕，当局支付了50%的拖欠工资和拖欠工人的遣散费之后。²⁹⁵ 在另一个案例中，也是在2002年春天，黑龙江大庆油田的五万名下岗工人“举行了为期三周的街头抗议，反对管理人员以‘不公平的遣散费’来欺骗工人。”数以千计的武警封锁了该市的部分地区，据报道，工人的抗议持续了两个月。最引人注目的是，在4月，中国西北部甘肃兰州的数百名石油工人封锁道路，抗议每年约1,000元的低遣散费。这些工人受到先前大庆动乱的鼓舞，胆子也大了起来。河北东部和山

²⁹³ Wildcat, “Unhappy Urban Workers.”

²⁹⁴ Mark Selden and Elizabeth J. Perry, “Reform,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5.

²⁹⁵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Activism,” in Perry and Selden, *Chinese Society*, 70.

东的石油行业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在当局的压力下，这些活动很快就崩溃了。²⁹⁶

在进行重组时，中共政权预计工人的骚乱会增加。在整个90年代，中共建立了新的劳资冲突调解和仲裁形式，将其引入法律程序。²⁹⁷事实上，除了公开对抗和野猫罢工之外，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工人选择通过这些法律渠道进行投诉。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灵活的，因为当局面对国有企业工人的抗议，在福利和再就业计划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²⁹⁸它还确保限制其他财政负担。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大量工人被解雇，而政府通过“米袋子”省长责任制迫使农民种植廉价粮食，减少了因粮食价格上涨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²⁹⁹

最后，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并没有阻止改制的进程，但他们减缓了改制的速度。政府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缓和了对工人生活条件的影响。此外，21世纪初大规模工人抗争的经验也决定了政权应对不满情绪的措施和策略。³⁰⁰为了规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重组及其对工人影响，2003年，政权在不同的行政级别上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s）。他

²⁹⁶ Ibid., 70 - 71; also see Human Rights Watch, “Paying the Price: Worker Unrest in Northeast China,” Refworld, UNHCR, August 2, 2002,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d4fc5782.html>.

²⁹⁷ 这些解决劳资冲突的法律渠道也是对90年代初期和中期农民工就业率迅速上升和第一次农民工骚乱的一种回应。

²⁹⁸ “政权对国企工人抗议的相对容忍度揭示了一个新的策略，级选择性地开放某些话题，使得舆论可以有限地表达不同意见”；Antoine Kernen, “The Reemergence of Street Protests: State Workers Challenge the Chinese State,” in Thomas B. Gold, William Hurst, Won Jae youn, and Li Qiang, eds., *Laid-Off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 Unemploy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27.

²⁹⁹ Alexander F. Day and Mindi Schneider, “The End of Alternative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Rur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 no. 7 (November 2018): 2.

³⁰⁰ 国企工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1世纪10年代，但一旦农民工在21世纪初登上舞台，并在此后参与劳工动员，他们就没有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们制定了一套规则，要求如果这些计划涉及就业和解雇的变化，则改制计划需要职代会（SWC）批准。

农村的转型

在资本主义时期，农业和农村的转型仍在继续。当许多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农民开始迁移时，中老年女性^{*}通常留在村子里。她们构成了农村女性化和“老年化”的农业劳动力，并为过去和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的生育工作：“留守”老人和儿童。³⁰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家庭生活条件的相对改善主要来自非农业收入，例如，以汇款形式出现的农民工收入。那些没有迁徙并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人，生活水平往往下降。

³⁰²

城市和农村在成本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异仍然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食物和护理工作的低成本，劳动力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再生产，有助于资本降低总体再生产成本和城市及流动无产阶级的工资。土地的公有制以及将土地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给每一户的现实，保证了一定水平的农村低成本就业和农业产出。然而，到9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对生产力的有限增长感到不满。它的目标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从不协调、小规模经营向协调的大规模经营过渡。”

³⁰³ 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视为只是“第一次飞跃”，而农业

³⁰¹ Ye Jingzhong,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no. 3 (July 2015): 323.

³⁰² Teresa Wright, “Tenuous Tolerance in China’s Countryside,”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10), 115; also see Yan Hairong and Chen Yiyuan, “Agrarian Capit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Capitalist Dynamics from Above and Below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no. 3 (July 2015): 374.

³⁰³ Forrest Zhang Qian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现代化是“第二次飞跃”。³⁰⁴ 中共领导层开始放开土地租赁，支持农业和大型农业公司的资本化，这一过程在21世纪00和10年代愈演愈烈，因为“现代”农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盛行。³⁰⁵

中共政权继续改革乡村管理，并在2002年取消了大部分地方收费。农业税最终在2006年被取消了。然而，地方政府已经找到了另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将村里的土地出售给公共和私人投资者以及开发商，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住房或工业建筑。农民经常被地方干部赶出土地，然后他们出售集体土地，不仅是为了给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也是为了中饱私囊。³⁰⁶ 这种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剥夺（和商品化）在21世纪00年代加速了。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统计“1998年至2005年期间，非法侵占土地超过100万次”。³⁰⁷ 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分配

Rights,” China Journal 60 (July 2008): 29,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ink.library.smu.edu.s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31&context=soss_research.

³⁰⁴ Ye Jingzhong,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325.

³⁰⁵ 土地转让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非法的，在1984年有所松动，然后在1997年得到支持，并在2013年得到推广；ibid., 325. 关于农业的日益资本化，见 Zhang Qian and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rest Zhang Q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2, no. 4 (October 2012): 460 - 83,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ctesere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24.1514&rep=rep1&type=pdf>; Burak Gür el, “Chang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from Decollectivization to Capitalism,” McGill Sociological Review 4 (February 2014): 67 - 92,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www.mcgill.ca/msr/msr-volume-4/changing-relations-production-chinese-agriculture>.

³⁰⁶ “土地掠夺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因为地方官员决定将已建成但通常破旧的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重新开发成更新、更现代化的区域”；Bruce J.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0.

³⁰⁷ Ibid., 207.

给他们的土地。这种形式的原始积累保证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对城市和经济特区工业部门的进一步供应。³⁰⁸

随着村庄变得越来越空旷，过去的农民阶层逐渐“消失”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下降到2010年的36.7%，2014年的29.5%。在2014年登记为农民的3.79亿劳动年龄人口中，大部分完全或部分从事非农工作；仅‘流动人口’[农村移民]…就有2.53亿。”³⁰⁹许多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并通过（农业以外的）雇佣劳动和在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汇款获得大部分收入。留在农村的农民和农村工人新组成包括“商业农民”和“无产阶级”形式的农业工作：合同农民（为农业企业工作）、半无产阶级农业工人（在当地也有自己的土地）、半无产阶级农民工（在家乡也有自己的土地）和无地无产阶级农业工人（在农业企业租赁的原荒地上劳动）。³¹⁰

农民的抗争

20世纪90年代，农民开始频繁抗议腐败、侵占土地和增加税收，并在21世纪0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据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

³⁰⁸ 苏耀昌估计，从1987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大约有3400万农民被剥夺了财产；Alvin So, “Peasant Conflict and the Local Predatory Stat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4, nos. 3–4 (July 2007): 570, accessed February 2, 2021, <http://landwise.resourceequity.org/documents/2267>. Kathy Walker引用的估计数字是4000万至7000万户，这将使受影响的农村人口数量达到3亿人；Kathy L.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Everyday Peasant Politics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8, nos. 2–3 (April 2008): 472. Sally Sargeson counts eighty-eight million peasants who “had lost farmland through expropriation” by 2008; Sally Sargeson, “The Demise of China’s Peasantry as a Class,”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14, issue 13, no. 1 (July 2016): 10, accessed January 24, 2021, <https://apjjf.org/2016/13/Sargeson.html>.

³⁰⁹ Ibid., 7, 9.

³¹⁰ Zhang Qian and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2.

说：“1992年和1993年，爆发了数以百计的抗议、示威和骚乱，主要发生在高度依赖农业的地区，那里的村民们对地方和上级官僚机构强加给他们的财政负担以及国家采购机构不向农民支付现金而感到越来越愤怒。”³¹¹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提到，仅在1994年头四个月就发生了72万起农村抗议活动，其中有2300起严重的“骚乱”，在这些骚乱中，“近5000名乡镇政府人员”受伤或死亡。在一些村庄，农民组织起来，“包括宗教组织和武装组织，以取代党和政府组织。”³¹²在1997年的另一轮农民起义中，“安徽、河南、湖北和江西等中部省份的20万参与者分别袭击了政府大楼，劫持党委书记，焚烧政府车辆，毁坏道路，抢夺政府的水泥和化肥，至少有两次夺取了枪支和弹药。”³¹³在这些斗争中，采取了诸如逃税、逃费、拖延、推迟付款、静坐、游行、封锁公路和铁路，甚至“洗劫党政机关，殴打、杀害干部。”等策略³¹⁴农民往往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对国家或其地方代表的“正当反抗”，因为他们的行为明显损害了农民的利益。³¹⁵

³¹¹ Thomas P. Bernstein, “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in Goldman and MacFarquhar,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213.

³¹² Perry, “Crime, Corruption, and Contention,” 315.

³¹³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470.

³¹⁴ Thomas P. Bernstein and Lü Xiaob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6; for examples, see ibid., 120ff.;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469.

³¹⁵ 关于农民在这些斗争中的道德经济或“正当的抵抗”，见 Kevin J. O’ Brien and Li Lianjiang,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vin J. O’ 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0, no. 6 (January 2013): 1051–62; Li Lianjiang and Kevin J. O’ 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in Gries and Rosen, *Chinese Politics*. 关于农民的论述，见 So, “Peasant Conflict and the Local Predatory Stat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574. 另见上文关于国有企业工人的道德经济的部分。

尽管进行了改革，包括1998年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新规定，政府还是未能阻止农村的动乱。³¹⁶在这十年的末期，农民的斗争，包括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变得更加有组织，³¹⁷更加“有技巧”，也更有争议，因为合法的抵抗基本上没有成功过。³¹⁸“有证据表明，更高的军事化程度和公开的叛乱政治，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和准军事部队的形成。在一些地方，抗议者建立了‘农民革命委员会’、‘农民起义指挥委员会’或武装自卫队，以取代党和政府。”这种组织化程度令人印象深刻³¹⁹，因为当时（现在仍然如此），政权不允许农民组成群众组织（不同于工人、女性*或年轻人），因为这可能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在2000年上半年，农民继续组织一波又一波的斗争，反对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生活条件下降、干部专断和腐败的影响。抗议活动采用了看似合法的手段，如请愿、示威、行政诉讼、拒绝非法收费和税收，以及在地

³¹⁶ Kathy L. Walker, “‘Gangster Capitalism’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hina: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3, no. 1 (January 2006): 13.

³¹⁷ Ibid., 12.

³¹⁸ See So,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 146ff. Alvin So认为，“共产党国家及其分化的国家结构仍然对农民抗议的模式有很大影响。农民的抗议仍然是狭隘的经济驱动；他们很少超越中央政府容忍的限度；他们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ibid., 151. 关于2011年乌坎村农民起义中类似的局限性的讨论，见Johan Lagerkvist, “The Wukan Uprising and Chines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oward ‘Shadow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3, no. 3 (December 2012): 345–61, accessed January 26, 2012, <https://tinyurl.com/y5rs8wp7>.

³¹⁹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12, referencing Perry, “Crime, Corruption, and Contention,” and Patricia Thornton, “Comrades and Collectives in Arms: Tax Resistance, Evasion,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in Post-Mao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方选举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些手段大多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导致了报复、警察暴力、黑社会和暴徒的干预、操纵选举过程以及贿赂。³²⁰

中共政权了解农民斗争的爆发力及其对社会稳定和党的合法性的潜在影响。根据苏耀昌(Alvin So)的说法，“二十年来对地方税费进行的‘正当抵抗’已经‘逐渐地、直接地、但肯定地……刺激了政策的变化，即财政负担的减轻’。”³²¹ 在21世纪00年代，“一号文件”中多次承诺采取改善农村条件的措施，0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降低了农业税。³²²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平息农村的不满情绪。上述的土地剥夺取代了税收，成为引发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2007年，为了应对开发商和支持他们的地方官员对土地的掠夺，一些省份的农民自发组织了争取土地权利的运动。王飞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个这样的农民团体，声称代表黑龙江省72个村庄的4万名农民，公开宣称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的‘人权’。这类运动的领导人很快就消失在警察大院里；北京

³²⁰ Li Lianjiang, “Driven to Protest: China’s Rural Unrest,” *Current History* 105, no. 692 (September 2006): 250 – 54; Teresa Wright还提到了对农民抗议者的“骚扰、拘留和暴力”；Teresa Wright, “Tenuous Tolerance in China’s Countryside,” 121.

³²¹ So, “Peasant Conflict and the Local Predatory Stat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576.

³²² 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宣传齐头并进。它的组织方式就像毛泽东的运动，有工作和宣传小组；见 Emily T. Yeh, Kevin O’ Brien, and Ye Jingzhong, “R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0, no. 6 (November 2013): 917,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3689378_Rural_politics_in_contemporary_China; Elizabeth J. Perry,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30 – 61. For more on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ampaign, see Anna L. Ahlers, *Rur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2014).

接着颁布了更多的法令来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掠夺活动，并提高了土地的货币补偿，此外还对现在的失地农民进行了户口重划。”³²³

农民和国企工人的整个斗争周期大约从90年代中期持续到00年代中期。它们伴随着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最终转型，并导致了中共政策的重新配置和重新措辞，当时政权开始进入巩固阶段。

巩固：和谐社会，繁荣与危机，2000-2012年

近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组成和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他们与私人资本家合流，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基础。90年代江泽民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了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2002年上台的胡锦涛领导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起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策，其中包括某些福利措施，旨在掩盖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在经济上，中国及其出口导向型产业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经历了另一次崛起。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够限制2007年后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巨大的刺激计划成功地启动了国内和全球经济。然而，这场危机也加剧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即增长率下降、高度依赖低价值商品出口和国内消费疲软。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产生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共高级干部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单位。在80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职务之便巩固了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或参与创办了私营经济企业。可以说，当时的“新兴资

³²³ Wang Fei-Ling, “Conflict, Resist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kou System,” in Perry and Selden, *Chinese Society*, 87 - 88.

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没有成熟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³²⁴相反，社会主义统治阶级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从8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逐渐被更多的资本主义元素（如市场）所改变、补充和取代。20世纪90年代，在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他在天安门镇压后一直执政）的领导下，国有部门的改制使中共干部能够控制或接管大量的国有企业和资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就利用转型来积累经济影响力和财富，同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保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2001年，江泽民允许私营企业主成为党员。中共领导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其阶级斗争的说辞，而干部是党员的主要基础之一。现在，中共领导层也正式代表国有和私人资本家。后者必须紧跟国家和中共领导层的利益，以获得补贴和商业机会，并避免与行政机构发生冲突。据布鲁斯·迪克森说，私人资本家自己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³²⁵

在调整其目标、战略、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新的统治阶级继续集中力量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权力的控制，以及获得有影响力或有利可图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机会。一方面，自社会主义时期以来，它主要由关系密切的精英成员组成，他们保护和提拔家族成员、密友或其他精英成员，垄断了进入中国共产党、国家、经济实体和军队高层职位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和保持高级官员职位，精英阶层成员必须通过由中共组织部控制的复杂的干部培训、考核和晋升系统。职位和任务分配、底线、

³²⁴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29; also see Hartmut Elsenhans' s “state classes”; Hartmut Elsenhans, “Staatsklassen,” in Manfred Schulz, ed., *Entwicklung. Die Perspektive der Entwicklungssoziologie*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1997), 161–85, and Jörg Goldberg’ s *capitalism without a bourgeoisie*; Jörg Goldberg, *Die Emanzipation des Südens: Die Neuerfindung des Kapitalismus aus Tradition und Weltmarkt* (Cologne: Papyrossa, 2015).

³²⁵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5.

评估和继任规则规范着晋升和职业生涯。干部必须证明他们的治理能力和政治技巧。这种裙带关系和精英政治的混合形式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管理相当稳定，同时，尽管存在干部专制、腐败和失败，但仍然灵活、高效和成熟。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地域差异、派系忠诚、商业利益和代际差异产生了冲突，但由此产生的竞争也提供了其他选择或战略，并有助于稳定政权。这种竞争的例子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摩擦，他们在改革的形式、深度和速度方面存在分歧；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则是“上海帮”（包括党的领导人江泽民）和“团派”（包括江的继任者胡锦涛）之间的摩擦，他们对经济增长或福利政策的重视程度不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2年形成的由胡锦涛领导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担心其统治的不稳定，因为改革导致了社会紧张局势和国有企业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的斗争加剧。它延续了上一任政府的经济路线——包括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以及对中央国有企业的支持。它所改变的是政府政策的基调、风格和言辞。它为工人的不满建立了一个新的法律框架，一个调解和解决冲突的“准法团主义协商机制”，³²⁶ 以分散社会不满并将其引入国家控制的法律程序。为了应对工人和农民的具体不满或动乱，北京的中央领导层承诺对那些偏离官方路线方针、腐败或任意妄为的地方国家官员进行监督。它还实施了新的法规。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要求所有企业都要成立职代会。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标准，旨在更有效地执行法律标准。该制度还为移民工人引入了新的或改进的社会

³²⁶ Tobias 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281 (translated by R. R.).

保险规定，并定期提高最低工资。³²⁷ 一项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化解土地、税收和干部滥用等方面的冲突。该政权还正式承认了处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并通过“西部大开发”运动加大了解决地区不平等问题的努力。³²⁸

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下层斗争和压力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类似于历史上其他此类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政策的例子，卡尔·波兰尼将其描述为对放松管制导致的社会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回应。³²⁹ 胡锦涛本人在2005年将新的方针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儒家思想、民族主义神话和中共语言的奇特结合，用来描述一个没有社会冲突的中国社会的目标，它必须由所有中国公民来创造和珍惜。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尝试，目的是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并对任何打算通过参与社会对抗来破坏和谐的人进行威胁。除了让步和法团主义政策之外，对社会动荡的镇压也在继续。政权攻击那些超出单个公司或社区范围的各种抵抗和组织，它特别针对那些它认为是“煽动者”或“头目”的人。³³⁰

³²⁷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批评性讨论，见 Zhang Lu, *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Labor and Worker Resist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3–82; “A Decade On, China’s Labour Contract Law Has Failed to Deliver,” *China Labour Bulletin*, December 28, 2017, accessed January 12, 2021, <https://clb.org.hk/content/decade-china’s-labour-contract-law-has-failed-deliver>.

³²⁸ 该政权试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和吸引外国投资等措施刺激西部省份的发展。更多关于“西部大开发”运动的信息，见 Heike Holbig, “The Emergence of the Campaign to Open Up the West: Ideological Formation, Centr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Role of the Provinces,” *China Quarterly* 178 (2004): 335–57.

³²⁹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136.

³³⁰ 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国家加强了对那些被认为过于对抗的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同时，国家继续与那些它不认为是威胁，而是有用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因为它们承担着社会和福利的职能。对于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一个例子，见 Xu Bin,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21世纪0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陷入了另一场冲突，即如何采取正确的策略来化解社会紧张局势并推动经济发展。前商务部长、后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周围的一个派系支持“重庆模式”，这是一个始于2008年的政治项目，被党内外的一些人视为左翼，是高层领导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替代方案。左翼的标签主要来自于薄熙来对毛主义民间传说、反腐政策和某些福利政策（如扩大公共住房）的运用。实际上，薄熙来的政策与北京中央政府使用的政策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他促进了国内或外国投资，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稳定了中共政权。然而，“重庆模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民众的支持，甚至在老左派和新毛派中也是如此。³³¹ 随着2012年胡锦涛领导层的定期交接迫在眉睫，薄熙来甚至作为竞争者出现，但他因腐败指控入狱而被排挤。围绕着习近平的圈子（据说是作为一个作为妥协结果的人选，也是中共精英的“太子党”之一）在党的领导权的继承问题上取得了胜利。然而，习近平向薄熙来学习，也采用了毛主义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化改编，使中共的统治合法化和正当化。

加入世贸组织和另一个繁荣

政治领导层的这些变化是在重大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到21世纪00年代末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件大事再次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一部分。这加速了香港作为中央金融中心和中国全球贸易和投资门户的崛起。1997–199

³³¹ See Wang Hui, “The Rumour Machine: Wang Hui on the Dismissal of Bo Xilai,”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 no. 9 (May 2012),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4/n09/wang-hui/the-rumour-machine>; Joseph Y.S. Cheng, *The Use of Mao and the Chongqing Model*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5).

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其他所谓的亚洲虎和小虎国家（Tiger Cub States，一般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与越南）。投机性泡沫、不稳定的货币、缺乏外汇储备，以及后来的资本外逃和债务的大量增加将对这些国家产生长期的影响。中国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仍然对金融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监管，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防止崩溃。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甚至从亚洲其他地区的危机中受益，因为海外投资者对该地区的潜在不稳定性变得更加敏感，并将其业务转移到中国。

20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准备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降低关税壁垒以及放松与世贸组织有关的进口法规将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明确。³³²那些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出口繁荣将会在中国经济暴露于更多的全球竞争后会受阻或停滞的人感到惊讶。从 2000 年代初到 2010 年代初，中国的 GDP 增长了约六倍（以当前美元计算），而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见引言章节的表 1）。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另一次增长，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由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和中国共产党对产业和平的保障，工厂和投资甚至从亚洲邻国转移到中国的产业集群中来。到2003年，大约有两百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以及两千个其他地区和地方控制的开发区已经建立起来。³³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的出口继续增长。推动这一发展的一个机制被称为“中美国”（Chimerica）：通过消费品出口积累的大部分美元储备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再次为美国进口中国生产的商品提供了资金。总而言之

³³²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之前的谈判，见 Sylvia Ostry, Alan S. Alexandroff, and Rafael Gomez, eds., *China and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Trade: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³³³ 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178.

之，21世纪00年代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是史无前例的，但它很快就受到了一场新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刺激和再平衡

2007年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当时被视作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它始于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金融衍生品的大规模投机、过度的风险承担以及银行的过度杠杆化。危机的一些诱因和症状是70年代开始的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然而，当时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为争取更好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这首先导致了资本的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21世纪00年代末的危机首先导致了银行部门的破产和信贷紧缩。随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全球贸易的减少。美国政府和其他核心国家的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命令国家机器进行救助，甚至将（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公司和其他大公司国有化，这是一种“富人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债务的急剧增加和新一轮的国家紧缩措施。³³⁴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不得不承受首当其冲的后果，其中包括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驱逐、失业、更高的税收和国家费用，以及削减福利，将全球无产阶级的更多部分推到贫困线以下。³³⁵中国在2008年和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成功地重新启动了国内经济，此后不久，全球经济也随着全球贸易、生产和增长的增加而重启。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补贴和投资被证明不过是一

³³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是，市场不应受到干预，会自我调节，而在这次危机中，国家突然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拯救世界的实体。

³³⁵ 21世纪00年代末的危机和紧缩措施帮助引发了全球的斗争浪潮——广场占领、占领华尔街运动、北非的起义和罢工浪潮——一直持续到2012年。许多人赢得了让步，但从长远来看，反叛的浪潮消退了，许多（政治和经济）成果在反击中丧失了。

种暂时的补救措施，并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如低利润率、消费不足、金融化和债务问题。³³⁶

与此同时，中国在危机开始时经历了短暂的出口下滑。全球贸易和需求的崩溃导致许多公司倒闭，仅在2008年至2009年初就有25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暂时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然而，由于中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置于全球金融市场之外，中国再次受到保护，免受危机的最坏影响。该政权将国家资金投入到战略部门，引入了更多限制性的社会政策，并暂停了每年最低工资的增长。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投资提振了国内需求，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启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然而，它也导致了新债务的螺旋式上升、投机性泡沫和新的经济失衡。

再平衡的努力

对中共政权来说，这种不平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导致了中国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之间的空间分割。工资因生产政体³³⁷、在产业中的位置、部门、技能水平、性别和身份（例如，基于农村移民或城市工人的户口）而不同。早在21世纪初，中共政权就开始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项目，在内陆省份建立工业化中心。21世纪00年代末危机爆发后，中国加强了再平衡的努力，包括试图减少对（公共）投资和出口的经济依赖，并处理城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短缺，政府采取了

³³⁶ Phillip Inman, “World Economy at Risk of Another Financial Crash, Says IMF,” *Guardian*, October 3,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c4hyvj>. 这些问题继续造成不稳定，并将在 2020 年与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经济衰退期间再次发挥作用。

³³⁷ 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提出的概念，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工人与管理者的权力互动，后文例如“劳动政体”等等都是类似的意思，译者注。

新的措施，将工业转移到中国中部和西部的低工资地区。中共政权还寻求经济升级，即引进高科技机器，提高自动化程度，用低价值产业转换为高价值产业，以保证更高比例的生产价值留在国内。看到有机会通过升级或搬迁来削减成本，私营和国有企业都坚持了再平衡和升级政策。³³⁸所有这些都对农民工的处境和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提供的劳动力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首要条件。

罢工：移民的斗争和“廉价”劳动力的结束，2003-2012年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繁荣是基于对“廉价”农民工的剥削之上的，中共政权一再改变迁徙政策以保证其供应。第一波农民工学会了如何应对城市生活和新的劳动制度，到00年代初，他们开始组织更多的斗争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整个00年代，农民工的数量继续稳步增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渴望永久留在城市。他们的斗争在2010年的罢工浪潮中达到了顶峰。

早期的抗议活动

中国的农民工经历了不同的形成阶段。第一代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入城市，他们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旦赚够了钱就回家。他们不稳定的法律和就业地位、恶劣的工作条件、专横的管理和专制

³³⁸ 关于搬迁、自动化和升级的问题，见 Huang Yu and Naubahar Sharif,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orkers’ Power in South Chin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April 2017): 1–26,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tinyurl.com/y4atjrhq>; Florian Butollo,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4); Ralf Ruckus, “Rezension: Florian Butollo,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Sozial.Geschichte Online* 17 (2015): 135–48,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duepublico2.uni-due.de/servelets/MCRFileNodeServlet/duepublico_derivate_00042080/05_Ruckus_Li_Minqi.pdf.

的劳动政体、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劳动分工，以及宿舍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导致了工人的不满和骚乱。例如，在珠三角地区，外资投资消费品工业的主要地区之一，新的工业区内的罢工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³³⁹ 1993年和1994年，第一波动乱袭击了该地区，特别是工业城市珠海和深圳。农民工发起了罢工、静坐和示威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³⁴⁰早期的农民工骚乱，以及国有企业工人的不满，不仅仅得到了镇压的回应。出于对不稳定因素的恐惧，中共政权也开始规范劳工问题，界定工人的合法权利，并制定最低标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工会法》（1992）、《劳动法》（1995）和《仲裁法》（1995）。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这些法律以及其他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工人权利的法规，基本上被雇用农民工的企业所忽视，国家也几乎不会去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新的迁移模式

在社会主义时期和转型时期，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的剥削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此后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在90年代中共领导人江泽民领导的转型过程的最后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扩张确实为中国的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迁移并改善生活条件，但代价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生活不稳定。户籍改革为农村移民进入城市提

³³⁹ Chris Chan King-Chi,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08), 99 – 10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³⁴⁰ <http://web.warwick.ac.uk/russia/ngpa/Chanthesis.pdf>. Ibid., 108 – 14; also see Qin Ling, “Introduction: The Survival and Collective Struggles of Workers in China’s Coastal Private Enterprises Since the 1990s,” in Hao Ren, eds., *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6 – 7.

供了更多机会，驱逐（或所谓的遣返）的情况也有所减少。³⁴¹ 在整个00年代，总的劳动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000万，在2009年达到7.79亿。³⁴² 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群体是农民工，在00年代末，他们“占建筑、采矿和采石业总劳动力的近80%，占制造业的68%，占服务行业的50%以上。”³⁴³ 据凯西·沃克(Kathy Walker)说，“[到]2003年，['流动人口']已膨胀到1.5亿人，其中包括许多被非法手段或在未收到足够补偿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数千万农民。”³⁴⁴ 2009年，农民工的绝对数量估计约为2.3亿。³⁴⁵ 其中约有70%的人“在中国东部地区就业，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大中城市工作，一半的人在不同省份之间流动。”³⁴⁶ 移民的涌入也是城市化率上升的原因，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4%上升到2005年的43%，2010年的50%，以及2019年的60.6%。³⁴⁷

³⁴¹ 在2000年，不同地区的户籍做法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执行户籍限制，而一些省份和小城市不执行户籍或只部分执行。

³⁴² “在2009年，有2.97亿人从事农业工作……2.16亿人在第二产业工作，四分之三在制造业，另一大部分在建筑业。第三产业部门雇用了2.66亿人。到90年代中期，它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Ten Brink, *Chinas Kapitalismus*, 284 (translated by R. R.).

³⁴³ Leung Pak-Nang and Pun Ngai, “The Radicalis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Working Class: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Gemstone Indust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no. 3 (2009): 552,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tinyurl.com/yxrqn2zo>.

³⁴⁴ Walker, “From Covert to Overt,” 466.

³⁴⁵ “Labour Migration in China and Mongoli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ilo.org/beijing/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1lang--en/index.htm>.

³⁴⁶ Ibid.

³⁴⁷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9,” statista.com, September 10,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0162/urbanization-in-china>.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见 Zhang Mei, *China's Poor Reg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Poverty, Economic Reform, and Urb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Zhu Yu,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Habitat International* 31, no. 1 (March 2007): 65–76; Shahid Yusuf and Tony Saich, eds.,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迁移模式各不相同，从季节性迁徙和循环迁移（往返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到返回迁移（女性^{*}生孩子或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照顾他们）。³⁴⁸农民工一般仍然住在狭小的临时住房里，条件很差，有的住在国营或私营的宿舍里，有的住在城中村——这是对内城和郊区贫民窟的一种粉饰。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但他们的居住身份不稳定，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在那里永久定居。他们受到城市法规的歧视，被排除在某些城市福利项目和基础设施之外，并被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攻击为“外来者”和“落后”的乡巴佬。

在21世纪00年代末和10年代初，由于各种原因，经济特区和东部省份的城市中心的移民劳动力供应枯竭了。首先，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放缓，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这种影响在00年代末显现出来，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包括农村移民在内，越来越少。第二，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减少，也就是说，可用于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减少。第三，工业迁往中西部省份意味着农民工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不再需要迁往东部沿海的工业中心。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劳动力的反复短缺，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接受东部沿海几个地区的低薪工作。这些劳动力的短缺和持续的劳工斗争推高了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模式”岌岌可危。

第二代与2010年的罢工浪潮

本世纪初进入城市的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打算再回到农村务农。他们从父母、兄长和朋友在城市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他们越来越有组织性。

³⁴⁸ Cindy C. Fan,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London: Routledge, 2008), 124; also see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

³⁴⁹ 2003年后，农民工的抗争数量开始大幅上升。³⁵⁰ 起初，大多数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拖欠工资、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防御性行动。他们往往采取所谓的蜂窝式活动的形式——仅限于一个工作场所的短暂抗议。³⁵¹ 罢工是不合法的，但工人们组织了野猫罢工，并普遍形成了一种意识，即他们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抵抗。虽然在早期的案例中，来自某个地区的农民工亲属网络在骚乱中发挥了作用，而在00年代中期和后期，农民工在与管理层和国家的对抗中也形成了更多基于利益的纽带。同时，国家对公开的阶级辩论和组织的压制导致了一种工人的阅读障碍——缺乏一种以阶级形式表达要求的语言。³⁵²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农民工的斗争提出了改善的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来自经理和雇主的更多尊重。工人们利用他们“增加的筹码”，增强了在市场和工作场所讨价还价能力，这些都得益于区域性的劳动力短缺，工作场所罢工的经历，以及新的劳动法。³⁵³ 2010年，出口和就业的不景气以及全球危机后的工资压力，助长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农民工劳工动乱。那年夏天，罢工浪潮从广东佛山的一家本田

³⁴⁹ 关于代际间的变化，见 Zhu Yu,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 Zhu Yu and Chen Wenzh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 no. 4 (July - August 2010): 253 - 67.

³⁵⁰ Jay Chen Chih-Jou, “Growing Social Unrest and Emergent Protest Groups in China,” in Michael Hsiao Hsin-Huang and Lin Cheng-Yi, eds.,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96f.

³⁵¹ Lee, *Against the Law*, x.

³⁵² Pun Ngai and Chris Chan King-Chi, “The Subsump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boundary 2* 35, no. 2 (June 2008): 75 - 91.

³⁵³ Chan King-Chi,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368; Manfred Elfstrom and Sarosh Kuruvilla,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LR Review* 67, no 2 (April 2014): 454,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6013739_The_Changing_Nature_of_Labor_Unrest_in_China.

汽车供应商工厂蔓延到该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其他汽车公司和部门。³⁵⁴

罢工潮推动了农民工工资的大幅增长。³⁵⁵

总而言之，由于中共政权不允许独立的劳工组织，农民工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没有阶级组织”的。³⁵⁶这种限制阻碍了类似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同时也阻止了官方改革派劳工代表的出现，他们与资本家和政权谈判“交易”，确保工人的斗争保持在预定的集体谈判渠道内。虽然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的部分农民工成功地拓宽了中国的自发罢工和其他工作场所行动的空间，但其他工作场所议价能力较弱的农民工无产者不得不使用不同的手段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愿望。全国各地频繁发生暴乱，大规模的社会爆发，有时涉及成千上万的人。通常，它们是由国家官员、地方警察、当地市民和富人对农民工、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任意或攻击性行为引发的。³⁵⁷

³⁵⁴ 关于本田罢工、罢工浪潮、农民工的动员，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遏制动乱中的可疑作用，见 Eli Friedman,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0ff.; Florian Butollo and Tobias ten Brink, “Challenging the Automization of Disconten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no. 3 (2012): 419–40,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mpifg.de/pu/mpifg_ja/CAS_44_2012_tenBrink.pdf; Friends of Gongchao, “‘Sie haben das selbst organisiert’ —Die Streikwelle von Mai bis Juli 2010 in China,” in Pun Ngai, Ching-Kwan Lee et al., *Aufbruch der zweiten Generation. Wanderarbeit, Gender und Klassenzusammensetzung in China* (Berlin: Association A, 2010), 225–57,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yq3y4lg>; Lance Carter, “Auto Industry Strikes in China,” *Insurgent Notes*, October 28, 201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insurgentnotes.com/2010/10/auto-industry-strikes-in-china>.

³⁵⁵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11年中国1.58亿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比2010年激增21.2%，达到2,049元。在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期间，中国的平均最低工资每年增长12.5%”；“China Sets Target of Average 13 Percent Annual Minimum Wage Rise,” Reuters, February 8, 2012,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jobs-idUSTRE817ODY20120208>.

³⁵⁶ Chris Chan King-Chi, “Contesting Class Org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Strike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1978–201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83 (Spring 2013): 132,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tinyurl.com/yyjces8z>.

³⁵⁷ 一个例子是2011年6月发生在广东增城的骚乱，当时农民工抗议者开始“焚烧政府大楼，砸毁警车，并与防暴警察发生数千次冲突。”这场骚乱是由保安攻击一个街头小贩引发的，但其他因

虽然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将资本家视为剥削者，将（当地）国家视为他们的帮凶，并且能够组织日常斗争和偶尔的大规模抗议，但“资本迁移和外包生产的能力……削弱了[他们]的市场、工作场所和协会的力量。”³⁵⁸ 他们还继续按照年龄、性别、地区和企业类型被分开，城乡差别仍然起着作用，把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分开。此外，中共政权的冲突调节机制和镇压措施也起到了防止大规模海啸式抗议活动的作用。然而，这些对策却未能阻止频繁的劳工抗议。

移民女性*的日常斗争

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男性*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比例大幅增加。³⁵⁹这些女性*移民大多是年轻人，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她们移民的一个原因是——就像所有的移民一样——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但许多人移民也是为了逃离父权制的乡村结构，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³⁶⁰ 然而，在城市中，女性*面临着性别分工，大多数人只能找到低薪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在城市家庭中担任家政工人，从事其他护理工作，或从事性产业。移民女性*也受到歧视和诋毁，被指为“落后”和“低素质”。³⁶¹ 尽管如此，在城市中做雇

素，如“对其他社会压力的潜在挫败感，包括猖獗的食品价格和住房通货膨胀，以及腐败的地方官员”，也激起了许多抗议者的愤怒；James Pomfret, “Police Use Tear Gas to Quell Riot in Southern China,” Reuters, June 13, 2011,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INIndia-57658220110613>.

³⁵⁸ Chan King-Chi,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369.

³⁵⁹ Rachel Connolly, Kenneth Roberts, and Zheng Zhenzhen, “The Impact of Circular Migr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6, no. 1 (January 2010): 4.

³⁶⁰ Ibid., 5. 关于早期女性移民的特殊处境，参见 Delia Davin, “Migration, Women and Gende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omas Scharping, ed.,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7), 297–314；另见第三章第二节，讨论了转型时期的移民女性*群体。

³⁶¹ Yan Hairong,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3.

佣劳动者的生活，以及经常和更多的无产阶级女性*住在一起的经历，改变了她们的态度。她们作为发起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参与了农民工的劳动斗争。当返回农村时（无论是否是暂时）这些移民女性*往往不愿意再接受某些父权制的习惯或结构。例如，直到00年代，包办婚姻在农村家庭中仍然很普遍，直到许多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年轻移民女性*拒绝接受这种做法。³⁶² 她们还在其他地方挑战极限，晚婚晚育，逃避家庭成员的控制和压力，并尝试婚前性关系。然而，虽然移民女性*赢得并捍卫了新的空间，但她们继续经历着剥削、歧视和性暴力——包括对她们的新愿望和日常斗争的反应。

扩张：新常态和向外跨越，2012-2020年

随着21世纪10年代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了战略，将较低的增长率定为“新常态”。工业的重组和搬迁导致农民工反对工厂关闭和裁员的斗争加剧。同时，随着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农村转型继续进行。正在进行的父权制重塑引发了新的女权主义辩论和反抗。面对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政府试图巩固和合理化政府机构。它引入了新的反贪污措施，收紧了审查制度，加强了监控，并赋予最高领导人新的权力。从21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强了经济升级的尝试，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扩大海外的经济事业。全球扩张和不断增加的经济参与，以及区域军事建设，挑战了美国作为当前的霸权地位。2019年，中共政权对香港的日益干预引发了一场抗议运动，构成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大

³⁶² Fan, *China on the Move*, 18.

流行造成社会和经济问题，可能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

债务、经济放缓和泡沫

21世纪00年代末，中国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发展，设法摆脱全球危机的影响。这导致了公共和企业债务的增加，生产过剩和投机性泡沫的出现。由于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投资热潮一再威胁到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共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监管。当它真正降温时，投资者转向发展中的股票市场，创造了另一个泡沫，并在2015年破灭。³⁶³

同时，中国的GDP增长率从00年代末的10%以上降至10年代末的7%以下。³⁶⁴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值消费品出口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保证同样的高增长率和就业增长。与前20年一样，中共政权需要确保物质上的改善来维持其合法性。为了让民众适应新的经济动态，自2012年起执政的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将新形势描述为“新常态”。它试图通过巩固和重新平衡中国经济来解决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得到了解决，尤其是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国有企业。³⁶⁵为了减缓或阻止债务水平的上升，政府

³⁶³ 大批城市中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因为他们从改革中受益，尤其受到住房市场变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和房价上涨是他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泡沫破灭的简短叙述，见 Ralf Ruckus, “China Crash—The Falter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 gongchao.org, September 2015,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www.gongchao.org/en/texts/2015/china-crash>. 关于最近的房地产价值变化对政权在中产阶级中的合法性的影响，见 He Huifeng, “China’s Middle Class Frets the ‘Good Times’ Are Over amid Sliding House Prices, Stagnant Wag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6,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4psudpb>.

³⁶⁴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3年至201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接近或超过10%，但此后下降并一直保持在8%以下。2019年是6.19%；“GDP Growth (Annual %)—China,”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1,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CN>.

³⁶⁵ 由此产生的生产上限导致了这些战略部门的裁员和工人的反复斗争；见 Kevin Lin, “Labour Protests in the State Sector: Back to the Nineties?” *Made in China* 1, no. 1 (201

开始了去杠杆化的尝试，包括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融资工具，控制资本输出和对外投资。³⁶⁶ 它试图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支持向高价值生产的升级，并通过搬迁和补贴减少不同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下一次重大危机爆发了。

对农民工和农民的持续压榨

在21世纪10年代，农民工不得不应对新的压力。东部沿海省份的工资上涨和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引发了制造业产能的转移，不再仅仅是向内陆省份转移，而且还向其他国家转移，如越南和孟加拉国。³⁶⁷ 更多的农民工被裁员，因为他们的公司搬迁、关闭或裁员。许多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例如，在不断扩大的服务行业中从事低薪工作，或者跟随资本的转移而迁往内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比以前慢。虽然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在00年代和10年代初有两位数的增长，但政府在10年代中期限制了增长。³⁶⁸ 与此同时，许多中小城市的户口限制被进一步放宽或取消了。但在北京

6) : 12 - 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www.chinoiresie.info/PDF/madeinchina-2016_ISSUE1.pdf.

³⁶⁶ 对资本输出的控制导致中国企业在21世纪10年代后期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减少；见“China's 2019 FDI Up 5.8%, Outbound Investment Slumps,” Reuters, January 2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fdi-idUSKBN1ZK05I>. 国家甚至控制了几家以前在国外大规模投资的公司。

³⁶⁷ Rahul Jacob, “China Factories Eye Cheaper Labour Oversea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2011,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f3e4e612-061d-11e1-a079-00144feabdc0>.

³⁶⁸ “China's Workers are Saying Goodbye to Double-Digit Pay Raises,” Bloomberg, June 19, 2017,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y9m43s>. 在2009年，中国2.5亿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417元/月，2014年为2864元(增长约100%)，2019年为3962元(增长不到40%)；“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statista.com,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06686/china-monthly-income-of-migrant-workers>.

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情况并非如此，移民甚至被赶出了中心城区，因为这些地区是为高收入人群而重组和开发。

农民工的斗争又变得更加具有防御性。根据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的说法，他们“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欠薪、工厂搬迁和破产。”³⁶⁹然而，劳工骚乱也“跟随”资本搬迁和就业的转移。在这十年间，中国内地和服务行业的斗争数量（和比例）都在增加。³⁷⁰由于移民在90年代已经开始加速，此时一些移民已经老了，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甚至更老。他们开始考虑福利待遇、养老金和补偿金。2014年东莞裕元制鞋厂的罢工是一个突出的案例，即要求雇主支付养老保险金的斗争。³⁷¹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工出现了，他们努力想摆脱低工资、肮脏、无聊和危险的工作。他们梦想着能找到白领工作，并达到与（城市）中产阶级相似的消费水平。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只能从事乏味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业工作，例如，作为保安人员或平台或零工经济中的低工资工人。³⁷²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具体的罢工表明，组织劳工行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还在继续传播，并使工人能够超越一

³⁶⁹ Eli Friedman, “Marketizing China: Factory Relocations and Land Privatizations Have Put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on the Defensive,” Jacobin, September 9, 2015,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9/china-crash-yuan-devaluation-adidas-foxconn-strike>.

³⁷⁰ For a discussion, see Daniel Fuchs, “Going West—Industrial Relocation and Migrant Labour Unrest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PhD dis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9).

³⁷¹ Friends of Gongchao, “The New Strikes in China,” gongchao.org, July 2014,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14/07/01/new-strikes>.

³⁷² 即使是那些找到办公室工作的年轻移民或城市人，也因为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工资低而越来越不满。许多人的反应是在职场中进行日常形式的反抗，一种“无声的反抗”，因为他们“通过拒绝加班、提供中等质量的工作、经常去厕所并在那里呆很长时间、玩手机或在工作中看小说来偷懒”；Alice Yan, “年轻员工通过偷懒、拒绝加班和躲在厕所里来反抗中国的工作伦理。他们称之为‘摸鱼’，”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 2021, accessed January 6, 2021, <https://www.scmp.com/lifestyle/article/3116109/young-employees-rebel-against-chinese-work-ethic-being-lazy-refusing>.

个公司或一个地区的限制进行协调，例如，2018年4月起重机操作员和同年6月卡车司机在几个省份组织了壮观的罢工行动。³⁷³

城乡差距以及对农民的压力继续存在。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居民多于农村居民的情况。³⁷⁴到2018年，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³⁷⁵此后，面对低出生率和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中国政权进一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提高城市化率，保证城市工业的劳动力供应。为了满足城市化和农业资本的土地需求，以及地方农村当局的财政利益，对农民的剥夺一直在持续。在“2007年，分配给村户的耕地中只有5.2%被正式转让给他人；到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35%以上。”其中90%以上的土地被转让给“大型农场经营者”，只有不到10%用于城市建设。³⁷⁶失去分配到的土地的农村家庭往往受到胁迫，被迫接受转让。农民们组织了抵抗。“与农村土地征用有关的抗议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从21世纪初到2014年持续增加和加强。”³⁷⁷自2015年以来，农民反对剥夺土地的斗争数量有所减少，而这些冲突的原因仍未得到解决。主要原因是习近平政权对

³⁷³ 关于起重机操作员，见Wang Jianguo, “The Significance of Crane Operators across China Going on Strike,” *China Change*, May 7,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4jvgd23>; on the truckers, see Tan Jiangying, “Truckers on Strike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China Change*, June 15,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au54176>.

³⁷⁴ Yeh, O’ Brien, and Ye Jingzhong, “R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915.

³⁷⁵ “这仍然低于所有中上收入经济体66%的平均水平，这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分类，离高收入经济体81%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Sharon Chen和Li Dandan, “中国放松城市居住限制以刺激增长：习近平对数十年前的政策的改革将推动人们向国家内陆的城市转移，” Bloomberg, January 14,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6zws8gs>.

³⁷⁶ Luo Qiangqiang and Joel Andreas, “Mobilizing Compliance: How the State Compels Villages Households to Transfer Land to Large Farm Opera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 no. 6 (October 2020): 1189.

³⁷⁷ Jay Chen Chih-Jou, “Peasant Protests over Land Seizure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 no. 6 (October 2020): 1328.

社会动荡的镇压越来越严重。针对土地攫取行为的抗议者受到越来越多的恐吓和逮捕。

同时，该政权还推动了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在10年代末，中共领导层奉行“乡村振兴”政策。这意味着在一些地区支持更加专业化的高价值产品的种植，如特殊的蔬菜，而在其他地区，这意味着进一步发展大农场和“美国式农业”。³⁷⁸取消农村居民的土地分配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³⁷⁹

对社会斗争的严格控制和镇压

在过去几年中，中共政权加大了社会动员和斗争的控制力度。一旦斗争升级，国家的地方或省级机构就会进行干预。他们的干部接受了反暴动技术的培训，包括镇压、让步和拉拢。他们被要求评估动乱的广度和重要性，识别“头目”，威胁参与者，如果镇压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他们就会向公司老板和经理施压，使其做出让步。³⁸⁰

对抗议和罢工参与者的镇压形式取决于其参与的性质。例如，单纯的法外罢工参与者通常不会面临任何报复（除了罢工造成的工资损失），而为管理层所知的抗议发起人和组织者则会被解雇。如果抗议活动蔓延到公司场所之外，并导致在公共场所的示威（例如，在政府大楼外），警察就会出动，有时还会进行干预。试图建立跨公司、跨部门、跨地区联系和

³⁷⁸ Michael Standaert, “Countryside Fit for a Superpower? Inside China’s Colossal Rural Revamp,” *Guardian*, September 6,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5ex5fds>.

³⁷⁹ 在21世纪10年代的农村改革中，有一项扶贫计划，基本的福利措施和农村补贴被用来改善村庄中许多穷人的生活条件。然而，在2020年，李克强总理不得不承认，有6亿人仍在靠每月仅有的1000元（约140美元）生活；*ibid.*

³⁸⁰ Ching-Kwan Lee and Zhang Yongho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May 2013): 1475–1508.

行动的工人活动家，或者甚至试图建立替代性工会结构的工人活动家，都面临着更严厉的压制，包括逮捕和监禁。

在2010年的罢工浪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似乎政府可能会改变其政策，在劳资纠纷中引入更多的法团主义因素。国家控制的全国总工会组织了更多国企和私企农民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部门仍然反对并阻止罢工，但如果爆发了自发罢工，它往往会与管理层谈判，以解决冲突并避免升级。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东和其他省份的干部甚至讨论了在雇主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之间引入集体谈判的形式，以控制劳工动乱，但由于党中央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从未实施。³⁸¹在1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任何形式的（独立）组织定为犯罪并予以起诉。例如，2015年12月，广州的几个劳工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者在其中一些人参加了罢工行动后被逮捕。³⁸²2018年夏天，深圳的佳士科技焊接设备厂的工人动员起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并成立公司工会，导致冲突再次升级。劳工活动家（大部分是年轻的毛派人士，以及数百名学生支持者）在一些佳士工人和活动家被拘留后，举行了街头抗议和媒体宣传活动。警方进行了报复，又逮捕了几十人。此后，安全部门普遍加强了对左

³⁸¹ 对于这些关于集体谈判的官方辩论的讨论，见Chris Chan King-Chi and Elaine Hui Sio-le 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China Quarterly* 217 (March 2014), 221–42. 对全总改革的批判性评估与对集体谈判的希望，可以参见 Frido Wenten, “Gewerkschaftsreformen in China—Segen oder Fluch? Kontroverses zu Tarifverhandlungen und ‘zellulärem’ Aktivismus,” *Sozial.Geschichte Online* 20 (2017), 53–98,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duepublico2.uni-due.de/receive/duepublico_mods_00043555.

³⁸² Cao Yaxue, “Chinese Authorities Orchestrate Surprise Raid of Labor NGOs in Guangdong, Arresting Leaders. Who the Activists Are, and Why the Government Is Striking Hard Against their NGOs,” *China Change*, December 10,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chinachange.org/2015/12/10/chinese-authorities-orchestrate-surprise-raid-of-labor-ngos-in-guangdong-arresting-leaders>.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在广东省成立的劳工非政府组织有时会被容忍，但以前也经历过压制。通常情况下，当它们威胁到当地资本家或干部的利益时，它们就会被迫关闭。

派劳工支持机构的摸底和镇压工作。³⁸³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进程和国家为遏制它而采取的措施对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产生了严重影响。农民工面临着裁员、减薪和拖欠工资。³⁸⁴ 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劳工骚乱仍在继续，但与前几年相比，其可见性和广度都有所下降。³⁸⁵

转型期的性别影响和女权主义话语

向资本主义转型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复杂影响。它打开了以前被封锁的空间和可能性，但也重新配置了性别歧视和暴力的形式。女性*遭受暴力的程度、自主程度和社会流动性取决于她们的阶级背景、地区出身（城市或农村）以及民族或“种族”（汉族或“少数民族”）。一些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可以获得相对良好的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一份白领办公室工作——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更多的城市家庭投资于他们的女性后代。与此同时，大多数农村、移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女性*被迫从事制造业、服务业或农业的低薪工作，大大限制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³⁸³ On Jasic, see Shannon Le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Shenzhen Jasic Events,” Shannon Lee’s China Blog, September 17,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olfsmoke.wordpress.com/2018/09/17/jasic/>; Tian Miao, “‘Neue Allianzen’ —Die Repression gegen ArbeiterInnen und Studierende in China,” Express nos. 8–9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3r6lk74>; Ralf Ruckus, “Verhaftet, verhört, verschwunden,” WOZ, August 8, 2019,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0, <https://www.woz.ch/-9e3b>.

³⁸⁴ Cissy Zhou, “China’s Migrant Workers See ‘No Hope’ in Virus-Stricken Rural Hometow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6cptph6>; “Minimum Wage Increases Stall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China Labour Bulletin, December 16, 2020,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0, <https://clb.org.hk/content/minimum-wage-increases-stall-under-impact-covid-19-pandemic>.

³⁸⁵ Worker Study Room, “Worker Organising under the Pandemic: Reflections from China,” chuangcn.org, July 21, 2020,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0, <http://chuangcn.org/2020/07/pandemic-Workers>. For strike trends, see “Strike Map,” China Labour Bulletin,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0, <https://maps.clb.org.hk>.

中共领导层主要认为女性^{*}是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必要来源。³⁸⁶到了2世纪90年代中期，当大跃进后的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已过了生育年龄，独生子女政策因而得到了部分放松。³⁸⁷ 2016年，独生子女政策转变为二胎政策，这是为了应对低迷和不断下降的出生率，这扩大了国家和经济的人口问题：自2010年左右以来，劳动力市场上新进入的人数下降，因此更多的劳动力短缺迫在眉睫，而且，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国家还没有制定足够的手段来处理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员。自2018年以来，政府甚至表示可能完全废除这种生育控制，因为近年来出生率仍然没有增加。

作为对女性^{*}要求平等权利和保护的压力的让步，政府出台了新的法律，包括在2015年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在现实中，女性^{*}仍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压在性别分工中，被迫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和有偿劳动的“双重负担”。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从70年代末的90%左右稳步下降到1990年的73%，2000年的71%，以及2020年的60%。³⁸⁸在人们看来，女性^{*}不如男人，她们遭受压迫、歧视、骚扰和家庭暴力——特别是在农村。“结婚和离婚，土地和财产，工作和家庭，法律和习俗都歧视妇女，使她们处于明显的经济劣势。”³⁸⁹

³⁸⁶ Ralf Ruckus, “Birth Strike against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nqch.org](https://nqch.org/2020/03/29/birth-strike-against-chinas-population-policies), March 29,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20/03/29/birth-strike-against-chinas-population-policies>.

³⁸⁷ 此时，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的持续歧视导致了大量女性胎儿的堕胎。性别平衡转向了更多的男孩^{*}，这带来的副作用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有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³⁸⁸ According to World Bank data;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 (Modeled ILO Estimate)—China,”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CN>.

³⁸⁹ Tania Branigan, “For Richer, for Poorer: How China’s Laws Put Women Second,”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dlcuxn>.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加强了对性生活的控制，而且不仅仅是对女性^{*}的控制，作为其遏制与“西方影响”相联系的不受控制的社会机构运动的一部分。它审查了显示“淫秽”行为、同性恋之爱或裸体的公开表达和媒体节目，这种行动路线不仅让人想起儒家思想，也让人想起社会主义时期谨慎和压抑的道德和法规。

同时，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女权主义的话语、组织和抵抗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90年代，中共政权允许妇女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没有提供（足够）援助的地方处理某些社区的福利任务。从那时起，女性*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开始着手解决家庭暴力、性骚扰、绑架、买卖妇女*和女孩*以及杀害女婴等问题。³⁹⁰中共领导层允许这些活动，只要它们不严重破坏父权地位或挑战中共领导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并存。靠近党内或学术界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大多局限于讨论女性*问题和中国及国外的女权主义思潮。在21世纪10年代，新一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出现了，其中许多是学生或以前的学生，她们参与了小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或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新空间，公开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她们推动公共教育行动（例如，反对家庭暴力），她们坚持基本的单一问题策略，以避免与国家正面冲突。一些人还加入了对其他社会斗争的支持，例如，2014年广州的清洁工罢工事件。³⁹¹

当中共政权开始大规模攻击社会非政府组织时，由于它害怕自主的组织和抗议形式，对女权活动家的镇压也加剧了。它特别针对那些参与公共活动，提出歧视和暴力问题的人，如女权五姐妹，她们是一群年轻的活动家，2015年在北京准备这样的行动，结果被逮捕。此后，女权主义活动家不得不应对国家机关的更多威胁、逮捕和审讯。³⁹²21世纪10年代末，揭

³⁹⁰ “这些问题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来说并不陌生，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改革后的新特点是，它们现在被公开讨论，而不是停留在私人悲伤或耻辱的负担上，并被概念化为‘封建残余’，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得到补救”；Louise Edwards, “Issue-Based Politics: Femi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Return of Bourgeois Feminism?” in David S.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206.

³⁹¹ Yi Xi, “New Foundations for Struggle and Solidarity: The Culm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Privatization on a Guangzhou Island,” libcom.org, October 7, 2014,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libcom.org/blog/guangzhou-sanitation-strike>.

³⁹² Cao Yaxue, “Detention of Five Chinese Feminist Activists at the Juncture of Beijing+20—An Interview with Gender Scholar Wang Zheng,” China Change, April 11, 2015,

露美国娱乐业中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的#MeToo运动，迅速蔓延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和其他国家，重新点燃了在中国已经存在的关于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辩论。它面临着国家机器、中共和其他机构中的紧密联盟，这些机构长期以来掩盖猖獗的性别歧视行为和暴力行为。

除了像#MeToo这样直接攻击性别歧视和父权结构的女权运动外，过去几年还出现了另一种女权主义表达表达的“社会”形式，这让中国女性的生活有了改善的希望。虽然由于国家的压制，组织的政治空间有限，但“社会”女权主义利用在线社交媒体作为工具，联系、辩论，并公开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它与“政治”和有组织的女权主义相关，但不一定使用女权主义术语或口号。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争取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自主权，继续“生育罢工”，旨在晚婚，必要时离婚，决定晚生或不生，所有这些都是在持续的父权制和国家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³⁹³

“政治”和“社会”两种女权主义都产生了父权制的反弹。然而，中共政权对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合作和无偿劳动的依赖，赋予了女性*某种结构性的议价能力，她们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2w2w7sh>. “Feminist activists are being criminally detained after reportedly planning to distribute stickers with slogans highlighting sexual harassment” ; Tania Branigan, “Five Chinese Feminists Held Ove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Plans,” Guardian, March 12,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dwxyj2>.

³⁹³ “欺骗和暴力让中国女性要求离婚。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四分之三的离婚案件是女性提出的”；Liu Yujing, “Cheating and Violence Have Chinese Women Calling for Divor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9,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3dnqhk2>. 关于不同形式的女性*为更多的自治与空间进行的斗争，参见Angela Wu Xiao and Dong Yige, “What Is Made-in-China Feminism(s)? Gender Discontent and Class Fric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1, no. 4 (October 2019): 1–22,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tinyurl.com/yy5p6pw6>.

维稳、监控和国家安全

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的执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前几个时期不同的是，中国的全球地位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环境和政治问题限制了该政权以实质性让步来回应来自下层的压力。习近平政权试图重新集中权力，重新加强中共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虽然在2012年之前允许一定程度的党内辩论和竞争，但此后该党一直试图压制任何反对习近平及其支持者的声音。2018年，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被取消，习近平达到了自毛泽东以来中共领导人所没有的政治地位。加强中央治理的目的是为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危机打下基础，但它也可能消除迄今为止通过干部考核、竞争和定期更换领导层所建立起的中共危机管理的灵活性。³⁹⁴

自2012年底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层一直在开展针对各级腐败干部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即把离心离德的干部挑出来加以惩罚。他们猖獗的腐败行为，以及他们的专横、傲慢和公开炫耀财富，经常引发公众的愤怒，破坏了政权的合法性。这场运动也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行政管理更有效率，因为腐败和贪污的资金阻碍了该政权重组经济的努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腐败还是仅仅属于党内的不同派系，离心离德的干部也受到了惩罚，以劝服他们和其他人坚持党的官方路线。

在21世纪10年代，来自党外的异议和批评也越来越受到压制。自2015年以来，国家安全部的镇压力度加大，不仅打击了上文提到的女权活动家和劳工非政府组织，而且还打击了人权律师和环保倡议。作为控制和限制一般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手段，该政权利用新制定的法律条例，如《国家

³⁹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领导层的定期交替（大约每10年一次）确保了不同派别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对党和政府职位的竞争，也是对管理国家的最佳战略的竞争。最高领导层的这种继承形式可能结束，使这种竞争及其效果受到质疑。

安全法》（2015年）、《慈善法》（2016年）和《非政府组织法》（2017年）等形式。智能手机上在线应用程序的广泛使用使国家能够使用新的控制、审查和惩罚技术。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加强了互联网审查和公共场所的摄像监控。2020年，政府实施了它一直在区域内测试的社会信用体系，用于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评分，并惩罚违规行为。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名为雪亮工程的项目，让人想起中共的一项旧举措。在社会主义时期，“城市被分割成社会主义工作单位的网格，在那里获得口粮、住房和其他福利的权利由当地的间谍执行……今天，网格系统已经恢复，由一个广泛的志愿者和兼职望风者网络负责。”³⁹⁵

中国政权在国内安全机构上花费的资金多于军事开支，这表明它认为国内反暴动和治安是多么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疆甚至建立了一种全景监视式的政府。这一高度镇压的系统据称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教恐怖活动的蔓延，包括压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措施。DNA图谱，私人智能手机上的强制性间谍应用程序，广泛的视频监控，定期搜身，在劳教所大规模拘留，以及强迫劳动。³⁹⁶新疆的镇压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反体制运动和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是一个警告。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有两个因素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在2012年后进行了决定性的重新调整。首先，中国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值消费

³⁹⁵ Louise Lucas and Emily Feng, “Inside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Financial Times, July 20,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2182eebe-8a17-11e8-bf9e-8771d5404543>.

³⁹⁶ 关于中共政权在新疆为其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而改组该省的战略的更多信息，见 Darren Byler, “Spirit Breaking: Uyghur Dispossession, Culture Work and Terror Capitalism in a Chinese Global Ci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8),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0, https://digital.lib.washington.edu/researchworks/bitstream/handle/1773/42946/Byler_washington_0250E_19242.pdf.

品的角色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潜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毕竟，对财务、供应链、物流和分销以及最终利润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手中。其次，国内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对国家投资和补贴的依赖，以及要求苛刻和有战斗性的劳动力等问题都无法解决。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海外扩张来解决这些问题。它采纳了早期政府较为温和的计划，如江泽民90年代末的“走出去”战略，并利用其在其他国际倡议方面的经验：2000年开始的中非合作论坛，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9年开始的最大新兴经济体（所谓金砖国家）之间的协调，以及2012年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又称16+1）。³⁹⁷ 2013年以“一带一路”倡议（BRI）为名推出的新计划更具雄心。它旨在通过中共政权控制的全球贸易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将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联系起来。中国的企业应该获得新的投资机会，以及获得国外的生产要素——原材料、土地，最终还有劳动力。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共政权成功地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持。一带一路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包括国家赞助的项目，如公路、港口、铁路线、管道、发电站和制造设施。国家基金以及在中国控制下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主要为实现通常由中国国有企业和当地合作伙伴经营的项目筹集信贷资金。

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它对伙伴国施加的合同和信贷条件，导致了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指控。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新铁路和港口，据称将其政府推入了中国的“债

³⁹⁷ 16+1在2020年希腊政府加入后变成了17+1，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欧洲获得影响力的大战略的一部分。除了东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利用欧元危机和希腊等国家的衰弱来购买资产（基础设施），打开市场，并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重要性。21世纪10年代末，中国国有和私营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增加，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如港口和主要制造商（如德国的汽车供应商），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加强干预和控制的辩论，以及加强审查和可能阻止这种投资的措施。

务陷阱”。³⁹⁸例如，马来西亚政府能够成功质疑已签署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合同，并对条款进行了重新谈判。与此同时，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偿还港口项目的债务，不得不将该港口的主权权利移交给中国。此外，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中国投资导致了当地人的流离失所和歧视，以及环境破坏。为了应对这些批评并促进中国的利益，中共政权加强了对海外的软实力攻势。中共统战部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全球利益，将公众舆论转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并推动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成为西方或美国模式的成功替代方案。³⁹⁹

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竞争

全球扩张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也取决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因素。因此，中共政权也在筹划军事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军事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拥有众多基地、机动作战部队和长期军事干预经验的美国。中共军事战略的一个目标是保护海外的投资、人员和供应链（例如原材料），特别是沿着一带一路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首次成为一个主要的海洋大国。据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的港口可以由中国的海军使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周边地区之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在吉布提开设。军事战略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国家的完整，震慑潜在的军事敌人。中共政权根据其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在该岛周围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其利益。它与

³⁹⁸

See, for example, Colby Smith, “Belt and Road, or Debt Trap?” Financial Times, July 24,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418aac4a-d3b1-379d-8e34-e0ae2462d8e2>; Jevans Nyabiage, “Are Chinese Infrastructure Loans Putting Africa on the Debt-Trap Expr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8,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51eeztj>.

³⁹⁹

中共政权也在投资于能够宣传其信息的软实力工具和机构。官方国际电视台CGTN播出的意识形态组合包括提及国家的儒家传统、关于中共领导人英雄主义的神话、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正义角色，以及民族主义宣传。

几个国家有领土冲突，例如，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与日本在靠近台湾的一组岛屿。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海域的大部分地区被它宣称为其领土。这导致了与周边国家政府和美国政权之间的问题，而美国政权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海上力量。⁴⁰⁰

总而言之，中共政权试图建立地区和全球联盟，与非洲和拉美国家进行经济交往，并开展一带一路项目和军事建设，这些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权产生了冲突。另一个公开的挑战是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MiC2025）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在十年内实现关键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⁴⁰¹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使该国的经济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末在经济上超过美国。

美国政权试图捍卫美国作为全球霸权超级大国的地位，并选择施加经济压力。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了新的、更高的关税，以迫使中国政府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降低贸易壁垒，并停止对西方技术知识的“盗窃”行为。当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自己的关税时，这升级为一场所谓的贸易战。这场冲突可能证明了一个新的两极对立或“冷战”的开始。2020年初，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妥协的“第一阶段”协议，可以理解为临时和部分休战。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它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竞争的加剧产生了更多

⁴⁰⁰ 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及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的讨论，见 Walden Bello, *China: An Imperial Power in the Image of the West?* (Bangkok: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2019). 21世纪10年代，中共政权还开始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士兵，这不仅为中共军队提供了海外任务的经验，而且在驻扎的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见 Logan Pauley, “*China Takes the Lead in UN Peacekeeping: As the U.S. Backs Away, China Is Stepping Up Investment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Diplomat*, April 17, 2018,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china-takes-the-lead-in-un-peacekeeping/>.

⁴⁰¹ 关于BRI和MiC2025的简短介绍，见 Ralf Ruckus, “*Pokerspiel um die globale Vorherrschaft,*” *WOZ*, August 23, 2018,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0, <https://tinyurl.com/y3wz6fsz>.

的战线。中国制造2025和美国政府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电子公司的攻击助长了一场争夺领导权和市场的“科技战”。美国政府因中共领导层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镇压行为而对中共国家官员和公司的制裁，以及在南海的军事集结，进一步挑衅了中共政权。这与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经济危机相吻合。在几个月内，中共领导层通过实施严厉的封锁，成功遏制了冠状病毒的传播。在该年第一季度因封锁措施而出现经济滑坡后，它在第二季度成功地重新启动了经济。⁴⁰²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无法及时控制冠状病毒，在限制其经济影响方面面临重大问题。

中美两国的离心力可能导致两国经济“脱钩”。由于“贸易战”税收和限制的影响，全球生产和供应链已经发生变化。这种“脱钩”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的危机会破坏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相反，美国统治阶级（包括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代表）担心，如果政府不与中共政权对抗，迫使其接受美国及其盟友几十年来一直强加的帝国主义规则，美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失去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霸权地位。乔·拜登领导的美国新政府肯定会继续对中共政权采取遏制措施。

香港危机

201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权及其盟友之间竞争的另一个热点地区。春末夏初，形成了一场反对中共政权加强对该市事务干预的大规模运动。这场异质的、基本上没有领导的运动要求香港保持相对自治，并扩大民众的民主和选举

⁴⁰² 中国共产党政权采用的措施与2007–2008年危机后采用的措施相似；见，例如，“China Returns to Old Construction Playbook to Boost Growth,” Bloomberg, September 6,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26n6pax>. 这些措施可能会加剧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和债务上升等结构性问题，但自上一次全球大危机以来，全球形势和中国的全球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见 Ralf Ruckus, “Will China Push the Global Economy Like Ten Years Ago? Maybe Not,” nqch.org, September 1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20/09/11/will-china-push-the-global-economy-like-ten-years-ago-maybe-not>.

权利。巨大的示威活动显示了城市的广泛支持，许多人参与了基层的活动。对中国企业的多次暴力袭击、主要由年轻抗议者组成的“黑群”(Black Bloc)与香港警察之间的冲突以及警察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引起了全球关注。对中共政权来说，最大的尴尬是2019年10月1日的骚乱。⁴⁰³数千名抗议者在香港袭击警察，成为全球头条新闻，而与此同时中共领导层在北京举行大规模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⁴⁰⁴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自己的货币和便利商业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投资进出门户角色。美国和欧盟等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表示支持。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抗议运动，即使这意味着进一步疏远外国领导人并危及香港的经济作用。它利用减缓和瘫痪该运动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于2020年7月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从那时起，听从北京的中共政权命令的香港政府就利用这项新法律来平息抗议活动，并惩罚抗议者。

然而，2019年香港数百万抗议者的基层动员可能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新一轮斗争的预兆。即使抗议活动被压制，即使中国日益专制的路线暂时将反对派力量推向地下，但不满情绪仍在酝酿，并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爆发出来。

⁴⁰³ 原文为2020年10月1日，经查有误，在译文中进行了修正，译者注。

⁴⁰⁴ 有关该运动的更多信息，见 Ralf Ruckus，“Out of Control—Hong Kong’s Rebellious Movement and the Left,” nqch.org, September 10,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19/09/10/out-of-control-hong-kongs-rebellious-movement-and-the-left>.

梗概：中国资本主义的巩固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已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反对土地盗窃、腐败、改制和社会倒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崛起速度加快。此后不久，农民工的骚乱加剧。胡锦涛领导的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以一套有限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威胁来应对来自下层的斗争。从2007年开始，中共政权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后，为启动国内和全球经济而注入的）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工厂”，而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同时，农民工的斗争在2010年的罢工浪潮中达到顶峰，他们赢得的工资增长标志着“廉价劳动力模式”可能结束。2012年之后，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的社会不满情绪。为了巩固党和国家机关，它试图通过反贪污运动来精简和惩戒党和国家的干部。监视、控制和审查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以防止异常行为和社会反对。有组织的社会反抗，如女权主义和劳工运动，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同时，中共政权的一带一路计划，即在中国控制下的全球经济网络，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即成为世界高科技的领导者，显示了该政权的全球野心，并引发了与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的激烈竞争。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时期和90年代中期的过渡时期都以新的社会紧张和斗争结束。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被镇压，但可能预示着新一轮的斗争和中国历史轨迹的另一个转折点。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危机过程中，社会不平等再次加剧，农民工不得不应对工资拖欠、减薪、失业和贫困。这是否会引发来自下层的新的和持久的社会动荡，还有待观察。以习近平的核心圈子为中央的严密控制和专制统

治，使政权更加缺乏灵活性。它是否还能用镇压、让步和拉拢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动荡？严厉的威权主义使拉拢更加困难，而经济放缓和危机可能意味着经济让步的空间不大。然而，单靠镇压很少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激起社会动荡。

结语

通过使用叙事矩阵展现中国历史的各时期和子时期以描述过去七十年来中共的统治，本书追溯了社会动荡和政府对动荡的应对这一反复出现的特定历史模式，并特别关注了阶级与性别关系。

结论的第一部分在回顾导论中讨论的左翼对中国历史的矛盾立场之前，对叙事矩阵和历史模式这两个概念进行了重述。第二部分评估了两个使得自下而上的系统性变革得以可能的因素——中共政权如今正遭遇的多重危机和由全球系统性不稳定创造的历史性窗口。第三部分讨论了一些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及左翼可以从中吸取的政治教训。在最后一部分，提供了一些关于（在中国或其它地区）参与或支持社会斗争的各种形式的建议。

重述：对概念的重新审视

本书导论中描述了几种对待194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的左翼立场，随后提出了问题和假设，并选择了要追寻的特定视角。这一研究揭示了四个时期和若干子时期的特定历史模式，本书通过叙事矩阵展现了这些时期和子时期的顺序，并作为其余章节的基本结构。本部分按相反的顺序重新审视了叙事矩阵、诸历史模式和关于中国历史的左翼立场，并强调了本研究的优点和局限，以批判性地反思左派能从本书中获得哪些有助于未来的研究和行动的东西。

叙事矩阵

本书中使用的矩阵是一个叙事工具，它展现了自1949年来中国历史中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冲突的连续的各时期（见表3）。它展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以及过渡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态。第一列列出了渐进变化的基本连续性：中共的统治、威权政府和压迫、剥削性剩余的提取、劳工分层和社会排斥、城乡对立、移民制度，以及父权秩序和性别压迫。第二列展示了各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时期——它们由社会和政治动态的重大断裂定义。第三列和第四列描述和说明了作为动乱或管控和改革的具体实例的各子时期。

| 渐进变化的连续性 | 断裂-时期 | 模式/周期=动乱-遏制/改革 | 描述 |
|----------|-----------------|----------------|--------------------|
| +威权国家 | 中国共产党统治 过渡时期 | 1949–1956 建设 | 新的阶级分化、毛主义父权制和军管国家 |
| | 社会主义 | 1956–1957 中断 | 罢工和公开批评 |
| | | 1958–1965 加速 | 大跃进和四清 |
| | | 1966–1967 造反 | 文化大革命和激进批判 |
| | | 1968–1976 修复 | 军事管制和派系斗争 |

| | | | |
|----------------------|------|--------------|----------------|
| +剩余榨取 +劳动等级制度 | 过渡时期 | 1974–1980 不满 | 社会斗争和民主运动 |
| | | 1976–1989 改革 | 转轨与危机 |
| | | 1986–1989 抗议 | 天安门广场运动 |
| | | 1989–1999 恢复 | 镇压、改组和经济崛起 |
| +城乡划分 | 资本主义 | 1993–2005 动乱 | 农民反抗和国企工人抗争 |
| | | 2000–2010 巩固 | 和谐社会、繁荣与危机 |
| +移民制度 | | 2003–2012 罢工 | 农民工反抗和廉价劳动力的终结 |
| +父权制 | | 2012–2020 扩张 | 新常态和向外跃进 |

表3：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七十年的叙述矩阵

这个矩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动乱和政府对策的动态，但是它也有其局限。例如，（表格中自上而下对）连续的各时期的分类暗示了一种线性而清晰的历史方向，但是这是一种错觉。尤其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长期过渡不仅不是渐进和间歇的，反而是充满矛盾的。各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时期）内两个子时期的顺序描述

了历史在社会动荡和管控与改革间摇摆⁴⁰⁵。然而，这些子时期有许多是重叠的，因为来自底层的动乱往往是活跃和不稳定的，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发展和发展，而来自上层的管制措施和改革也是交错和持久的。这些轨迹不是一条清晰而笔直的发展的线，而是一条虚线和波浪线。

本书的研究既不涉及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中国历史，也不提供任何关于2020年之后事物发展的预测。纳入更早的时期——比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帝国主义和民国时期以及中共的崛起——可以揭示这些时期是否也表现出动乱和管制或改革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同样，讨论如今我们是否在进入——或是否已经进入——另一个转折期或甚至后资本主义时期的问题也十分有趣。如果它像之前的主要时期一样始于一波底层的动乱，那么2019年香港的暴动和中国持续的社会不满可能是这样一波新浪潮的前兆。这种动乱之后会出现新的管制吗？还是会升级并超越动乱和管制之间的波动模式，打破这里使用的矩阵的形式？我们还需要观察。

历史模式

如果我们想利用过去中国的经验，为将来推翻资本主义并创造一个非常不同和更好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做准备，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历史模式：阶级斗争、不同阵线上（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社会动乱的具体形式，以及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对策。来自底层的不断的社会动乱浪潮的根源产生自未兑现的承诺、集体化的影响、工作压力和剥削、干部的肆意妄为和腐败、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的愤怒、不平和不

⁴⁰⁵ 尽管是短期的，但这种动态类似于Karl Polanyi的“钟摆”（pendulum），在管控的阶段和放松管制或释放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阶段之间来回摆动（也被描述为“嵌入”和“脱嵌”）；见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这本书从底层视角描述了这种钟摆模式。它在社会不满与斗争的阶段和统治阶级应对和改革的阶段之间来回摇摆。

满。抗议者的批评和要求包括平等、尊严、民主、自由和物质改善。不同的角色参与了各种斗争：工人、移民、农民、学生和女性^{*}。社会动乱的形式在单个事件和更大的周期或浪潮之间变化，并且它们方式各不相同，如罢工、公开批评、地下文学、示威和暴力反抗。同样重要的（但不是本书重点的）是更隐蔽的社会抵抗形式，即所谓“弱者的武器”⁴⁰⁶。

第2–4章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标题代表了在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斗争形式的变化：破坏、叛乱、不满、起义、抵抗和罢工。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例子，它们由上层释放并得到（部分）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同时仍在政治上挑战政府。由于底层超出预期的不满和批评，这些叛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控制。作为中共主要政治指导思想的毛主义的政治特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不同，中共通过频繁动员群众来实现经济或政治目标。这些动员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或中共领导层中的走资派的批判，因此，社会动乱和群众抗议有可能激化并转向反对政权，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

过渡时期的动乱，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都是对政权的重大政治挑战。尽管这些运动起初是从下层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得到了领导层中一些特殊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认为有可能为自己的派系和改革目的而利用这些运动。

资本主义时期的动乱，如国企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以及农民工的罢工，都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前者主要是为维护社会主义“铁饭碗”和农村居民的某些保障而进行的防御性斗争，后者则是为农民工的物质改善、获

⁴⁰⁶ 见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得认可和尊严而进行的攻击性斗争。与早期的动乱不同，它们都只限于社会经济层面，没有成为对中央政权的严重政治威胁。其原因是大部分经济的商品化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它们争夺劳动力和市场——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分离。社会斗争的目标主要是经济（私人和国家控制的）资本家，以及地方党政官员，而不是中共中央国家领导人。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因为目前的中共政权已经加强了党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重新集中了决策权（和责任），从而使中共中央政权的灵活性降低，更容易受到来自下层的批评和颠覆。

第2-4章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标题代表了中共领导层在各时期为处理动乱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管制或改革形式：加速、复辟、改革、恢复、巩固和扩张。这些对策在程度、持续时间以及镇压、妥协和拉拢的组合上各不相同，以管制、引导或镇压动乱。镇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污名化、排斥、“再教育”、下放农村和监禁。更广泛的努力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后国家对造反派的攻击，以及1989年对天安门广场运动的镇压。在后两个案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受到了挑战，以至于它不得不通过调用军队来镇压这些运动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有时，中共政权会做出部分让步，试图将不满情绪引入官方机制，以平息动乱。这种部分让步的例子有：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为国有企业工人提供的失业救济金和就业计划，以及21世纪00年代中期农民工的斗争浪潮开始后为他们增加工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中共政权有时会对那些愿意改变立场的要求和行为者进行收编——这是一种削弱不满情绪和利用民众要求的方式，并实际上使整个体制更加稳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领袖纳入中共领导层，以及后来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领导层采纳了70年代末民主墙运动中提出的改革要求。

在努力管控之后经常会伴随来自上层的改革，为避免进一步的不满，政府更大努力消除其社会或政治根源并稳定经济和政治结构。例如，动员工人和农民进行大跃进（GLF）以及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期间改变经济结构。根据管控的形式和结果、经济发展和危机的阶段以及全球各因素，改革具有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进攻性或防御性——特点，这也反映在各子时期的名称中。在国内，特定的新阶级构成、领导层冲突和技术变革对于确定某个子时期的改革形式至关重要。

在世界范围内，诸如全球经济危机、冷战、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变化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反抗和起义浪潮等动态因素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左翼的立场

正如导言第一部分所描述的，确定具体的历史模式和制定结构本书的叙述矩阵，是由特定左翼对待中国历史进程的观点或立场的明显差异所推动的（见表2）。第一种立场认为中国自1949年至今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掩盖了过去几十年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包括工人和农民为反对统治者、剥削、性别歧视等的斗争的构成和形式的反复变化。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常常错误地把国家所有制、福利和一党集中执政理解为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受到了全球其他左翼的正确质疑。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甚至在90年代中期国家部门重组之后，将中国定性为仍然是社会主义，确实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具有界定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很明显：控制或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与不控制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剩余的提取和剥削，由国家和私人参与者组成的重组统治阶级对利润的分配，以及在经济中扩大使用（管理）市场机制。

| 立场 | 1949-1978 | | 1978至今 | |
|----------|-----------|------|--------|------|
| 第一种：一种制度 | | | 社会主义 | |
| 第二种：一种制度 | | | 资本主义 | |
| 第三种：两种制度 | 社会主义 | | 资本主义 | |
| 第四种：两种制度 | 过渡时期 | 社会主义 | 过渡时期 | 资本主义 |

表2：左翼对1949年至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看法

第二种立场将中国过去七十年全部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它只用一个术语或描述来描述一个假定的单一和持续的时期，从而掩盖真正的变化。实际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确实有共同的关键特征，如剩余的提取和积累，自上而下的劳动组织，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然而，出于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批判，我们需要认识到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即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计划机构的存在和劳动力及其他资源的计划分配，以及中共和国家机关的具体作用，它在工人、农民、移民和女性*与中共政权之间创造了特殊的社会关系。无须讳言，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阶级社会相去甚远，任何新的革命尝试都必须从这种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第三种立场将中国改革前的制度（1978年之前）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并承认随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8年之后）。这一立场的一些

左翼支持者（包括许多毛主义者）用积极的措辞描述了中国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人（包括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则认为它是一种“堕落的”社会主义形式。本书总体上同意这第三种立场，但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批判，并制定了一个变体，或者说第四种立场。这一立场强调了50年代初（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和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时期之前）的两个过渡阶段。追踪这些时期的轨迹，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是如何在没有颠覆中共统治的情况下逐渐改变的。中共领导层在调整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并将其主要力量的组成，由基本上是农民军队转变为社会主义官僚统治阶级，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十分灵活。

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理想的革命过渡制度（引导至共产主义），而是产生了一个阶级社会，它结合了资本主义也存在的元素，通过中共控制下的计划经济对国家进行发展（或现代化）。左翼立场的拥护者对发生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年代的毛主义者都声称中共领导层中所谓走资派是转变的幕后主使。这一立场暗示存在一个据称从60年代中期或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总体转型计划。没有证据表明有这样一个总体计划，而且将转型主要归咎于变质的中共领导人，忽视了国内和世界的结构性因素。这条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道路，最初可能是导向共产主义，但最后却成为了一条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弯路。这种转变不是计划的，但不是完全偶然的。相反，这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共政权的结构特征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动态的结果，它们使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成为合理和可能的（尽管不是不可避免）。

评估：历史机遇

下一节将探讨社会运动和左派的战略，以帮助避免过去的错误，并激发一个推翻资本主义的进程。在这之前，本节讨论了当前的条件是否真的可以给这种变化带来希望。第一部分讨论了有可能进一步破坏中共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危机。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当前全球系统性不稳定所创造的历史窗口，它为中国和其他国家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进行变革提供了机会。

中国的危机

中共领导层经常强调要保护政权的稳定性，消除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威胁。然而，从左翼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政权的不稳定为变革提供了可能性，只要有社会力量能够利用这种不稳定并推动实际的改善。以下是对一些因素和事态发展的简短总结，这些因素和事态发展表明，中共政权实际上并不像党的领导层希望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稳定。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劳动力短缺和工人斗争的威胁，这些斗争赢得了工资的增长，并在21世纪00年代后半期破坏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模式。政府试图升级和重新平衡经济（生产更高价值的商品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两项措施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在持续下降⁴⁰⁷。结构性失衡持续存在，特别是主要依赖

⁴⁰⁷ Li Minq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79; Martin Wolf, “The Future Might Not Belong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ae94de0e-0c1a-11e9-a3aa-118c761d2745>.

国家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以及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的问题。自从2008年之后，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总体债务已经大大增加。⁴⁰⁸

第二，面对国内经济挑战，政府试图提高其海外经济能力，例如，通过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另一种“空间修复”。此经济成果喜忧参半；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完成，而其他项目则暂停或失败。虽然“一带一路”协议下必须与债务国重新谈判，但中国政府已经限制向其他国家的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贷款⁴⁰⁹。2018年以来年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旧霸主与新挑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竞争加剧的征兆，它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2020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导致了另一场经济危机，并且再次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这只是加剧了结构性经济问题。有几个因素可能会进一步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负债、破产、失业、工资停滞或下降：中美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其他国家政权为争夺利润和资源带来的阻力，全球经济的潜在的（部分）解体（分离），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去全球化或重新配置。

第三，对中国“廉价”劳动力模式的威胁也来自另一个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供应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来到城市和工业地区，在工厂、建筑工地和低工资的服务岗位上工作。自21世纪00年代以来，尽管放松了移民控制并结束了独生

⁴⁰⁸ Gabriel Wildau, “China Struggling to Quit Its Debt Addi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5,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93a95d0-2ee9-1e9-80d2-7b637a9e1ba1>; “National Debt in Relation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4,” statista.com,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3ogorm4>.

⁴⁰⁹ James Kynge and Jonathan Wheatley, “China Pulls Back from the World: Rethinking Xi’s ‘Project of the Century,’ ”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1, 2020, accessed December 12,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9bd8059-d05c-4e6f-968b-1672241ec1f6>.

子女政策，但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已逐渐枯竭。近年来，女性*从客观情况来看，一直在进行一种“生育罢工”，拒绝抚养一个以上的孩子，无视中共领导人对女性*履行其“爱国责任”、为“国家”生育更多孩子的呼吁。⁴¹⁰中共领导层是否会成功地推高出生率，我们将拭目以待。目前，其反女权主义（和反LGBTIQ+）的姿态和保守的家庭政策使得未来可能出现更多来自女性*的阻力。

第四，在政治方面，2012年上台的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共现政权试图通过各种改革巩固国家和党的机关，加强党对机关、企业和公共生活的控制。目前，中共领导层的冲突似乎得到了缓解，因为围绕习的派系已经能够控制住其他派系。其中一项措施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该运动已导致数百万公务员被惩处——而行政失误和腐败仍然普遍存在。党内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满情绪使得领导层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内讧，尤其是在习的派系无法阻止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⁴¹¹

第五，习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倾向于把镇压作为维持控制的手段。它加强了审查制度，并将公开的异议和不满定为犯罪，还经常抓捕网上活动家和记者。公共场所和互联网上的控制技术，以及“社会信用体系”，都是为了追踪和惩罚异常行为。新疆是中共领导的镇压手段的实验室，它包括大规模监控和拘留，主要针对该省的维吾尔族人口。其中一些手段被逐渐用于其他省份和香港。⁴¹²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务实的威权主义”的终

⁴¹⁰ Ralf Ruckus, “Birth Strike against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nqch.org, March 29,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20/03/29/birth-strike-against-chinas-population-policies>.

⁴¹¹ 香港的动乱引发了关于领导层冲突的传言以及对习近平在2019年处理香港危机的批评。详见Tom Mitchell, Wong Sue-Lin, and Nicolle Liu, “How Hong Kong Defied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 June 19,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0aa598a-90f2-11e9-b7ea-60e35ef678d2>

⁴¹² 新疆的镇压对象和形式也证明了中共领导层的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

结，而前几届中共政权为控制不满情绪和维护稳定所做的努力正是这种威权主义的特征。至少可以说，中共政权在遏制动乱方面的灵活性——即通过运用不同的领导形式和适当地结合镇压、让步和收编来调整其战略的能力——受到了阻碍。

第六，加强镇压也有可能导致广泛失去支持和愤怒。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行动者的社会斗争一直在继续。移民劳工经常罢工，尽管不像21世纪00年代末和10年代初那样频繁和明显。他们在新冠疫情和最近的危机中受害最深，特别是在工资损失和裁员方面。然而，他们继续要求从他们生产的财富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并获得了组织和斗争的经验。同时，农民虽然人数减少，但继续生活在比大多数城市人更困难的条件下。圈地、不断增长的农业综合企业、土地盗窃、腐败和污染可能会导致新的农民反抗，在地方层面上反对中共政权。总的来说，中国过去几年较低的增长率和2020年全球危机的影响——包括破产、失业和拖欠工资——可能会导致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和社会冲突的再次爆发，特别是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如果中共领导层不能进一步改善社会状况，如果国内或世界危机破坏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那么这个政权可能会面临艰难的时刻。

第七，由于制造业、建筑业和能源生产的扩张，快速的城市化，机动车交通的大量增加，以及缺乏有效的环境法规和管控，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以及与工业化耕作和肉类生产有关的疫情和疾病的传播。中共政权认识到了这些危害，尤其是作为中共支持的主要支柱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也面临着更多的健康和生活质

量方面的困难。然而，尽管它一直在谈论“绿色发展”，但它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⁴¹³

所有这些因素和发展结合起来，对中共领导层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预测是困难的。可能的情况是：政权可能在当前的危机和冲突中得到加强，或多或少地维持中共的统治现状，或者在经济、空间分割（国家的“巴尔干化”）和领导层冲突中被削弱并最终崩溃。在后一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可能会被更糟糕的东西所取代，或者，如果对工人、农民、移民和女性*来说一切顺利，这个政权可能会由于社会起义和来自下层的压力而最终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机会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更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和关系。⁴¹⁴

不稳定的窗口

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被废除。它是一个复杂的，尽管是不对称的世界体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左派来说，不仅要关注国内事务，还要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状况和发展。在最近，这个体系是不稳定和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霸权下的系统稳定和发展的时期，如英国或美国，会由于即将来临的力量竞相取代霸权，而被系统性不稳定和危机的时期所替代。⁴¹⁵在最近的不稳定时期，与

⁴¹³ 见Chiara Piovani, “The ‘Greening’ of China: Progress, Limi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7, no. 1 (2017): 93 – 115; Richard Smith, *China’s Engine of Environmental Collapse* (London: Pluto Press, 2020)

⁴¹⁴ 对于中国在21世纪20年代初因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可能崩溃的情况。见Li Minq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关于对这类主张的一种批评，参见 Ralf Ruckus, “Chi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Part 2: Li Minqi on the Forthcoming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Sozial.Geschichte Online* 19 (2016): 115 – 4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5yjz351>

⁴¹⁵ 例如，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系统的稳定时期相比，底层的运动有更好的机会来产生或实施变革。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即将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工人阶级能够利用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造成的系统不稳定来赢得美国资本和国家的重大让步。英国的霸权最终随着二战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和苏联领导下的“东方”之间的对峙。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冷战时期，全球社会（和部分革命性的）斗争——从全球北方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到全球南方的罢工、起义和反殖民斗争——迫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权做出实质性的经济让步，并扩大福利计划，许多国家的这些计划与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凯恩斯主义模式相似。这些政权还试图收编这些运动和斗争的领导人，以消除来自底层的动乱。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上的让步和对领导人的收编是与镇压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统治继续构成威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相辅相成的。⁴¹⁶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不同时期，似乎围绕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统一的欧洲（后来的欧盟）或日本将与美国竞争全球霸权。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成为全球生产的经济节点（“世界工厂”），甚至获得了与美国竞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地位，这在21世纪00年代末和10年代初的危机期间和之后是显而易见的。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金融衰退，随后是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各地的社会斗争浪潮。当时，中国自身的社会冲突揭示了其阶级关系的转变，农民工罢工对“廉价”劳动力出口经济构成的风险，以及中国农民工阶级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在整个21世纪10年代，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始终是动荡的。围绕新冠疫情而爆发的多方面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和中国政

⁴¹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断裂与中国的重大断裂相吻合。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全球社会动荡的同时，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中国并引发了转型进程。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集团在民众运动的压力下崩溃，与天安门运动、1989年的镇压以及随后在90年代中期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同期发生。

权之间的对抗。⁴¹⁷我们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另一个历史分水岭，一个可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霸权的建立相媲美的分水岭，或者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和东方集团的消亡相比较的分水岭。

虽然早期的全球霸权竞争以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告终，但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可能不会由一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如美国）或一个竞争者（如中国）所主导。相反，新的世界秩序有可能是多极化的，围绕着老牌美国霸主、欧盟、中国和印度的联盟之间展开竞争。⁴¹⁸此外，它可能会反复出现经济危机、环境灾难、资源争夺、难民和其他移民的大规模流动、社会叛乱、威权主义反制措施，包括加强监控和镇压、民族主义或右翼运动、仇外心理以及军事冲突。这种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⁴¹⁹

从左翼的角度来看，决定性的问题是新的世界（混乱的）秩序是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的和破坏性的。这将取决于来自底层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发展，它们的力量，它们的方向，以及它们跨越边界的能力。在2019年年中和年末，全球发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斗争——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不同地区（包括香港）。⁴²⁰新冠疫情打断了这一轮斗争，

⁴¹⁷ Alan Crawford, “A New World Order for the Coronavirus Era Is Emerging,” Bloomberg, July 10,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4qpa87o>.

⁴¹⁸ Jörg Lau, “Donald gegen den Drachen,” Zeit Online, May 19,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6b6rdlk>.

⁴¹⁹ Li Minqi 预测了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21世纪20年代的崩溃，见Li Minq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Ruckus, “Chi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Part 2.”

⁴²⁰ Jack Shenker, “This Wave of Global Protest Is Being Led by the Children of the Financial Crash,” Guardian, October 29,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y76gfw8>; Anna Jikhareva, “Die Kinder der Krise,” WOZ, November 14, 2019,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woz.ch/1946/protestbewegungen/die-kinder-der-krise>; Joseph Choonara, “A New Cycle of Revol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165, December 2019,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isj.org.uk/a-new-cycle-of-revolt>; Noah S

但这只是为2020年初夏的进一步爆发做准备。美国针对结构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黑命攸关”运动引发了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动员，这些运动也响应了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冲突。⁴²¹虽然由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不满情绪，但最近的任何运动都没有一个真正联合起来以创造团结的全球阶级运动的明显趋势。⁴²²中国和全球的系统性不稳定、新的社会反抗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治理的合法性的动摇，为根本性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然而，社会斗争缺乏凝聚力和跨国界赋权，这对关注结束资本主义剥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形式压迫的运动和全球左翼构成了最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左派都需要处理他们的过去。左派的宏大叙事——社会民主和马列主义（包括毛主义）——都已经失败，并在最近几十年里导致了历史的僵局。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左派可以从社会主义运动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利用这些教训找到推翻现行制度的替代战略。

影响：对左派的教训

本节论证了一种对左翼政治的分析和组织调整。第一部分简要地重新评估了导致中共社会主义失败的因素，强调了社会运动在任何有意义的变革中的核心地位，并描述了左翼在这种变革中可能的催化剂作用。第二部分呼吁放弃二十世纪的两个左派宏大叙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

mith, “Global Youth Protests at Risk of Spreading to China,” Bloomberg, January 5,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5ammmd3d>.

⁴²¹ Nouriel Roubini, “The Main Street Manifesto,” Project Syndicate, June 24,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4zgbbtv>.

⁴²² 这并不是说斗争没有联系、交流、传播或产生模仿者。这里的重点是，他们没有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一致的动员，以发展成为全球阶级运动。

主义，它们都已经失败了。第三部分讨论了另一种左翼社会斗争和历史变革方法的要素。它考虑了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中得到的各种教训，并将其与其他地方最近的社会运动的经验相结合。第四部分提出了左翼行动者可以采用的具体策略，以支持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斗争和组织活动。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既然中共政权并不像它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稳定，而目前全球的不稳定为来自下层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改造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机会，这对左派及其推动这种变革的战略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过渡时期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统治轨迹提供了重要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剥削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并没有打破以前制度的核心部分。它重新配置而没有废除各种形式的排斥、歧视和暴力，并建立了一个针对社会斗争和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复制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其干部构成了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核心。因此，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怀旧”是不恰当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期是过渡时期，此后的时期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共政权声称中国如今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无产阶级运动和反抗国内剥削和镇压的左翼活动家的嘲弄。

虽然左派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但重要的是明白有组织的政治左派本身并不是产生有意义变革的主要力量。纵观全球资本主义和左翼组织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来自底层的强大压力，期待任何实质性的物质改善或根本变革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运动和他们的权力不是“最佳”左翼组织或“领导”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结果。在中国，这些因素有时会产生大规模

和剧烈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有其包括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局限，并无法有效地应对来自上层的管制措施或收编、让步和压制。没有任何运动或更广泛的左翼动员带来了超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框架的深刻而持久的变革。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左派可以在运动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支持他们的进步要素，并帮助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取得成功。如果左派想要在克服资本主义中发挥这种催化剂作用，它需要探索革命过程的实践和机会——革命，不是政变和从上层夺取政治权力，而是摧毁资本主义、父权和其他压迫性的关系、结构和实践，建立新的生产、再生产、管理和社会性形式。

左派宏大叙事的失败

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毛泽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社会斗争和政治组织中产生的主要左派思潮。在政治战略和目标方面这些潮流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两个潮流中的组织都是等级森严的、发达的政党和工会贵族，并且在上台后都调整了他们原本比较激进甚至是颠覆性的策略——而且都没有像以前承诺的那样推翻资本主义。资本家势力以及希望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右翼和自由派政治团体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左派想要避免在未来犯同样的战略错误，那么他们需要分析的也是这两种思潮的调整过程和矛盾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主要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在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实施，这些国家试图发起追赶式发展，并通常采取“发展专政”的形式。在中国，中共的社会主义也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概念之上，根据这一概念，社会主义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结构被摧毁和取代，并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然而，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版本却遗漏、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过

程可能（而且已经）被冲突或失败所阻止和逆转了。事实上，中国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僵局——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的结果。中共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由工人和农民控制的体制和社会。最初的革命承诺——即摧毁资本主义阶级制度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并以基于集体主义和平等的制度取而代之——并没有实现。相反，一个基于经济剥削、国家镇压、父权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新阶级统治被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虽然毛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与毛泽东主义的变化相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核心特点——特定形式的阶级统治、威权国家和父权制。与中国不同的是，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衰落了，而共产党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这种消亡导致了新的阶级统治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因为旧的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往往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阶级的基础），并使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是20世纪另一个主要的左派宏大叙事，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所推动。在这些国家，统治阶级有能力与一部分人分享所生产的财富，并给予民主参与权，而不会有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社会民主主义在历史上的实践结局看起来也不太好，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已经被成功地被许多国家——例如欧洲——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收编。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管理、福利改革和自由代议制民主都未能克服资本主义剥削。相反，它们加强了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统治和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结构和机制，并帮助控制或收编社会运动和抵抗，镇压它们背后的激进政治力量。

根据社会民主的说法，在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加，应该导致政治改革和建立社会代表的民主机构。西欧大部分地区是这样，最近韩国和巴西等国也是这样。中国境内外的民主力量都希望有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21世纪80年代官方改革开始时、在90年代改革重新启动时、以及在21世纪00年代中国加入WTO时。有时，甚至部分中共领导似乎也在玩弄民主化的想法。然而，中国并没有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在现阶段看来，未来也不可能。即使发生了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结果也不会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而最多是达到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包括美国和欧盟）统治阶级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圈子所主张的一种绿色资本主义。

总之，毛主义和其他形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都未能战胜资本主义。全球左派需要找到替代战略以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增进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势力的力量。

左翼政治的主要方面

上面已经总结了让中国社会主义项目失败的结构和动力：压制性的国家形式、剥削的延续、性别分工、对移民的歧视、等级制度和威权组织、民族主义等等。在讨论避免这些缺点的不同方法时，需要讨论涵盖经济、生态、政治、包容/排斥、组织和斗争的广泛问题。以下是一个简短的清单，列出了左派政治的核心内容——试图避免过去的陷阱，同时坚持以克服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为目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发展抽象的思想，而是要抓住那些在最近的运动中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开和发展的趋势。

废除资本主义

为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新尝试的目标既不应该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形式，也不应该是驯化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而是最终废除剥削和国家压迫，即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积累和占有、资本主义技术、劳动和社会的等级组织，以及所有形式的排斥和歧视。在21世纪00年代末和10年代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许多动乱、罢工和广场占领中，剥削、专制的国家统治、腐败、排斥和镇压被视为攻击目标。它们是全球群众斗争的新时代的一部分，始于21世纪初，最近在2019年（如智利、黎巴嫩、伊拉克、法国和香港）和2020年（如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黑命攸关”运动和波兰反对反堕胎法的女性*运动）继续爆发。这些运动中有许多表现出高度的自我组织，有些甚至实际上是“无领导”的，但大多数仍然被改良主义思想所主导，或者没有与社会民主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决裂。

确保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遵循不同形式的生产主义，旨在实现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浪费。今天，经济需要重新配置，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避免生态危机和灾难。这不可能通过绿色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资本主义使用所谓的生态友好技术（如目前用于电动汽车或太阳能发电的技术）来继续走资本主义增长的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东方和西方的生态运动一直强调容易发生灾难的生产主义。最近，反对气候变化的动员要求结束对环境的破坏。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态运动经常被安抚和收编。“绿色”政党和政策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和技术改革方面发挥了类似于社会民主党派和政策在二十世纪所做的作用。因此，目前的动员是否能够发展和维持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议程，还有待观察。

超越国家权力

两种左派的宏大叙事都认为，只有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控制资本主义，然后废除资本主义，但是左派政府反而加强或建立了或多或少的专制和镇压性国家政权。这些都起到了稳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结构和确保统治阶级地位的作用。为了废除或取代专制和压迫性国家，需要在集体、平等和反专制的行政和决策形式的基础上建立替代结构。这些替代性的行政结构必须处理反革命力量和反工人阶级、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行为者或运动。历史经验表明，处理这些问题的专制社会主义形式导致了新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新的革命尝试需要制定其他战略来回击旧的阶级秩序的捍卫者，同时避免发展新的阶级秩序。左翼活动和社会运动经常不信任和批评左派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成之后、在50年代中期匈牙利和波兰的镇压之后、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地方的1968年运动期间，以及在全球南方的后殖民国家的左派政权巩固之后。然而，夺取国家政权仍然是许多左派倡议、动员和政党的关键目标和战略。

超越西方民主制度

在批评或对抗专制政权（无论是否社会主义）时，左翼势力经常将西方或代议制民主作为更好的选择。主要在北方国家盛行的西方民主，是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形式——尽管赋予那些拥有公民权利的人以公民自由。寻求克服资本主义的运动需要为增进全球南方和北方底层社会行动者的力量而斗争，也需要为建立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斗争，使人们能够集体控制自己的生活。自二十世纪初代议制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统

治的重要政治形式以来，它的局限性就一直受到批评。⁴²³例如，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团体、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基层运动，以及21世纪10年代初的直接民主形式的广场运动的批评。特别是当运动面临独裁政权时，代议制民主似乎是更好的选择或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在现实中，它为有限数量的人（主要在北方国家）提供了有限的参与权利，同时加强并合法化了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威权政权之下。

破坏国家边界

在建立社会主义国际（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和使用国际主义言论时，左派的宏大叙事都是基于国家公民、国家发展以及既定国家边界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民族主义概念。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全球概念，它能跨越并最终摧毁划分社会抵抗和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国界。建立跨国界团结的尝试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反殖民辩论和斗争，并形成了21世纪00年代的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21世纪10年代初的叛乱。尽管如此，许多左翼辩论、动员和组织继续关注民族国家，甚至推动某种左翼民族主义。

反对种族主义排斥行为

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家公民身份以及种族、文化和阶级差异，建立了歧视性的移民制度，即孤立、排斥或压迫农村移民或移民、剥夺他们的资源、剥削他们、惩罚他们、引渡他们的政策和做法。来自底层的运动还依靠种族主义，根据种族、文化、宗教和公民身份将他人排除在某些权利或福利之外。移民——

⁴²³ 同样有问题的是关于人权的论述，至少只要社会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剥削仍然被排除在论述之外时是有问题的。

无论是被暴力强迫移民，还是出于贫困或其他因素——长期以来在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自19世纪末的美国和自20世纪末的中国。有色人种一直站在反对歧视和争取包容的斗争的最前沿，比如最近作为“黑命攸关”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有反种族主义斗争和压力，种族主义仍然在今天毒害许多左翼社会动员。

废除性别歧视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权，都没有结束父权制压迫。自19世纪以来，这些政权只是在女性*和LGBTIQ+斗争的压力下做出了部分让步。同时，他们以满足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方式，调整和重构了父权制的结构和做法。因此，女性*被（暂时）赋予了有偿劳动权利，主要是作为可剥削的、不稳定的、低工资的工人，同时通过无偿劳动来保证社会的再生产需要。任何未来的社会都必须重新组织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和分配，完全废除性别歧视和压迫。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女性*运动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推动了性别关系的改变。然而，女权主义革命远未结束，许多社会运动和左翼倡议仍在复制性别分工和父权制和异性恋秩序的其他要素。

消灭等级结构

过去和现在的左翼组织——如工会、政党和非政府组织——都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复制了老板/工人或老师/学生的结构，有时还存在种族主义和/或性别歧视的分裂。这种专制的做法往往与另一种等级形式相吻合，即所谓受过教育的、专业的、开明的组织代表和所谓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业余的、无知的目标群体或受众。领导权、特权和收入不平等都通过政治目的或组织需要而正当化。自19世纪以来，左翼组织的普通成员一直在争取平等参与和决策，反对专制和腐败的领导人。最近，教育和通

讯技术的改善，以及集体、合作和交流的经验积累，使基层行动日益超越中央集权和等级结构——在生态运动、自发罢工、女性^{*}运动和反种族主义动员中。尽管如此，左翼等级组织和领袖神话的观念仍然在社会运动中被自下而上地推广，尤其是那些自己想成为领导者的人。

防止收编

来自不同派别的左翼行动者长期以来一直为物质改善、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和性别压迫而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沉默（通过镇压）、选择放弃（在认输后），或者加入了另一方（通过投降或被收编）。收编通过胁迫、贿赂或引诱积极分子或领导人改变立场，利用他们的经验来调整政权结构和实践，避免进一步的抵抗和不稳定，从而破坏运动的运作⁴²⁴。社会运动需要一种策略来限制或防止拉拢收编，例如，通过建立基层决策和控制的集体形式，并使那些可能被收编的人远离运动和组织的核心职能。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运动中，人们都试图阻止收编，但它仍然是统治阶级镇压社会动乱的重要工具⁴²⁵。

总而言之，左翼政治的这些核心政治和战略方面，与寻求改革资本主义、试图渗透到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中去从内部改变它们、或试图通过高层政变夺取国家权力的左翼潮流相矛盾。

⁴²⁴ 关于中共政权如何利用不同形式的正式胁迫和非正式或隐藏的政治控制机制，例如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收编地方领导人”或“渗透”，见Daniel C. Mattingly, *The Art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就社会运动和活动家的动态及其被吸纳和安抚的情况进行更广泛的辩论，可以参考 Franci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Michael Bruch, Wolfram Schaffar, and Peter Scheiffele, eds., *Organisation und Kritik*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1).

⁴²⁵ 当两种左派宏大叙事和思潮的主角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阶级所吸收时，他们的上层、中层或受过教育阶级的背景往往使他们能够（重新）融入自己的出身阶级，并在政治或经济组织中选择职业。他们在左翼运动或社会运动中担任活动家或领导人的经历往往有助于他们融入社会。

左翼战略的要素

上述左翼政治的关键方面如何转化为地方和全球变革的实际战略?有两种形式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政治史上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痕迹:从无产者和其他被压迫者的角度分析阶级(再)组成的过程;以及采取从底层组织的形式,打破无产者、活动家和所谓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下面几段指出了左翼战略的几个核心要素,以供分析和组织。一些读者可能已经将其中的一些要素纳入了自己的政治策略;另一些人则可以将其作为新尝试的灵感。其中特别强调了对中国境内运动的声援和支持。⁴²⁶

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废除资本主义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废除它。在继续参与地方或区域斗争的同时,中国以外的左翼活动家应该把中国的社会冲突作为他们的观点和分析的一部分,特别是阅读工人的经验、女性*的斗争和移民的抵抗。中国国内的人应该从其他区域寻找灵感和支持。

抛弃民族主义的言论

在美国和欧盟,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力量唤起了一种“黄祸”论,以阻止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并推动“他们”国家的国家利益。同时,左派的其他部分则站在中共政权一边,而无视其对中国社会动乱的攻击和

⁴²⁶ 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发展了一个将分析和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有用概念,称为conricerc a。后来它也被用在世界其他地方,见Raniero Panzieri, “Socialist Uses of Workers’ Inquiry” (1965), trans. Arianna Bove, eipcp.net, April 2006,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406/panzieri/en>; Emiliana Armano, Devi Sacchetto, and Steve Wright, “Coresearch and Counter-Research: Romano Alquati’s Itinerary Within and Beyond Italian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Viewpoint Magazine, September 27, 2013,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0, <https://tinyurl.com/y3ldp65f>

建立自己帝国主义体系的企图。这两种支持帝国主义大国的形式，无论是“旧”还是“新”，都在削弱社会运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左翼实践应该与民族主义言论作斗争，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主义为目标。

避免左翼的神秘化

在左派中常见的对过去或当前运动的神秘化和美化，产生了扭曲的斗争、组织和个人的历史形象。误导性的意识形态或宣传，例如关于“伟大领袖”毛泽东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产生了混乱和不信任，使运动在政治上变得脆弱。左派需要公开讨论社会起义和集体抵抗的优势和劣势，即其组织结构的潜力和局限性、他们的分析和定位以及他们的实际力量——不仅仅是关于中国。

没有层级的组织

社会斗争和左翼倡议需要没有等级的集体组织，以避免成员和领导之间的鸿沟，并防止社会运动“领导人”的“出卖”。这种组织形式与传统的、等级分明的工会、政党或非政府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拉拢、整合和平息社会抵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经常削弱社会行动者的自我赋权。

保证基层行动者掌权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通常是工会官僚、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学者和记者等“专业人士”（试图）决定社会斗争的形式和方向。通过克服这种家长主义，左翼组织和斗争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社会行动者的手

中，即工人、女性*、移民、学生和退休者，这些人实际上处于社会冲突的前沿。他们应该在斗争及其报告和分析中代表自己。⁴²⁷

组织团结，增强力量

团结的目的不应该是代表特定的运动或社会行动者，而是促进自我增强力量的进程。⁴²⁸就中国的社会斗争而言，这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活动家之间建立联系；在劳工冲突、女权主义斗争或其他社会冲突中为反抗力量发声；支持那些受到国家起诉和其他形式压迫的人；检查和批评中国或中共在你所在地区机构（例如，公司或大学）的参与和影响；以专门知识、资金、技术、翻译和媒体渠道的形式提供资源。后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运动和倡议面临着威权政权的压制和审查、低工资和其他限制人们组织和行动能力的因素。

这些概念性的想法可以作为左翼组织和干预中国和其他地方社会斗争的指导原则。其目的是发展超越性而非肯定性、集体性而非等级性、有效性而非短暂性的左翼实践。简而言之：“与其为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提供正确的‘左翼’修复工具、润滑仲裁和安抚社会斗争的齿轮、甚至重塑‘工人国家’的神话，左派应该通过打破国家审查制度、传播更多关于（中国）内外斗争的信息、避免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下扮演建设性的角色、锻造破坏性批判的工具，以进一步参与和支持‘阶级构建’的过程。”

⁴²⁷ 这并不是说同情社会运动的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记者和学者不应该支持社会斗争，而是说他们不应该担任领导角色，也不应该决定这些斗争的目标、形式、工具或对象（除非斗争涉及非政府组织、工会、媒体或大学内部的社会冲突），也不应该把他们的参与与专业、职业和商业目标混为一谈。

⁴²⁸ 更多关于社会斗争中对代表的“拜物教”问题，见Friends of Gongchao，“Against the Fetish of Representation: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Beyond the Leftist Grand Narrative,” gongchao.org, April 2013, accessed January 2, 2021, <http://www.gongchao.org/2013/04/05/against-representation>.

程。这种形式的批判必须穿透国家宣传和围绕资本主义剥削的迷雾，揭示出能够打开超越资本主义视角的斗争。”⁴²⁹

⁴²⁹ Friends of Gongchao, “Left Dead-End Street vs. Destructive Critique—China’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ies and How to Respond,” gongchao.org, June 2012, accessed January 13, 2021, <https://www.gongchao.org/2012/06/01/left-dead-end-streetvs-destructive-critique>.

延伸阅读：

以下网站和书籍列表是为想要花更多时间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尤其是底层斗争的读者提供的简明选择。有关更多材料，请参阅“参考文献”，其中包括有关特定问题的大量文章。

精选网站：

<https://www.gongchao.org>
<https://nqch.org>
<https://maps.clb.org.hk>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
<http://chuangcn.org/blog>
<https://lausan.hk>

精选书目：

Andreas, Joel.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2019).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2004).

Friedman, Eli.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2014).

Hao Ren, eds. *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2016).

Hershatter, Gail.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007).

Lee, Ching-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2007).

Lu Ping, ed. *A Moment of Truth: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Unions* (1990).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1999).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2005).

Sheehan, Jacki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1998).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2014).

参考文献：

- Ahlers, Anna L.** *Rur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2014.
- Akamatsu, Kaname.**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 no. 1 (August 1962): 3 – 25.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ide.go.jp/library/English/Publish/Periodicals/De/pdf/62_01_02.pdf.
- Andors, Stephen.** “The Dynamics of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Industry: Initiators, Leader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8, no. 4 (1976): 37 – 46.
- Andreas, Joel.**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Reconfiguring China’s Class Order After the 1949 Revolution.” In *Handbook o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Guo Yingjie, 21 – 43.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 .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Song Lina, and Xia Qingjie.**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nos. 2 – 3 (2002): 252 – 75.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tinyurl.com/yk27jkrt>.
- Armano, Emiliiana, Devi Sacchetto, and Steve Wright.** “Coresearch and Counter- Research: Romano Alquati’s Itinerary Within and Beyond Italian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Viewpoint Magazine*, September 27, 2013.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0. <https://tinyurl.com/y3ldp65f>.
-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 “**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statista. com.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06686/china-monthly-income-of-migrant-workers>.
- Bao Hongwei.**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8.
- Batson, Andrew.** “China’s Security Fears and the Cold War Economy.” Andrew Batson’ s Blog, July 6,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andrewbatson.com/2020/07/06/chinas-security-fears-and-the-cold-war-economy>.
- Baum, Richard.**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 – 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Baum, Richard,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Ch’ 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 – 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 Béja, Jean-Philippe, ed.** *The Impact of China's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London: Routledge, 2011.
- Bello, Walden.** *China: An Imperial Power in the Image of the West?* Bangkok: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2019.
- Benton, Gregor, ed.**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 Benton, Gregor,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ernstein, Thomas P.** "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ited by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197–21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ernstein, Thomas P., and Lu Xiaob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lecher, Marc.** "Peasant Labou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y." *World Development* 11, no. 8 (August 1983): 731–45.
- . "Inequality and Socialism in Rural China: A Conceptual Note." *World Development* 13, no. 1 (1985): 115–121.
- Borchard, Dagmar.** "Auswirkungen der Arbeitsgesetzgebung der 80er Jahre auf die Frauenarbeit." In *Frauenstudien. Beiträge der Berliner China-Tagung 1991*, edited by Cheng Ying, Bettina Gransow, and Mechthild Leutner, 191–212. Munich: Minerva, 1992.
- Bradsher, Henry S.** "China: The Radical Offensive." *Asian Survey* 13, no. 11 (November 1973): 989–1009.
- Brandt, Loren, Hsieh Chang-Tai, and Zhu Xiaodong.**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 638–7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randt, Loren, Ma Debin, and Thomas Rawski.**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Discussion Paper no. 10096, August 2016.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ftp.iza.org/dp10096.pdf>.
- Branigan, Tania.** "For Richer, for Poorer: How China's Laws Put Women Second."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d1cuxn>.
- . "Five Chinese Feminists Held Ove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Plans." *Guardian*, March 12,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dwxyj2>.
- Breslin, Shau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ublic, the Priv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sia Research Centre, Warwick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104, June 2004.
- Brook, Timothy.**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ruch, Michael, Wolfram Schaffar, and Peter Scheiffele, eds.** *Organisation und Kritik*.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1.

Burns, John P. “Chinese Peasant Interest Articulation.” In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David S.G. Goodman, 126 – 51. Cardiff: 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4.

Butollo, Florian.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4.

Butollo, Florian, and Tobias ten Brink. “Challenging the Automization of Disconten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no. 3 (2012): 419 – 40.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mpifg.de/pu/mpifg_ja/CAS_44_2012_tenBrink.pdf.

Byler, Darren. “Spirit Breaking: Uyghur Dispossession, Culture Work and Terror Capitalism in a Chinese Global Ci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8.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0. https://digital.lib.washington.edu/researchworks/bitstream/handle/1773/42946/Byler_washington_0250E_19242.pdf.

Byrd, William A., and Lin Qingsong,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i Yongshun.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Routledge, 2006.

— . “Disrup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Reform Era.”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ited by Kevin J. O’ Brien, 163 – 7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o Desheng. “Xi Urges CPC Members to Maintain Long March Spirit, Rejuvenate Nation.” *China Daily*, August 19, 2019.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8/19/WS5d599bcba310cf3e35566606.html>.

Cao Yaxue. “Chinese Authorities Orchestrate Surprise Raid of Labor NGOs in Guangdong, Arresting Leaders. Who the Activists Are, and Why the Government Is Striking Hard against Their NGOs.” *China Change*, December 10, 20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chinachange.org/2015/12/10/chinese-authorities-orchestrate-surprise-raid-of-labor-ngos-in-guangdong-arresting-leaders>.

— . “Detention of Five Chinese Feminist Activists at the Juncture of Beijing+20—An Interview with Gender Scholar Wang Zheng.” *China Change*, April 11, 2015.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2w2w7sh>.

Carter, Lance. “Auto Industry Strikes in China.” *Insurgent Notes*, October 28, 201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insurgentnotes.com/2010/10/auto-industry-strikes-in-china>.

Chan, Anita. “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Economics of Sex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 no. 2 (1974): 197 – 208.

— .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 .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January 1993): 31 – 61.

Chan, Anita,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5.

Chan King-Chi, Chris.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0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web.warwick.ac.uk/russia/ngpa/Chanthesis.pdf>.

- - - -. “Contesting Class Org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Strike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1978 – 201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83 (Spring 2013): 112 – 36.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tinyurl.com/yjyjces8z>.

Chan King-Chi, Chris, and Elaine Hui Sio-le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China Quarterly* 217 (March 2014) : 221 – 42.

Chang, Gordon.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Arrow Books, 2002.

Chen, Sharon, and Li Dandan. “China Loosens Urban Residency Restrictions to Spur Growth: Xi Jinping’s Overhaul of the Decades-Old Policy Will Drive a Move to Cities in the Country’s Interior.” *Bloomberg*, January 14,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6zws8gs>.

Chen Chih-Jou, Jay. “Growing Social Unrest and Emergent Protest Groups in China.” 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edited by Michael Hsiao Hsin-Huang and Lin Cheng-Yi, 87 – 106.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 - -. “Peasant Protests Over Land Seizure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 no. 6 (October 2020) : 1327 – 47.

Chen Erjin. *China—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4.

Chen Ruoxi.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Chen Ya-Chen. *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Cheng, Joseph Y.S., ed. *The Use of Mao and the Chongqing Model*.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5.

Cheng Chu-Yua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y 1949 – 1962*.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i Hsin. *The Case of the Gang of Four*. Hong Kong: Cosmos Books, 1977.

“China Returns to Old Construction Playbook to Boost Growth.” *Bloomberg*, September 6,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26n6pax>.

“China Sets Target of Average 13 Percent Annual Minimum Wage Rise.” *Reuters*, February 8, 2012.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jobs-idUSTRE8170DY20120208>.

“China’s 2019 FDI Up 5.8%, Outbound Investment Slumps.” *Reuters*, January 2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fdi-idUSKBN1ZK05I>.

“China’s Workers Are Saying Goodbye to Double-Digit Pay Raises.” *Bloomberg*, June 19, 2017.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y9m43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une 27, 1981.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documents/cpc/history/01.htm>.

Choonara, Joseph. “A New Cycle of Revol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165, December 2019.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isj.org.uk/a-new-cycle-of-revolt>.

Connelly, Rachel, Kenneth Roberts, and Zheng Zhenzhen. “The Impact of Circular Migr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6, no. 1 (January 2010): 3 – 41.

Cook, Alexander C.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ial: Mao and the Gang of F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rawford, Alan. “A New World Order for the Coronavirus Era Is Emerging.” *Bloomberg*, July 10,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4qpa87o>.

Dai Jinhua. “Class and Gender.” In *China Reflected*, edited by ARENA, 138 – 51. Hong Kong: 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2003.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our-global-u.org/oguorg/en/?wpfb_dl=325.

Danna, Raffaele. “The Mak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terview with Isabella Weber.” *Pandora Rivista*, June 11,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pandorarivista.it/articoli/china-economic-reforms-isabella-weber>.

Davin, Delia. “Women in Liberated Areas.” In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edited by Marilyn B. Young, 73 – 9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Migration, Women and Gende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edited by Thomas Scharping, 297 – 314.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7.

Day, Alexander F. “Gender an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Labor.” *PRC History Review* 1, no. 1 (May 2014): 3 – 5. Accessed January 24, 2021.

<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Day-Final.pdf>.

Day, Alexander F., and Mindi Schneider. “The End of Alternative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Rur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 no. 7 (November 2018): 1 – 25.

“**A Decade On**, China’s Labour Contract Law Has Failed to Deliver.” *China Labour Bulletin*, December 28, 2017. Accessed January 12, 2021.

<https://clb.org.hk/content/decade-china's-labour-contract-law-has-failed-deliver>.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9.” statista.com, September 10,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0162/urbanization-in-china>.

- DeMare, Brian.** *Land Wars: The Story of China's Agr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Dickson, Bruce J.**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 - .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 Dillon, Michael.** *China's Rulers: The Fifth Generation Takes Power (2012–13)*. London: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2012.
- Dirlik, Arif.** “The Third World.” In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edited by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295–3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ittmer, Lowell.**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31, no. 1 (October 1978): 26–60.
- - - - .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Drucker, Peter F.**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 Eckstein, Alexander.**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Edwards, Louise.** “Issue-Based Politics: Femi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Return of Bourgeois Feminism?” In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edited by David S.G. Goodman, 201–12. London: Routledge, 2008.
- Elfstrom, Manfred, and Sarosh Kuruvilla.**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LR Review* 67, no. 2 (April 2014): 453–80. Accessed January 27,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6013739_The_Changing_Nature_of_Labor_Unrest_in_China.
- Elsenhans, Hartmut.** “Staatsklassen.” In *Entwicklung. Die Perspektive der Entwicklungssoziologie*, edited by Manfred Schulz, 161–85.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1997.
- Fan, Cindy C.**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London: Routledge, 2008.
- Federici, Silvia.**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PM Press, 2012.
-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 Frazier, Mark W.**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Friedman, Eli.**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 - - . “Marketizing China: Factory Relocations and Land Privatizations Have Put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on the Defensive.” *Jacobin*, September 9, 2015.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9/china-crash-yuan-devaluation-adidas-foxconn-strike>.

Friends of Gongchao. “ ‘Sie haben das selbst organisiert’ —Die Streikwelle von Mai bis Juli 2010 in China.” In *Aufbruch der zweiten Generation. Wanderarbeit, Gender und Klassenzusammensetzung in China*, edited by Pun Ngai, Ching-Kwan Lee et al., 225 – 57. Berlin: Assoziation A, 201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yq3y4lg>.

- - - - . “Left Dead-End Street vs. Destructive Critique—China’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ies and How to Respond,” gongchao.org, June 2012. Accessed January 2, 2021.

<https://www.gongchao.org/2012/06/01/left-dead-end-street-vs-destructive-critique>.

- - - - . “Against the Fetish of Representation: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Beyond the Leftist Grand Narrative.” gongchao.org, April 2013. Accessed January 2, 2021.

<http://www.gongchao.org/2013/04/05/against-representation>.

- - - - . “The New Strikes in China.” gongchao.org, July 2014.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14/07/01/new-strikes>.

Fuchs, Daniel. “Going West—Industrial Relocation and Migrant Labour Unrest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PhD dis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9.

Gao Wangling. “A Study of Chinese Peasant ‘Counter-Action.’ ” In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edited by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272 – 94.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Gao Xiaoxia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Rural Wome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80 – 9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DP Growth (Annual %)**—China.”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1,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CN>.

Gipouloux, François. *Les cent fleurs à l’ usine: Agitation ouvrière et crise du modèle soviétique en Chine, 1956 – 1957*. Paris: Éditions de l’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6.

Gladney, Dru C.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1 (February 1994): 92 – 123.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4c68/f8eb48508187c96ece69cb3585acd2f849bb.pdf>.

Goldberg, Jörg. *Die Emanzipation des Südens. Die Neuerfindung des Kapitalismus aus Tradition und Weltmarkt*. Cologne: Papyrossa, 2015.

Goldman, Merle.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 - . “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1965*,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218 – 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Greenhalgh, Susan, and Edwin A. Winckler.**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u, Edward,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 Gürel, Burak.** "Chang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from Decollectivization to Capitalism." *McGill Sociological Review* 4 (February 2014): 67 - 92.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www.mcgill.ca/msr/msr-volume-4/changing-relations-production-chinese-agriculture>.
- Han Minzhu and Hua Sheng, eds.**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ao Ren, eds.** *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 Harper, Paul.**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4, nos. 3 - 4 (July - October 1971): 111 - 40.
- Hart-Landsberg, Martin,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 Hassard, John, Jackie Sheehan, Zhou Meixiang, Jane Terpstra-Tong, and Jonathan Morris.**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7.
- He Huifeng.** "China's Middle Class Frets the 'Good Times' Are Over amid Sliding House Prices, Stagnant Wag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6,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4psudpb>.
- Heilmann, Sebastia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 no. 3 (Winter 1993): 1 - 19.
- - - - . *Sozialer Protest in der VR China: Die Bewegung vom 5. April 1976 und die Gegen-Kulturrevolution der siebziger Jahre*.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4.
- Hershatter, Gail.** "Forget Remembering: Rural Women's Narratives of China's Collective Past."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ited by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69 - 9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 - .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 - - .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Ho Wing-Wah, Loretta.**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0.
- Holbig, Heike.** "The Emergence of the Campaign to Open Up the West: Ideological Formation, Centr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Role of the Provinces." *China Quarterly* 178 (2004): 335 - 57.

-
- Honig, Emily.**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Reassessing the Red Guards.” In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edited by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255 – 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Hore, Charlie.** *The Road to Tiananmen Square*. London: Bookmarks, 1991.
- Howard, Pat.**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The Urban Contract Labour Syst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5 (January 1991): 93 – 114.
- Howe, Christopher.**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Incentives in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233 – 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Huang, Philip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 – 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uang Yu and Naubahar Sharif.**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orkers’ Power in South Chin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April 2017): 1 – 26.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tinyurl.com/y4atjrhq>.
- Human Rights Watch.** “Paying the Price: Worker Unrest in Northeast China.” Refworld, UNHCR, August 2, 2002.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d4fc5782.html>.
- Inman, Phillip.** “World Economy at Risk of Another Financial Crash, Says IMF.” *Guardian*, October 3,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5c4hyv.j>.
- Jacka, Tamar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acob, Rahul.** “China Factories Eye Cheaper Labour Oversea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2011.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f3e4e612-061d-11e1-a079-00144feabdc0>.
- Jian Yuan.** “Why Were the Chinese Workers Not Mobilized Successfully in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A Moment of Truth: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Unions*, edited by Lu Ping, 133 – 43.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Union Education Center/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1990.
- Jikhareva, Anna.** “Die Kinder der Krise.” *WOZ*, November 14, 2019.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woz.ch/1946/protestbewegungen/die-kinder-der-krise>.
-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Johnson, Ian.** “Jeremy Brow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16.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nyti.ms/1T7iMn1>.
- Johnson, Kay An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Joint Notice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Thirteen Work Units o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Women’s Day on March 8” (in Chinese). *People’s Daily*, February 10, 1956.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6/2/10/3>.

-
- Karl, Rebecca E.**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Keith, Ronald C.** *China from the Inside Out: Fit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into the World*.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 Kenney, Padriac.** *Rebuilding Poland: Workers and Communists 1945 - 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ernen, Antoine.** "The Reemergence of Street Protests: State Workers Challenge the Chinese State." In *Laid-Off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 Unemploy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Thomas B. Gold, William Hurst, Won Jaeyoun, and Li Qiang, 225 - 4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Kerns, Anna.** *Who Will Shout if Not Us? Student Activists and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China, 1989*. Minneapolis: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11.
- Kirkby, R.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 - 2000 AD*. London: Routledge, 1988.
- Klein, Donald W., and Lois B. Hager.**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Quarterly* 45 (January - March 1971) : 37 - 56.
- Korzec, Michael.** *Labour and the Failure of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Kraus, Richard C.**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Kwong, Julia.**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A Democratic Movement?" *Asian Survey* 28, no. 9 (September 1988) : 970 - 85.
- Kynge, James, and Jonathan Wheatley.** "China Pulls Back from the World: Rethinking Xi's 'Project of the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1, 2020. Accessed December 12,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9bd8059-d05c-4e6f-968b-1672241ec1f6>.
- Laba, Roman.**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 (Modeled ILO Estimate)—China."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CN>.
- "**Labour Migration** in China and Mongoli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ilo.org/beijing/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lang--en/index.htm>.
- Lagerkvist, Johan.** "The Wukan Uprising and Chines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oward 'Shadow Civil Societ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3, no. 3. (December 2012) : 345 - 61.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tinyurl.com/y5rs8wp7>.
- Landsberger, Stefan.** "The Deification of Mao: Religious Imagery and Practi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yond." I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edited by Chong Woei-Lien, 139 - 84.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Lau, Jörg. “Donald gegen den Drachen. Der Konflikt zwischen Washington und Peking ist kein neuer Kalter Krieg.” *Zeit Online*, May 19, 2020.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6b6rdlk>.

Lee, Ching-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 “Pathways of Labor Activism.”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57 – 79.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Lee, Ching-Kwan, and Zhang Yongho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May 2013) : 1475 – 1508.

Lee, Shannon.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Shenzhen Jasic Events.” Shannon Lee’s China Blog, September 17,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wolfsmoke.wordpress.com/2018/09/17/jasic>.

Lee Hong-Yo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Lee Nan-Shong, Peter. “The Informal Politics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In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Lee Nan-Shong, 165 – 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eese, Daniel. *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76 – 1976*.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16.

Leijonhufvud, Göran.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er and Big-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Copenhagen: Curzon Press, 1990.

Leith, Luzette. “Chinese Women in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In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edited by Marilyn B. Young, 47 – 7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Leung Pak-Nang and Pun Ngai. “The Radicalis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Working Class: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Gemstone Indust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no. 3 (2009) : 551 – 65.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tinyurl.com/yxrqn2zo>.

Li Lianjiang. “Driven to Protest: China’s Rural Unrest.” *Current History* 105, no. 692 (September 2006) : 250 – 54.

Li Lianjiang and Kevin J. O’ 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In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edited by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85 – 108. London: Routledge, 2010.

Li Minq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Li X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China Review* 1, no. 1 (Fall 2001) : 137 – 65. Accessed October 13, 2020.

<https://cup.cuhk.edu.hk/chinesepress/promotion/China%20Review/5-Li.pdf>.

Liang Hong.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Union: Origin and Activities.” In *A Moment of Truth: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Unions*, edited by Lu Ping, 1 – 12.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Union Education Center/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1990.

Liao Yiwu. *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9.

Lim, Louis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 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Lin, Kevin. “Labour Protests in the State Sector: Back to the Nineties?” *Made in China* 1, no. 1 (2016): 12 – 1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www.chinoiresie.info/PDF/madein_china-2016_ISSUE1.pdf.

Lionnet, Philippe. “Anpassung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ie Scharnierjahre 1974/1975.” In *Jahrbuch Historische Kommunismusforschung 2020*, edited by Ulrich Mählert et al., 155 – 71. Berlin: Metropol Verlag, 2020.

Lipinsky, Astrid. *Der Chinesische Frauenverband: Eine kommunistische Massenorganisation unter marktwirtschaftlichen Bedingungen*. Berlin: LIT Verlag, 2006.

Liu Jiey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Liu Yujing. “Cheating and Violence Have Chinese Women Calling for Divor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9,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https://tinyurl.com/y3dnqhk2>.

Lucas, Louise, and Emily Feng. “Inside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Financial Times*, July 20, 2018. Accessed October 20, 2010.
<https://www.ft.com/content/2182eebe-8a17-11e8-bf9e-8771d5404543>.

Luo Qiangqiang and Joel Andreas. “Mobilizing Compliance: How the State Compels Village Households to Transfer Land to Large Farm Operator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 no. 6 (October 2020): 1189 – 121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Manning, Kimberley Ens. “Communes, Canteens, and Crèches: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ited by Ching-Kwan Lee and Yang Guobin, 93 – 1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si, Edoarda. *China Winter: Workers, 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New York: E. P. Dutton, 1982.

Mattingly, Daniel C. *The Art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Mehnert, Klaus.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 - - - .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dited by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79 – 116.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Meyskens, Covell.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Minimum Wage Increases** Stall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China Labour Bulletin*, December 16, 2020.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0.

<https://clb.org.hk/content/minimum-wage-increases-stall-under-impact-covid-19-pandemic>.

Mitchell, Tom, Wong Sue-Lin, and Nicolle Liu. “How Hong Kong Defied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 June 19,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0aa598a-90f2-11e9-b7ea-60e35ef678d2>.

Murck, Alfreda, ed. *Maos Mango. Massenkult der Kulturrevolution*. Zürich: Scheidegger & Spiess, 2013.

Murphy, Rachel.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Nakajima, Mineo.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1965*,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259 – 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Nathan, Andrew J.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National Debt** in Relation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4.” statista.com.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3ogorm4>.

Naughton, Barry.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351 – 86.

- - - - .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 – 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 - .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Nguyen, Minh T.N., and Catherine Lock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Vietnam and China: Gendered Householding,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 no. 5 (August 2014): 855 – 76. Accessed January 25, 2021.

https://pure.mpg.de/rest/items/item_2105225_9/component/file_3236289/content.

Nolan, Pe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An Analysis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Nyabiage, Jevans. “Are Chinese Infrastructure Loans Putting Africa on the Debt-Trap Expr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8,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51eeztj>.

O’Brien, Kevin J. “Rightful Resista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0, no. 6 (January 2013): 1051 – 62.

O' Brien, Kevin J., and Li Lianjiang.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Oksenberg, Michel,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c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Ostry, Sylvia, Alan S. Alexandroff, and Rafael Gomez, eds. *China and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Trade: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Oy, Gottfried, and Christoph Schneider. "Destruktion und Intervention—von den Möglichkeiten der Geschichtspolitik."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14 (2014): 97 - 119. Accessed October 13, 2020. <https://tinyurl.com/y2491hb8>.

Panzieri, Raniero.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1961). In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Phil Slater, 44 - 68. London: Ink Links, 1980.

- - - - - . "Socialist Uses of Workers' Inquiry" (1965). Translated by Arianna Bove. eipcp.net, April 2006.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406/panzieri/en>.

Pauley, Logan. "China Takes the Lead in UN Peacekeeping: As the U.S. Backs Away, China Is Stepping Up Investment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Diplomat*, April 17, 2018.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china-takes-the-lead-in-un-peacekeeping>.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1 - 27.

- - - - - . "Crime, Corruption, and Contention."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ited by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308 - 2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 - - .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 - - - - .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tes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edited by Kam-ye Law, 262 - 81.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 - - - .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edited by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30 - 6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iovani, Chiara. "The 'Greening' of China: Progress, Limi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7, no. 1 (2017): 93 - 115.

Piven, Francis Fox,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omfret, James. “Police Use Tear Gas to Quell Riot in Southern China.” *Reuters*, June 13, 2011. Accessed January 7, 2021.

<https://de.reuters.com/article/instant-article/idUSTRE75C30320110613>.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 - .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 nos. 3 - 4 (July - October 2007): 239 - 58.

Pun Ngai and Chris Chan King-Chi. “The Subsump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boundary 2* 35, no. 2 (June 2008): 75 - 91.

Pun Ngai and Chris Smith.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1, no. 1 (March 2007): 27 - 45.

Qin Ling. “Introduction: The Survival and Collective Struggles of Workers in China’s Coastal Private Enterprises Since the 1990s.” In *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edited by Hao Ren, 1 - 26.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Riskin, Carl.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fel, Lisa. “Liberation Nostalgia and a Yearning for Modernity.”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226 - 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 - .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Rošker, Jana. “Die Geschichte eines Traumes: Frauen und Frauenproblematik der chinesischen anarchistischen Bewegung an der Schwell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Frauenstudien. Beiträge der Berliner China-Tagung 1991*, edited by Cheng Ying, Bettina Gransow, and Mechthild Leutner, 131 - 41. Munich: Minerva, 1992.

Roubini, Nouriel. “The Main Street Manifesto.” *Project Syndicate*, June 24,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4zgbbtv>.

Ruckus, Ralf. “Rezension: Florian Butollo,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17 (2015): 135 - 48.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duepublico2.uni-due.de/servlets/MCRFileNodeServlet/duepublico_derivate_00042080/05_Ruckus_Li_Minqi.pdf.

- - - - . “China Crash—The Falter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 *gongchao.org*, September 2015.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www.gongchao.org/en/texts/2015/china-crash>.

- - - - . “Chi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Part 2: Li Minqi on the Forthcoming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19 (2016): 115 - 4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5yjz351>.

- - - - - . “Pokerspiel um die globale Vorherrschaft.” *WOZ*, August 23, 2018.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0. <https://tinyurl.com/y3wz6fsz>.
- - - - - . “Verhaftet, verhört, verschwunden.” *WOZ*, August 8, 2019.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0. <https://www.woz.ch/-9e3b>.
- - - - - . “Out of Control—Hong Kong’s Rebellious Movement and the Left.” *nqch.org*, September 10,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19/09/10/out-of-control-hong-kongs-rebellious-movement-and-the-left>.
- - - - - . “Birth Strike against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nqch.org*, March 29,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20/03/29/birth-strike-against-chinas-population-policies>.
- - - - - . “Will China Push the Global Economy Like Ten Years Ago? Maybe Not.” *nqch.org*, September 1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nqch.org/2020/09/11/will-china-push-the-global-economy-like-ten-years-ago-maybe-not>.
- - - - - . *The Left in China. A Political Cartography*. London: Pluto Press, forthcoming.
- Russo, Alessandro.**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6, no. 1 (Spring 1998): 179 – 202.
- - - - - .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 *Modern China* 39, no. 3 (May 2013): 239 – 79.
- Saich, Tony.** “When Worlds Collide: The Beijing People’s Movement of 1989.” In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edited by Tony Saich, 25 – 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 Salaff, Janet, and Judith Merkle.** “Women and Revolution: 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edited by Marilyn B. Young, 145 – 77.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Sargeson, Sally.** “The Demise of China’s Peasantry as a Class.”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14, issue 13, no. 1 (July 2016): 1 – 22. Accessed January 24, 2021.
<https://apjjf.org/2016/13/Sargeson.html>.
- Scharping, Thomas.**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 – 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 Schling, Hannah.** “Gender, Temporalit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14 (2014): 42 – 61.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2hkrlq7>.
- 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elden, Ma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 - - - - ,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Selden, Mark, and Elizabeth J. Perry.** “Reform,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1 – 30.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 Sheehan, Jacki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 Shenker, Jack.** “This Wave of Global Protest Is Being Led by the Children of the Financial Crash.” *Guardian*, October 29, 2019. Accessed November 7, 2020.
<https://tinyurl.com/yy76gfw8>.
- Shepherd, Christian.** “No Regrets: Xi Says Marxism Still ‘Totally Correct’ for China.” *Reuters*, May 4, 2018. Accessed November 6, 2020. <https://tinyurl.com/y4d5v5rj>.
- Shue, Vivienn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Sicular, Terry.** “Grain Pricing: A Key Link in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Modern China* 14, no. 4 (October 1988): 451–86.
- Silver, Beverly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mith, Colby.** “Belt and Road, or Debt Trap?” *Financial Times*, July 24,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ftalphaville.ft.com/2018/07/24/1532410200000/Belt-and-Road--or-debt-trap>.
- Smith, Noah.** “Global Youth Protests at Risk of Spreading to China.” *Bloomberg*, January 5,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5amm3d3>.
- Smith, Richard.** *China’s Engine of Environmental Collapse*. London: Pluto Press, 2020.
- So, Alvin.** “Peasant Conflict and the Local Predatory Stat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4, nos. 3–4 (July 2007): 560–81. Accessed February 2, 2021.
<https://landwise.resourceequity.org/documents/2267>.
- .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
- Solinger, Dorothy J.**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Song Yongyi.** “The Hidden History: Liu Shaoqi’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Modern China Studies* 3 (2006).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0-2012-01-05-15-35-10.html>.
- .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SciencesPo*, August 25, 2011. Accessed January 6, 2021.
<https://tinyurl.com/y639fnzq>.
- Spakowski, Nicola.** “*Mit Mut an die Front* — Die militärische Beteiligung von Frauen in der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Chinas (1925–1949). Cologne: Böhlau Verlag, 2009.
- Standaert, Michael.** “Countryside Fit for a Superpower? Inside China’s Colossal Rural Revamp.” *Guardian*, September 6,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5ex5fd>.
- “**Strike Map.**” *China Labour Bulletin*.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0.
<https://maps.clb.org.hk>.

Sugihara, Kaoru. “The East Asian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78 – 123.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Tan Jiangying. “Truckers on Strike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China Change*, June 15,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au54176>.

Teiwas, Frederic C.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part 2,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51 – 1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eiwa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 – 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Ten Brink, Tobias. *Chinas Kapitalismus: Entstehung, Verlauf, Paradoxi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Ter Haar, Barend J. “China’s Inner Demons: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 I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edited by Chong Woei-Lien, 27 – 6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Thornton, Patricia. “Comrades and Collectives in Arms: Tax Resistance, Evasion,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in Post-Mao China.”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edited by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87 – 104.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Tian Miao. “‘Neue Allianzen’ —Die Repression gegen ArbeiterInnen und Studierende in China.” *Express* nos. 8 – 9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3r6lk74>.

“Tian’ anmen Square Protest Death Toll ‘Was 10,000.’ ” *BBC News*, December 23, 2017.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2465516>.

Unger, Jona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Walder, Andrew G.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China Quarterly* 127 (September 1991): 467 – 92.

— .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167 – 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 .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Walker, Kathy L. “‘Gangster Capitalism’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hina: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3, no. 1 (January 2006): 1 – 33.

— . “From Covert to Overt: Everyday Peasant Politics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8, nos. 2 – 3 (April 2008): 462 – 88.

Wang Fei-Ling. “Conflict, Resist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kou System.”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80 – 100.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Wang Feng.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Wang Hui. “The Rumour Machine: Wang Hui on the Dismissal of Bo Xilai.”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 no. 9 (May 2012): 13 – 14.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4/n09/wang-hui/the-rumour-machine>.

Wang Jiangsong. “The Significance of Crane Operators across China Going on Strike.” *China Change*, May 7, 2018.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4jvgd23>.

Wang Rongfeng. “Fol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Frauen der ‘verlorenen Generation.’” In *Frauenstudien. Beiträge der Berliner China-Tagung 1991*, edited by Cheng Ying, Bettina Gransow, and Mechthild Leutner, 213 – 18. Munich: Minerva, 1992.

Wang Shaoguang. “Deng Xiaoping’s Reforms and the Chinese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st Movement of 1989.” I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edited by Paul Zarembka, 163 – 97. London: JAI Press, 1992.

— . “From a Pillar of Continuity to a Force for Chang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Movement.” In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edited by 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177 – 9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158 – 82.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 “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913 – 32.

Wei Jingsheng.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weijingsheng.org](http://weijingsheng.org/doc/en/THE%20FIFTH%20MODERNIZATION.html), 197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weijingsheng.org/doc/en/THE%20FIFTH%20MODERNIZATION.html>.

Wemheuer, Felix. *Steinnudeln: Ländliche Erinnerungen und staatlich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der ‘Großen Sprung’ — Hungersnot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Hena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 . “Collectivization and Famin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tephen A. Smith, 407 – 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Wenten, Frido. “Gewerkschaftsreformen in China—Segen oder Fluch? Kontroverses zu Tarifverhandlungen und ‘zellulärem’ Aktivismus.” *Sozial. Geschichte Online* 20 (2017): 53 – 98. Accessed February 2, 2021.

[http://duepublico.uni-duisburg-esSEN.de/servlets/DocumentServlet?id=43555](http://duepublico.uni-duisburg-essen.de/servlets/DocumentServlet?id=43555).

White, Lynn T.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no. 1 (November 1976): 99 – 116.

-
- White, Tyrene.** “The Origins of China’s Birth Planning Policy.”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210 – 7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Whyte, Martin K.** “Corrective Labor Camps in China.” *Asian Survey* 13, no. 3 (March 1973): 253 – 69.
- Whyte, Martin K., Wang Feng, and Yong Cai.**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China Journal* 74 (July 2015): 144 – 59.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447103>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 Wildau, Gabriel.** “China Struggling to Quit Its Debt Addi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5,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93a95d0-2ee9-11e9-80d2-7b637a9e1ba1>.
- Wildcat.** “Female Workers under Maoist Patriarchy.”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female-workers-under-maoist-patriarchy>.
 - - - - . “Unhappy Urban Workers—Situation and Protests of Urban Workers and Unemployed.” gongchao.org, December 1, 2007. Accessed October 14, 2020.
<http://www.gongchao.org/2007/12/01/unhappy-urban-workers>.
- Williams, Philip F., and Yenna Wu.** *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Wilson, Amy, Sidney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hittingham,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 Wilson, Jeanne L.** “‘The Polish Lesson’ : China and Poland 1980 – 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nos. 3 – 4 (Autumn – Winter 1990): 259 – 79.
- Witke, Roxane.** “Women as Politician in China of the 1920s.” In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edited by Marilyn B. Young, 33 – 45.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Wolf, Martin.** “The Future Might Not Belong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ae94de0e-0c1a-11e9-a3aa-118c761d2745>.
- Worker Study Room.** “Worker Organising under the Pandemic: Reflections from China,” chuangcn.org, July 21, 2020.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0,
<http://chuangcn.org/2020/07/pandemic-Workers>.
- Wright, Teresa.** “Tenuous Tolerance in China’s Countryside.” In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edited by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109 – 28. London: Routledge, 2010.
- Wu Fulong.**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Neoliberalization as Establishing a Market Society.” *Geoforum* 39, no. 3 (May 2008): 1093 – 96.
- Wu Jinglian.** “Soul Searching on China’s 70-Year Economic Evolution.” *Caixin*, October 14,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6hx8ou3>.

Wu Xiao, Angela, and Dong Yige. “What Is Made-in-China Feminism(s)? Gender Discontent and Class Fric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1, no. 4 (October 2019): 1 – 22.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tinyurl.com/yy5p6pw6>.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 History, Class, and Chinese Postsocialism.” *boundary 2* 46, no. 2 (May 2019): 139 – 62.

Xi Jinping. “Speech by Xi Jinping at the Reception in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Daily*, September 30,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9/30/WS5d9c5502a310cf3e3556f378.html>.

Xu Bin.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Xu Zhun. *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 How China’s Peasants Lost Collective Farming and Gained Urban Pover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Yan, Alice. “Young Employees Rebel against Chinese Work Ethic by Being Lazy, Refusing Overtime, and Hiding in the Toilets. They Call It ‘Touching Fis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 2021. Accessed January 6, 2021. <https://www.scmp.com/lifestyle/article/3116109/young-employees-rebel-against-chinese-work-ethic-being-lazy-refusing>.

Yan Hairong.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Yan Hairong and Chen Yiyuan. “Agrarian Capit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Capitalist Dynamics from Above and Below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no. 3 (July 2015): 366 – 91.

Yang Guob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Yang Wenqi and Yan Fei. “The Annihilation of Femininity in Mao’s China: Gender Inequality of Sent-D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Information* 31, no. 1 (March 2017): 63 – 83. Accessed October 16, 2020.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920203X17691743>.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 London: Collins, 1983.

Ye Jingzhong.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no. 3 (July 2015): 314 – 37.

Yeh, Emily T., Kevin O’ Brien, and Ye Jingzhong. “R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0, no. 6 (November 2013): 915 – 28. Accessed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3689378_Rural_politics_in_contemporary_China.

Yi Xi. “New Foundations for Struggle and Solidarity: The Culm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Privatization on a Guangzhou Island.” libcom.org, October 7, 2014.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libcom.org/blog/guangzhou-sanitation-strike>.

-
- Yu Luojin.** *A Chinese Winter's Tale*. Hong Kong: Renditions Paperbacks, 1986.
- Yusuf, Shahid, and Tony Saich, eds.**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 Zarrow, Peter.** “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4 (November 1988): 796 – 813.
- Zhang Lu.** *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Labor and Worker Resist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Zhang Mei.** *China's Poor Reg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Poverty, Economic Reform, and Urb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 Zhang Qian, Forres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ract Farming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2, no. 4 (October 2012): 460 – 83.
- Zhang Qian, Forrest,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China Journal* 60 (July 2008): 25 – 47. Accessed January 26, 2021.
https://ink.library.smu.edu.s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31&context=soss_research
- Zhang Yueran.** “The Forgotten Socialists of Tiananmen Square.” *Jacobin*, June 4, 2019.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4yhkqkx>.
-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1.
-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Zheng Tiantian.**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 Zhou, Cissy.** “China’s Migrant Workers See ‘No Hope’ in Virus-Stricken Rural Hometow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8, 2020.
<https://tinyurl.com/y6cptph6>.
- Zhu Yu.**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Habitat International* 31, no. 1 (March 2007): 65 – 76.
- Zhu Yu and Chen Wenzh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 no. 4 (July – August 2010): 253 – 67.
- Zweig, David.**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